

蘇聯的領袖與人民

何家選譯述

台維斯原著



行印社科學學

蘇聯的領袖與人民

何家選譯述 台維思原著

上海

學風出版社出版

蘇聯的領袖與人民

一九四九年八月月初版

基本定價每冊七元

(版權有所翻印必究)

原 著 者
譯 述 者
發 行 人
出 版 者
印 刷 者
總 經 售

台維斯

何家選

曹 蘇 一

學風出版社

上海中正路五四五弄二十號
電話七六七八號

中國科學公司

上海中正路五二七號

學風書店

上海中正路五四五弄二十號
電話七六七八號

譯者序

本書原作者 Jerome Davis，美國社會學者，一九一六年初至俄國，目覩大革命的爆發，此後九遊蘇聯，足跡遍全境，訪問史太林以下的重要領袖多次，因擅俄語，又得與蘇聯人民相交往。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為從軍記者，戰後回國，寫成本書。因作者為美國甚至世界的有數蘇聯通，一切記述，無不根據目擊身受，而且對蘇聯衷心敬愛，絕無偏見，故本書一經出版，世界進步人士一致尊為報道蘇聯作品中最有價值最有趣味的名著之一。

本書的篇幅雖然不多，包括的範圍却極廣泛。先是傳記偉大的史太林的生平，敘述他左右的重要領袖，漫記革命當時的內憂外患，德國侵略時的英勇抗戰。次之是詳述革命對於人民大眾的造福，人民大眾對於建設的熱烈獻身，工廠農場，文化教育，一般生活，無不一一記載，件件講來。尤可寶貴的是記事詳盡而不枯燥，嚴肅而有趣味。令讀者一卷在手，愛不忍釋。

然譯者的譯述本書，最大目的還是深感蘇聯為革命先進國家，三十多年來的奮鬥建

設，辛苦艱難，安樂富強，值得我們效法學習的地方，實在不知其數，如能使國人多知道一點革命成功後的蘇聯，人民如何在領袖指導之下，羣策羣力，勇往直前，破壞舊的制度，建設新的文明，聞風向往，共為建設民主富強的新中國更盡全力，應該是不無意義的事。

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譯者記於上海

目錄

第一章	史太林這個巨人	(一)
第二章	教士還是革命家？	(一一)
第三章	鋼鐵是這樣鍊成的	(二一)
第四章	內憂	(三一)
第五章	革命之劍	(三八)
第六章	史太林是獨裁嗎？	(四六)
第七章	史太林的左右	(五九)
第八章	有計劃的建設	(六五)
第九章	史太林與紅軍	(七五)
第十章	農村的革命	(八六)
第十一章	工人與職業	(一〇〇)
第十二章	文化是為人民全體的	(一一二)
第十三章	社會主義之下的生活	(一二三)

第一章 史太林這個巨人

在現存各國領袖之中，再沒有像史太林這樣的獨一無二，歷盡風波。我們簡直可以說全世界沒有一個人比他更引人注意，更受人讚頌，更引人好奇，更爲若干方面所恐懼。他的大名最爲各國報章刊物所常常述及——有時候視若希望象徵，更有時候當作仇視之的。

史太林的歷史是一部成功史。他的父親是個鄉下的鞋匠，身分毫無，窮愁潦倒，又是號稱『各民族牢房』的俄羅斯帝國的少數民族一分子。然而憑了能力與精力，史太林達到了登峯造極的地位。在目前他是蘇聯的主宰者，也是全世界最有力量的領袖。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蘇聯是殲滅德軍最多的國家，得到了她所欲得的一切主要目的物，在美國參戰之前如沒有蘇聯的力抗德軍這部千斤閘，在美國參戰之後如沒有紅軍的力殲德軍達英美聯軍所殲的兩倍之多，幾十萬美國遠征軍那裏能够生還祖國。結果之能如此，就仗史太林一人之力。史太林是一個喬治亞人，這民族只佔全蘇聯人口百分之一，而今日的他却領導着一百八十九個不同的民族，經過無可疑問的戰後困苦時期，走上蘇維埃人民視爲光明的坦坦大道。

史太林身材不高而結實，長約五呎五吋，髮灰白，眼珠深黃，面有麻點。雖然並不是普通所說的能言善辯之士，說起話來又帶着喬治亞口音，但在議論之際，自有一種從容不迫之概。如果情形需

要，他能够舌如利刃，斬釘截鐵的出言。

他爲人沉靜。若干早年的同僚，對他的深思熟慮之才頗爲渺視。有些人就公然看不起他，一直對史太林的力量熟視無睹，直等到列寧逝世，才如大夢初醒一般，發覺這位實際上是位政治大家的孜孜工作者，已經統治全局。

關於他的私人生活，外邊所知無多，因爲蘇聯領袖們不認爲自己的生活值得在報上大登特登。因此想入非非的謠言，傳遍了全世界，說史太林性愛奢華，生活得如皇似帝。其實這是無稽之談，最歪曲了這位大人物的理想與目標。事實是史太林不重金錢，他的衣着習慣與家庭，再也樸素簡單不過。他在克里姆林宮中只佔有四個小小房間的宿處。兒女幼小時候，有一個就以客室的沙發發爲床。只有在嚴冬之際，史太林才住到高爾基城的小小房子裏，那是列寧逝世之前住過的地方。

史太林結婚過二次。第一位夫人名凱絲玲史凡妮茲，原是帝俄治下共爲革命努力的同志。兩夫婦忙於革命，連見面的機會也少有。史太林的入獄充軍，使他們無從成家立室。他們生下一子，名叫雅各，這孩子落地時父親正在巴庫監獄中受難。凱絲玲於一九一七年患肺炎去世。雅各在二次世界大戰中從軍，曾爲德軍所俘。戈貝爾想盡方法迫令他他不忠不孝，但始終不能如願。雅各終於逃出德國，到得瑞士，直羈留到戰爭結束。

史太林的二次婚姻種根於一九一二年，當時他要避開沙皇秘密警察的魔掌，常常躲在一個高加索朋友家裏，此人是一個電氣站工頭，名叫阿萊留夫，生有兩女，一名娜雅，其時年方十歲。史太林常

常耽擱她家，爲她敬如英雄。到了一九一九年，史太林又遇見了娜雅，不久結爲夫婦，極盡唱隨之樂。一九三二年她因盲腸炎開刀，結果死於腹膜炎。史太林爲了紀念亡婦，特請著名女彫刻家穆基諾造一紀念像，置在公墓裏。

這第三位太滅留下一男一女，男名瓦西里，現在位到上校，勇冠三軍，在一九四五年得過蘇伏洛勳章。女名史維藍娜，在一九四五年出嫁，住在莫斯科。

這位蘇聯領袖所好所惡的娛樂，和他的性格正好一致。所有同僚都說他的私人習慣完全有清教徒風。他決不許人家在他面前說出粗話來。他難得喝伏特卡，只愛喝一點高加索紅酒。吸的是板烟，從不賭錢，不飲過量之酒。

他歡喜打獵釣魚，偶然下下象棋。可是最愛的是消遣却是讀書，只要時間許可，他總手不釋卷。他的文學基礎是打在不朽大家如莎士比亞，席勒，托爾斯泰的大作上，心愛的作家是郭果爾柴霍夫。他也讀英美作家的譯本，如柯柏，辛克萊，馬克吐溫，辛克萊劉易士的作品他都會過目。他博覽文明史與馬克思派作品，早年却深好詩歌，少年時還做過幾首，十六歲就發表詩作於報章。不管這些少作的文學價值如何，少年時一片改革社會的熱情，總已流露於字裏行間：

無限的辛勤使得他腰灣背曲，

昨天還跪着打穀，

我說將引起高山的妬羨，

在希望的翼上，飛升得高於一切。

在古今詩人之中，有幾個能像他的把詩意付諸實現！

對於當代蘇聯作家的傑作，史太林無所不讀，而且真有個人的興趣，常常約作家去和他作私人閒談。他往往讀一本新書讀得高起興來，半夜三更打電話給這個作家，賀他的成功。他對於文化的深感興趣，可於這一個事實見之：政府給與文學藝術科學傑作的獎金，名之爲史太林獎金，而身爲政府首長的史太林，對於選擇得獎人士的工作，熱烈參加。

這位大元帥的努力於工作，又是出類拔萃。他工作時間極長，早晨難得在克里姆林宮，下午總在辦公室裏，而晚飯之後，他就要一直工作到夜深，有時候簡直通宵辦公。雖然治事終日而且工作繁重，年齡又近七十，樣子還是一無衰老之相。工作時候的成績極佳，因爲他有着有條不紊自節自制的頭腦，以及異常的記憶力。外國政治家往往驚於史太林的博學多識，只要是他有興趣的事情，他總知道到細枝末節。有一位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秘書，曾謂史太林談話寫作與工作特點，是簡潔清楚與精確。這批評在我訪問史太林時證明其不誤。他答覆問題時不假思索，出言簡單明瞭，常常分爲第一第二第三的條分縷析，井然有序。

見過史太林的人總有這樣一個印象：一個鐵的意志包着一團火的熱情。他一生的熱誠是把俄國建設成爲人民的國家，使舉世敬仰蘇聯。在這方面他是俄國人民民族主義者而非國際主義者——雖然他比西方各國領袖更知道爲此目的和平實屬必須，更明白和平決不能分，他所懂得的語文，却只有喬治亞

與俄羅斯。

雖然端莊持重，史太林也很幽默。有一次他頒發獎金給年輕的鋼琴家亞諾爾卡普俞尼，提琴家蒲里斯戈爾斯坦，每人三千盧布，等到這兩位得獎人接錢在手，史太林就開了一個玩笑：「現在你們是資本家了，在街上還會認得我嗎？」

在布爾塞維克剛要革命之際，史太林是真理報編輯，有一天接到喀耶斯塔得海軍打來電話，問他：「我們示威遊行時要不要帶槍？」回答是：「槍嗎？那是你們的事情。我們寫寫文章的人倒總是隨身帶着鉛筆的。」結果在遊行時海軍就帶着他們的「鉛筆。」

在政治辯論中，史太林的幽默就變得辛辣——非常之有力量。他在攻擊雷可夫，湯斯基，布哈林，嘲笑他們的害怕新政策時，說：「當事情有點棘手，一二片黑雲在天空出現時，他們的樣子就特別可笑。每當什麼地方發生一點困難與障礙，他們就恐慌萬狀，怕有什麼事故發生。有一隻螳螂悉率悉率的作聲，還沒有工夫爬出洞來，他們就已經嚇得要命，大呼小叫的狂喊大事不好了，蘇維埃政府要完結了。」

「我們極力使他們定一定神，使他們相信並沒有什麼危險發生，只不過一隻小蟲，用不着大驚小怪，但一點用處沒有。他們還是大叫大喊，說「那裏是什麼螳螂，那是一千隻猛獸！那裏是一隻螳螂，那是萬丈深淵，是蘇維埃政府的葬送之地！」長篇大論就此寫個不已。」

即使有時候他並不意存攻擊，他的機智也不會不尖刻。一九二七年我們集團訪問他，向他東問西

問的問了六小時之後，他就轉問我們：『假如各位代表還並不十分疲倦，我倒想提出幾個問題來請教請教。』接着開玩笑似的詢問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代表們：『各位對於美國工人加入工會的如此之少，不知有何解釋？』我至今還記得史太林對於我們的自相矛盾答覆，哈哈發笑。

史太林的另一特點，是出言的單刀直入。航空家兼飛機設計師亞力山大約可勒夫說起他的第一次進見史太林，『我眼睛望着天花板，不知道如何答覆他的問題，』史太林就說，『不要看天花板，天花板裏找不出答覆來。還不如眼睛看着我，說你想說的話！』

據說他生平不知恐懼，他的確不懷疑勝利之必屬於他。他的一個知交告訴我，當革命初期內憂外患交迫之際，他絕不以自己的舒服爲念，一點也不顧到危險。不論前途怎樣黯淡，同事怎樣沮喪，他總相信勝利可操左券。在二次大戰時，就連德軍已臨莫斯科城下之際，他還是不慌不忙。他始終不離開莫斯科一步，深信紅軍必能克敵。

他的遭遇千難萬險而卒能履險如夷，已經如家常便飯。自從一八九九年以來，沒有一年讓他能平安度過。先是爲革命奮鬥，下牢入獄，充軍流徙不知多少次。繼之是內戰和外國干涉。接着是列寧逝世，黨內起劇烈紛爭。在經濟與社會的改革上又是危機迭起。還有三次五年計劃——戰爭威脅總是凶多吉少的潛伏在後。希特勒的進攻爆發了預計已久的這場惡戰。現在是復興重建的艱鉅大業。

經歷使史太林十二分講究實際——每當理論不切用於實際，這理論就棄如敝屣。以前他爲聶伯河水開找一個建築工程師時，曾派一個代表團徧歷歐美，決定人選，代表團奉命須得到應徵工程師真正

建築就的水閘照片。其餘的經過由古柏上校告訴我如下：他和一家德國公司要備一水閘詳細計畫書，德國人預備好一套完備周全的模型，紙面上的計畫又比古柏的道地動人，史太林兩者都請，叫他們分頭在聶伯河兩面動工，一個月後，古柏的成績證明他的方法遠勝德人，於是史太林就請德人捲鋪蓋，請古柏完成其事。

史太林對於馬克思派理論也不一味拘泥。理論必須經得起試驗。例如在革命初期，工資的平等遠甚於今日。後來發覺分點花紅給工人與經理結果甚佳。目前工資就有高下。例如當初任何婦人依法得打胎一次，結果發覺打胎於母體有害，國內多了不少神經衰弱的女人。於是在醫學團忠告之下，蘇聯政府就廢止了准許打胎的法律。現在只有打胎有益於母體健康時才許打胎。

又如一發覺把所有田地集體化引起了農民反對，就變更辦法使農家各有一方小小土地，專供己用。當初丈夫或妻子隨意可以離婚，不必通知對方，只須簽一張文件即行。這結果使道德墮落，家庭似有若無。現在在蘇聯要想離婚，比在美國的某幾州還要困難。

說來好像奇怪，史太林一方面淡泊自甘，決不作威作福，一方面却讓自己的彫像像片全國皆有，處處陳列懸掛。但這是有道理的，他認為國人之所以如此，不過以他為蘇維埃國家的象徵罷了。至於在國內習以為常的過分歌功頌德，拍馬恭維他却不以為然。有一次他向鐵佛力斯廠工人演說，就以半譏諷的口吻提到這點：

我非誠誠心心的告訴諸位不可，在所有對於我的恭維之中，我連一半也不敢當。他們把我當

作英雄，蘇聯共產黨的指導者……一個未受封典的爵士，以及其他等等。這只是胡思亂想，毫無用處的誇張。這是追悼革命烈士的說法，可是我還不預備嗚呼哀哉。所以我必須使諸位明白我是何等樣人，我今日在黨裏有此地位受誰之賜……不論今昔，我只是鐵佛力斯鐵路工廠前輩工人的學生罷了。

史太林是個十全十美的政治戰略家，有一種選賢與能的異常本領。他仔細研究與他共事之人，直研究到關於此人之弱點長處，比本人還要洞悉無遺。他的下屬對他忠誠不貳。在大戰之際，他難得所用非人，如所用之人不意發現弱點，他就立刻撤職。他的軍事戰略大才，又使他得與將軍們共籌軍事，選用適當將士。

這位蘇聯領袖決不剛愎自用，決不迫令別人奉行己意。他的一舉一動，無不反映大眾的願望。他始終不忘靜聽民聲，細找民意。他鼓勵工農坦白發表意見，有大批人員專讀一切民間來函，報告於他；他自己也抽讀來信，接見遠道而來的人民。有兩萬左右專任黨秘書遍布全國，使他得悉民意所趨。史太林對於人民心境十分明白，有求必應。不過這不足以阻止他的創見主動，凡他認為事實所須的政策，雖人民未嘗要求或甘心爲之，他也當機立斷，決不遲疑。他是一方面遵循民意，同時也領導民意。

一九三二年的勒令實行集體農場，是史太林覺得時機迫切萬不能靜待民意而毅然爲之的一例。當時我會問他何勿先成立一個模範集體農場，備以現代機械，使用現代方法，給農民一個榜樣，使他們

欣然贊成；示農民以集體農場的具體好處。他的答覆是：如蘇聯有五十年確確實實的和平，此舉自然可為，但惜乎世界大戰在十年之內不免發生，蘇聯欲求生存，不得不勒令集體耕耘。時至今日，蘇聯人與外國觀察家有幾個能不佩服他的先見之明？

對於史太林的致力之點，下面這幾句他自己的說話最能道出：「領袖之道並非易事。他既不能落在一個運動之後，又不能趕在前面，落後趨前，均不免與大眾分離。凡欲一面領導一面與人民保持接觸之人，必須兩面作戰；戰遲遲落後者與急急趕先者。」

一九二八年春他向莫斯科黨組織演說：做領袖的總以為他們在注視一切而實際一無所見，「直到大難臨頭，這才倉皇失措——這那裏是什麼領導。布爾塞維克主義的領導觀決不是如此。領導就是先見，而先見並不始終簡單。只有十廿個領袖同志注意不懈看出我們工作缺點來時是一件事……而當十廿個領袖同志之外又有了一千千萬萬工人，注意不懈看好我們工作缺點時，加以指示，擔當社會主義建設的共同大業，指出改善之道時，完全是另一件事，不能相提並論了。」這是俄羅斯成爲蘇維埃聯盟之後成就卓然的關鍵所在。他是領導大眾，但他使大眾與他攜手並進。

凡與史太林密切接觸過的人，無不印象甚深。如威爾基，赫爾，甚至於反共最烈的邱吉爾，對於史太林也稱道不止。至於蘇聯人民，自更知道史太林有素。

我在最近幾次的訪蘇，遊踪所至，常在萬哩之上。我與出身不同，職業不同，民族不同的許多人談話。我能說俄文，熟知俄國，舊交甚多。他們同我談話甚少顧慮。我確信今日蘇聯之反對史太林

者，必遠少於世界各國之反對其統治者。有一個俄國人始終懷戀過去盛世，對於史太林不無微詞者，我會問他假如蘇聯有異黨存在，完全得自由競選，結果又將如何。他承認道：『這樣的選舉也無濟於事，百分之九十八的選民自會選舉史太林。從教士以至農民，都認為史太林在希魔手中救出了俄國。實實在在俄國人並不反對他。』

史太林相信工農始終不渝，新俄羅斯敬仰史太林如神明。他們的深信史太林不是由於胡裏胡塗的感情作用，而是因為他有大功於俄國。他們記得戰事最爲不利，德軍兵臨莫斯科城下之際，史太林屹然不動，忠於職守，激勵得人人完成超人的愛國大業。他們忘不了史太林在俄國歷史上空前艱苦之際，誓願獻身爲國。他們知道他誠實不欺，認爲他真爲全民福利而建設。他們相信他一定像領導他們力抗納粹那樣，引導他們走上幸福進步生活日趨美滿的大道。

第二章 教士還是革命家？

我的第一次與史太林談話，時爲一九二六年，那次訪蘇我攜有參議員波拉的介紹信。此信大有用處，約我與史太林在黨部辦公室相見的通知立刻送來。

共產黨總部在莫斯科內城，房子樸實無華。進去之前須先入一個地下室取得許可，衛兵查過許可，然後領我入一極大房間，懸有一幅列寧大像片。史太林站起身來，向我招呼，熱烈握手。他的面相除在微笑時候之外，極少表情。

他穿着一件道地俄國式白布上衣，不束皮帶，一無勳章之類。說話極快。回答起問題來好像不加思索，非常坦白。我先問他肯否答覆一個與他私人有關的問題。他並不拒絕，我就問他：『你爲什麼一開頭就成爲一個共產黨員？』

他立即回答道：『經過是一言難盡。第一，一人先相信現狀錯誤而不合公道。然後他立志盡力所能改革它們。在沙皇統治之下，凡是真欲幫助人民的舉動，無不認爲大逆不道。這人覺得日夕爲政府所緝捕，當作革命黨辦。』

『目前俄國之所以共產黨員特多，是因爲俄國的資本主義十惡不赦，冠於全世界。沙皇政府又是最腐敗無能，窮兇極惡。就連最性情溫良之人也成爲革命人物。沙皇政府不但要拘囚社會主義者和其

產黨員，就連對於反對沙皇官吏爲非作惡之人，也認爲罪無可逃。甚至於富人和深受教育之士，只要一反對貪官污吏，也要入獄坐牢。

『布爾塞維克黨人是唯一有着清楚明白救世濟民方案的，故人人傾心，如衆星拱月。人民目擊布爾塞維克黨人爲他們理想而入獄捐生。普通人民就此受了傳染，自己也成爲革命家。』

史太林又說他自己的情形，是他目擊處處地方不公平，結論是欲謀改革，只有完全消滅沙皇統治。他覺得列寧領導的社會民主黨布爾塞維克（多數）派有其最合於完成這個目的的政綱，於是投身於這個運動，生死以之。

沙皇治下的悲慘情形，史太林幼時就憎恨之至。他一落地就是貧苦。一家人住在崎嶇不毛的高加索山脈中央的小村戈里，離鐵佛力斯省會不遠。父親叫維沙里翁第格希維里，祖先務農，他的行業是鞋匠。他在史太林幼時每日在小鞋廠裏工作到十小時十二小時，每月收入不過幾盧布。母親叫伊卡脫玲娜，母家原爲農奴。一家住在一個小房子裏，史太林的一個同學描寫得好：『不過五碼見方，連接灶間。開門就是院子，連階沿也沒有，地上是磚頭鋪成，小小窗戶裏透進一點亮光來，家具只有一隻小桌一隻椅子，還有一隻沙發，那是船上吊鋪之類的東西，蓋着一個草蓆。』房租一月一個半盧布。在這裏生出的頭三個小孩，個個夭折掉。

這就是一八七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史太林落地的背景。他的名字是約瑟。

他的老母親和我講起過他的幼年。那是一九二七年我旅行到鐵佛力斯，和她作了一次長談。那年

她六十八歲，住在一個大宅的一落，這宅子本屬於沙皇總督。她穿着老式喬治亞服裝，頭上掛着兩條鬚髮。她的臉上流露着一副堅強有意志力和莊嚴的樣子。

他叫史太林爲沙沙，顯然頗以此佳兒爲豪。他小時候讀書非常穎悟，『做什麼都比別人家孩子高出一頭。』他雖然身體不好，還是努力稱強，因爲家貧，營養不足，多病多痛，七歲那年出天花，落得一臉麻子。

老母親說史太林幼年最有興趣的事情是思考與讀書，雖然父親並不關心政治，兒子却頗受秘密政治團體吸引。兒子十歲時父親工作回來說身體不大舒服，上床去睡就此長眠不醒。留下孤兒寡婦，一貧如洗。但是做母親的爲人縫紉，每天直做到深更半夜，賴此過活，並且千省萬省，省下點錢來以備兒子的教育之費。她立志要使兒子受到教育，成一教士。

一八九四年史太林畢業於戈里傳道學校，獲有獎狀。他母親使他入鐵佛力斯神學院，自己還遷至省會，以便與兒子同在一起。其時他年方十四。學院裏的教訓使他憎惡；僧侶想同時教他尊敬沙皇，教會與私有財產。結果他什麼也不信。有一個同學記當年情形道：

『我同約瑟談起上帝來，他聽我講完，沉默半晌，說：「你可知道他們在騙我們，那裏有什麼上帝。」我說「沙沙，你怎麼好說這種話！」他就說：「我來借一本書給你看看，這書會告訴你世界和一切生物，都與你所想像的完全不同。關於上帝的一切議論，都是胡說八道。」』

史太林借給他的一本書是達爾文之作，在俄國當時是禁書。

學生四圍密佈着一個間諜網。史太林深感神學院之使他成爲革命家而非教士。『我之成爲革命者，是因爲神學院的規矩紀律特點，使我憤怒。這地方滋生繁養着陰謀詭計，害人賣友。九點鐘我們聚集吃早茶，茶畢回到房間，但見所有抽屜已經翻過。而正如他們的天天檢查我們的文字書籍，他們又天天檢查我們的靈魂，我實在忍受不住，什麼事情都使我怒從心頭起。』

許多次搜查目的，是在於搜查學生中有無在『卑賤圖書館』裏拿來的書籍。這圖書館原來嚴禁學生入內。神學院的品行簿上，對於史太林有下列幾項：一八九六年十月『沒收雨果之海上苦工，罰入地下室甚久。前曾爲他閱雨果之九十三天，嚴予警告。』一八九七年三月，『發覺第吉格希維里在小禮拜堂階梯上讀各國文學進化。此爲發覺他向「卑賤圖書館」借讀書籍之第十三次。奉神父拉克安之命，幽禁他於懲戒地室，爲時甚久，並予嚴厲警告。』又記：一八九八年十二月十六日，此少年反抗重複搜查，對當局者『倔強不敬。』

事實是史太林在神學院的第一年，就受了國家主義與馬克思主義者秘密集團的影響，這些集團在殘暴紀律的刺戟之下，密佈於學生團體週圍。閱讀結果，使他傾向於馬克思主義。進學院不到一年，他就正式加入喬治亞馬克思主義團體。兩年之後，他成爲俄羅斯社會民主黨鐵佛力斯支部黨員，就在這個早期，列寧的著作已經使他印象極深。當時的一個友人回憶說：史太林讀過列寧的一篇文章之後，曾謂『我非見他一見不可。』

少年史太林不久就參加校外種種活動。他出席非法的工人集會，發表演說，寫小冊子，組織職工

會。他是一張秘密學生日報的主持人。他稱鐵佛力斯的工人爲他的最初教師，說：「一八九八年我初次主持來自鐵路工廠的工人研究團。就在這些同志之中，我初受革命洗禮。」史太林的態度是：雖然他比共事的人多受一點教育，但他們知道的人生實際，比他豐富。他的成功多得力於此。

神學院當局在警察協助之下，對於「政治嫌疑犯」注意不懈，史太林的活動範圍日廣，他們就接到他在幹點什麼的可驚報告。他對於當局徒勞無補的方圖打擊他精神之舉愈益不耐。有一次學院主任第密屈理神父在搜查之後光臨史太林房間時，這位學生竟自願繼續閱讀，不管來者是誰。神父就說：「你不知道在你面前的是誰嗎？」史太林立起來，眼珠一轉，說：「我只看見眼前有一個黑影。」於是在一八九九年五月二十七日，第密屈理就向校務會議提出，「開除政治上大逆不道的約瑟第吉格希維理。」兩天以後實行開除，不過正式理由是不交學費考試缺席。

在這時候，史太林在鐵佛力斯天文台謀得一職業以自給。這工作是通宵不眠，每隔若干時刻用精微器械觀察天象。這是個無人願就的苦役，但在他却可藉以爲生，繼續爲革命努力。一等到有辦法生活，他就辭職而盡全力於馬克思主義運動。

高加索的社會民主運動不久分裂爲兩派，多數派主張只在合法範圍之內活動，少數派以史太林爲首，認爲用合法手段的話，對於沙皇政權不能作有效打擊。有一次史太林問一個朋友，多數派裏邊到底在教導點什麼，那朋友直言相告，說教的是種種科學事實，如太陽怎樣運行。史太林就微笑駁斥道：「朋友，莫爲太陽擔心事；太陽不會出軌的。你應該學學的是革命應該怎樣運行，幫助我佈置一

個秘密的印刷廠罷。」

列寧對於史太林的影響，在一個緊要關頭再度發生。列寧的一個同事維克多庫納安夫斯基，於一九〇〇年秋到了鐵佛力斯，隨即成爲史太林的朋友。幾個月後，列寧的報紙『火花』最初幾份到了鐵佛力斯。這的確成了高加索的『火花』。工人發生罷工，使鐵佛力斯的鐵路工廠與工場工作停頓。一九〇一年的五月節，在史太林組織領導之下，在鐵佛力斯中心舉行遊行，使他成爲這一區最著名的革命領袖。沙皇的秘密警察已經注意到他，及一九〇一年三月下通緝令之後，他就潛身作地下工作。

史太林自投身革命運動時起，就日夕想辦一張不經檢查的秘密報紙。至一九〇一年九月，一張由史太林及幾個社會民主黨員合辦的報紙名『奮鬥』者終於出版。印刷機就在他自己寓所，爲了暗藏印刷機，他特意租了一間沒有窗戶的房子，有兩個門戶，一個雙重的門，鎖好着裝出從未進出樣子。在內門與外門之間，掛着衣服，使樣子像個貯藏室。因爲秘密之故，有些農人竟以爲史太林在私印鈔票。當他們帶着疑心來看他時，史太林的答覆是：『我並不在偽造鈔票，而在印刷書刊，陳述你們的悲苦。』農民們大爲感動，熱心幫忙。其中有一個名叫喀星的常常把報紙小冊藏在菜籃水菓籃子裏，悄悄送給農人或工人顧客。報刊文字用阿美尼亞文，喬治亞文，俄羅斯文的都有。

史太林才具卓越，瞬即被派組織巴頓市。他的組織中有種種民族，如阿美尼亞人，阿札巴尼亞人，俄羅斯人。這一點對於他大概大有影響，形成他的民族問題觀，對於團結上百個民族於蘇聯之內，極關重要。他組織了好幾次罷工，領導了好幾次罷工。警察四處捉人，被捕者不少。史太林爲答

復警察壓迫，就以示威遊行要求釋放被捕者。政府的答復是再捉遊行三百人。第二天史太林更領導一個更大規模的罷工，包括船塢工人鐵路工人工廠工人。警察開槍，死者十多人，傷者五十四人，史太林雖未遭難，却扶了一個受傷者到自己家裏。一個月後被發覺被捕，囚於巴頓，再解赫赫有名的庫太斯監獄。一九〇三年十月底，被判三年，流放於東西伯利亞之伊爾庫次克省。

在焦急憤怒之中，他流亡了不過幾月。他潛逃出來，回至巴頓，繼續工作。現在他一方面加意戒備，一方面却較前更勇，他丟下父親的姓，改姓科巴，戴維，契契夫等，名則只用一個，即史太林，義為鋼鐵，正與他的性格相合。

一九〇四年十月，史太林為鐵佛力斯的一次布爾塞維克會議主席。一月之後，名垂史冊的巴庫罷工發生。罷工大獲全勝，使巴庫工人獲一得集體與資方談判的協定，為俄國勞工運動創一新記錄。此乃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先聲之一。全俄人心惶惶。史太林創辦一『普羅』日報，自任編輯。在論說中他籲請一切工農不論民族共為自由而奮鬥。一九〇五年的一個星期日，沙皇軍隊屠殺聖彼得堡工人千有餘名，造成一個『血星期日』，第二天普羅報上就論說革命已如火燎原，遍及全俄，瞬將勢如洪流，沖盡一切腐臭，包括沙俄貴族在內。

史太林對於他視為犯因循坐誤與機會主義罪惡者猛烈攻擊。史太林的一個友人曾述史太林在這時候的一次演說，謂科巴同志步上講台，向聽眾致詞道：『你們有一個壞習慣，我必須明白警告你們。不論誰走上前來，不論他說點什麼，你們總是熱烈歡呼。如果他說自由萬歲，你們鼓掌。如果他說革

命萬歲，你們鼓掌。這原不錯。但當有人前來說打倒武力，你們也是鼓掌。沒有武力革命怎能成功？喊打倒武力之人所選擇的是那種革命？他也許是個托爾斯泰主義者，而非革命家。不管他是什麼，他總是革命與人民自由的罪人……我們如真想勝利，最需要的是什麼？我們需要三樣東西，請你們明白而牢記心頭。第一是武力，第二是武力，第三還是武力。」

這一點像我這種目擊沙皇治下之俄國的人，確乎極易了解。工人每天工作到十二至十八小時之久，而工錢不過七八盧布（合美金不過三四元），熟練的金屬工人，所得也不過三十五盧布。士兵月餉僅五十戈貝克（三角五分美金）。沒有保障工人的法律，法律嚴禁組織職工會。我在服務的土耳其斯坦，識字之人僅佔百分之七，這些鳳毛麟角之士，又只許閱讀審查過的『安全』書籍。

雖然一九〇五年的革命由如此慘狀所激起，竟亦為當局所摧毀。『麵包與公道』的要求一時被抑止，反動無所不用其極。在高加索，秘密警察破獲了秘密印刷所，原為史太林所設，印行日報，列寧的著作及書籍者。第二天鐵佛力斯報上有一篇記載，可見史太林如何巧計掩護印刷所的一斑：

『在一所空無人居的房子院落中……離市立傳染病院約一五〇步至二百步之遙，發現一井，深約七丈，可以繩索或滑車下降。降到五丈左右，有一走道，通另一井，中有一梯，高約三丈五呎，可由此到一地室，位在這所房子的地窖之下。在此地室之中，發現設備完全的印刷所，有四十架俄文喬治亞文與阿美尼亞文鉛字，一架手搖機，價值在一千五百至兩千盧布之間。另有各種酸與爆炸藥品及其他製造炸彈用具，大量違禁書籍，各隊伍與政府機關的印章……裝有乙炔燈，與電氣通信設備……』

編輯室已封。因發現這秘密印刷所種種方向分佈的電線，故曾經發掘，希望能發現其他地下密室。」
一個少年來鐵佛力斯原預備成爲教士。他的先生，他的同學，工人，農民，沙皇警察與黑暗牢獄，終於使他成爲一個最卓越的革命家。

第三章 鋼鐵是這樣鍊成的

在一九〇五年革命的最後一戰失敗，劊子手動手殺人的時候，沙皇總以為帝國又在他的手裏，穩如泰山。但有人知道並不如此。一九〇五年的十月，史太林就寫過一本小冊子，裏邊有料事如神的預言：『一般的政治罷工正在動盪，其規模之大，不但為俄國史上所無，且為世界史上所僅見者，也許止於今日，未成為全國性的騷動——但即使如此，也只會以更大力量再度震撼全國於明日，發展為大規模武力行動，解決久存於俄國人民與沙皇貴族之間的衝突，打出那個惡毒妖怪的腦髓……全國紛起的武力行動——這是置於俄國無產階級之前，嚴令其完成的大業！』

布爾塞維克即社會民主黨列寧一派重新組織他們力量，所欲完成的大業就是這個。為此目的而舉行的三個會議，有兩個非在國外不可。為了出席會議，史太林才初出國門。一九〇五年十二月舉行的第一次全俄布爾塞維克會議，召開於時為俄帝國一部份的芬蘭之坦默福，史太林為外高加索組織代表。一九〇六年在瑞典斯托克荷蒙舉行的社會民主黨大會，史太林大為活動，於一九〇七年五月在倫敦舉行的會議上亦然。在斯托克荷蒙會議席上，門塞維克派認為在俄國資本主義民主必先於社會主義。史太林則認為工人或資本家必有其一居領導地位，如工人取得政權，社會主義即可實現。就在這次會議席上，史太林初晤伏羅希洛夫，他和史太林同返高加索，協助組織巴庫油工。到這時候，史太

林被舉為外高加索全區的布爾塞維克黨領袖。

在倫敦會議席上，布爾塞維克是唯一一大集團，在每一重要問題上均佔多數。回國之後，史太林發表他的『代表紀事』，內云會議的最有意義之點，是團結俄羅斯社會民主黨於布爾塞維克政綱之下，由列寧指導，其次的成就，為遵照嚴格的社會主義階級政策，拒絕機會主義。

高加索無機會主義容身之地。史太林述其情形如下：『罪惡昭彰的沙皇貴族，使我國瀕於滅亡之境。一億農民的奄奄待斃，工人的受盡壓迫與貧困萬狀，不可收拾的國債與苛捐雜稅，全國人民的權利毫無，加於一切生活方面永無已時的暴虐，公民生命財產的絕無絲毫保障——就是俄國所存在的可怖圖照。這不能長此以往。造成這個慘狀的帝室貴族，必須打倒。』

在高加索本身，一個如火如荼的地下內戰正在繼續。單在鐵佛力斯與庫太斯兩省，一九〇七年一年之中就有三千以上人民被捕流放，政府機關殺人而兼暗殺。一九〇七年九月，一個黨領袖名掣勒者被綁遇害。史太林稱掣勒為『集農民的憂患重荷與無產者靈魂的火熱於一身之人。』為對付這種狀況計，議決凡沙皇法律概不遵守。高加索的黨需欸甚殷，工人認為他們有權取得由沙皇偷去的錢來作解放自己之用。

議決一批運到鐵佛力斯銀行來的金子應予截留，任其事者為史太林的從小朋友禿彼屈羅星，綽號卡馬的阿美尼亞人。

卡馬成了一種革命羅賓漢。他決不會由此一舉獲得好處，因為他靠五十戈貝克一天過活，吃過好

幾次官司苦不堪言。有兩次帶到絞刑台前，有一次掘好了葬身之地。在一次爆炸中炸出一隻眼珠來。在給秘密警察發現之後，他裝瘋達四年之久，在此期間，他受盡迫害，如把利針觸進指甲，把熱鐵燙到皮肉上，赤身關在冰冷地窖。四年之後，他鋸斷鐵窗與腳鐐，逃出牢籠。此後他奉命出國，購買軍火槍械以供革命之用，他買下運來，但不幸再度被捕。釋放之後又在俄國被捕，判處死刑後得減等，革命成功，始獲自由。

獲得革命基金的計劃，涉及一輛預定運二十五萬盧布至國家銀行的庫車。這車輛有兩名警察五名士兵保護。由卡馬爲首的這邊萬事皆備。十個武裝同志等候庫車，將開到時由幾個女人發出信號。

車子由馬隊簇擁而來，在塵灰蔽目中駛到廣場。革命黨丟去炸彈，爆炸了四個。兩名警察一個戈薩克兵倒在地上。馬大驚而奔，車子疾馳而去，一個黨員叫拔佳的飛奔上前，一個炸彈把車子炸停。拔佳被炸仆地。另一個扮作隊長同志一躍上車，攪得錢袋飛奔而去。

在同時，卡馬穿着一身軍官制服，在廣場上踱來踱去踱了一個早晨，不讓人民近前，免得傷及無辜。在卡馬指揮之下，所獲金錢就放進一隻由鐵佛力斯天文台主任管理的保險箱裏。

軍隊開到廣場，但革命黨人已經不知去向。一個月後，李維諾夫在巴黎被捕，因他正想把搶來的鈔票兌換法郎。

若干門塞維克派人和少數布爾塞維克派人斥責史太林的截劫金錢，並且謠傳門塞維克派要停止他黨籍若干時候。但列寧却始終支持他。史太林認這種局面是內戰之一，就按照戰爭規矩下他的決定。

從此之後，他的生活就是一連串被捕，拘囚，流放，奮鬥。他被捕拘囚過六次，逃走五次。從一九〇二年的第一次被捕，到革命勝利釋放，史太林過了七年又十一個月的牢獄與流放生涯。就在暫時自由的時候，他也常在追捕之中，為當局懸賞通緝。

但千辛萬苦不足以阻止他之成為有力的勞工組織者。他是巴庫油工會組織要員之一，於一九〇八年領導四萬七千人的大罷工。工人的要求為一增加工資，二承認工會，三有權舉行工人集會，四向經理部訴不平，原也平常合理。

一九〇八年三月他二次被捕，時正以「尼沙拉特支」假名工作。他被囚於巴庫的巴衣洛夫監獄，這監獄原只可容四百囚徒，現在塞着千五百名。就在縲絏之中，史太林還是繼續工作。秘密刊物 *Bankinsky Proletary* 第二期，大部份就在鐵窗下編輯而成。

與史太林同為政治犯拘囚一起的凡勒斯契卡，描寫牢獄為：「一個訓練革命專材的學校，一種宣傳機關，一個軍事大學。科巴在種種人物中顯出一個馬克思主義信徒。他穿着一件藍罩衫，敞開的領子，不繫帶子。不戴帽子，一塊頭巾，兩端分垂肩上。老是手不釋卷。身材比中等的高一點，走起路來慢慢的像一隻貓。人瘦瘦的，面孔輪廓分明，鼻子尖尖，眼睛不大，額角狹狹，略有縐紋。」

「這時候的史太林頑強不羈，不服從什麼規則，巴庫獄中的政治犯盡力想與不法之徒分開……科巴却公然蔑視習慣，始終與盜賊騙子為伍。他種薩克伐特力支兄弟同關一室，一個是偽造鈔票之徒，一個是著名的布爾塞維克。凡是活動之人，做過點什麼事情之人，總引他注意……」

「在夜裏有人要執行死刑時，全獄中一定騷擾不寧，緊張不睡，獨有科巴却靜靜的假寐養神……他在高加索享有列寧第二的大名。人人視他爲第一流馬克思主義專家。」

有一次政治犯反對獄中的無理規例，當局就迫他們在兩排士兵之間走過，士兵則以槍柄盡力打去。囚徒中十有八九拼命奔跑，史太林却不畏不縮，一卷在手的走着。後來他被流放到伏爾加達省。

逃脫之後，三次被捕，再逃之後，就往聖彼德堡，奉黨中央委員會之命，主持俄國局。列寧指名叫他就此要職，設法使他逃脫羈囚。在聖彼德堡他協助出版重要黨報真理報，並任編輯。黨在布勒格舉行的會議，已經開除了門塞維克派，新的革命洪流已經在望。真理報創刊號於一九一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出版，當天史太林就被捕。拘獄三月，流放於僻遠的納領之區三年。一九一二年九月一日他再脫逃，回至聖彼德堡。

他參加國會選舉，寫一小冊子名「聖彼德堡工人對於他們代表的委任」，在使黨獲得選舉勝利上得力不少。他的真理報編輯助手，在國會中領導布爾塞維克代表的人，就是莫洛托夫。

史太林曾經兩到海外，與列寧商討大計。第二次他留居國外兩月，著作他那本對於馬克思學說最有貢獻的大著：「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及殖民地問題」。在本書中他寫出民族學說的綱要，成立布爾塞維克解決民族問題的原則。他提倡俄羅斯帝國內各民族有權使用各自的語文，發展各自的文化，但堅主各民族工人如欲獲得勝利，祇有團結於一黨之內。列寧對這本著作大加賞識，故在革命成功之後，就任命史太林爲民族人民委員會委員。史太林受托爲黨起草解決民族問題的一切決議。

沙皇警察總督佈奸細爪牙於一切工人組織之內。其中有一個名馬林諾夫斯基者，狡猾過人，竟獲選為布爾塞維克中央委員。捉住史太林者就是這位委員。這一次當局特別仔細，嚴防史太林脫逃，把他解往吐魯干斯克的最偏僻地方。後來還怕他脫逃，再把他解到北極圈邊的庫拉卡村。在這裏於十分艱難的狀況之下，被防備得非常週密，在革命成功之後，始得自由。

另一個革命家薛威支曾經秘密前往，偷偷送一封黨的通知給他。最後的一百哩是個冰天雪地的荒野，坐的狗車，沿葉尼塞河前進。庫拉卡村只有十五所茅舍，史太林住的是最破敗一間。訪客到後的第一個舉動，是奔向河沿，把放在河冰窟窿中的釣竿拉起，背着一條大鱈魚回來。在這位遠客看來，「這房間就透露着史太林心上努力工作的氣息，他與外界的現實並不隔絕，桌上堆滿書報。屋角落裏有的是各種各式的漁獵工具，都是他自己做成的。」

沙皇政權在軍事上失敗，一切生活方面的日益紊亂，以及新起的革命潮流等四面夾攻之下，搖搖欲墮。一九一七年春終於崩潰，由克倫斯基為首的臨時政府繼政。

這次革命爆發之際，記者正在土耳其斯坦主持青年會工作。但見無數士兵工人農民擁擠通衢，高唱革命之歌，手執標語，上書：「自由平等與免費教育。」就在克倫斯基時代，蘇維埃已經是真正權力所在。蘇維埃不過是「會議」之意。這種組織早經存在，從醫藥人員「蘇維埃」至沙皇的部長「蘇維埃」。革命之後，兵士像工人在工廠農民在鄉村那樣的組織起蘇維埃來代表他們。所有蘇維埃都有代表在全國蘇維埃大會，如此大眾在大會裏的代表，就比在臨時政府裏更為直接。

起初布爾塞維克只佔少數。一九一七年六月，列寧在會致詞，這是他從瑞士返國以後的第一次演說。他力主耕者立刻有其田，工廠即國營，一切權力屬於蘇維埃。羣衆歡呼若狂。沙皇打倒之後，流放極北的史太林星夜趕回首都，重爲真理報編輯。在他的最初幾篇論說之中，他說：『我們必須撕下帝國主義者的面具，露出此次戰爭後面的真相給大衆看——但這是說對戰爭宣戰，使目前的戰爭不能繼續。』克倫斯基政府想繼續參加大戰下去，對於厭戰已極的人民，史太林的論說當然大受歡迎。

這時候身在俄國的我們，已知道當科尼洛夫於一九一七年八月進兵首都，想復辟的時候，權力已經誰屬。權力不在冬宮的克倫斯基與臨時政府，而在布爾塞維克的總部。臨時政府之不爲沙皇武力所顛覆，完全靠布爾塞維克之助。動員喀耶斯塔得布爾塞維克海軍者是列寧方面而非克倫斯基方面。拘獲反革命中心的四十二個將領者是布爾塞維克而非克倫斯基。派遣代表前往科尼洛夫的『野蠻師團』，說得他們相信他們正被利用作破壞蘇維埃工具者，是布爾塞維克而非克倫斯基。美國紅十字會會長湯普生，曾不吝傾其私囊百萬金圓以助克倫斯基的得安於位，英國會命他的軍官穿上俄國制服坐在科尼洛夫軍隊的坦克車裏。這些武人對於不肯衝殺紅軍的士兵以槍斃相恫嚇——而一切失敗。軍隊聞布爾塞維克賢名之後拒不作戰，科尼洛夫的叛變於是完結。

臨時政府的壽命不過一百九十七天。即在政權重心已自克倫斯基手中失去而不可復得時，他還是懵然不覺。我在布爾塞維克取得政權前一天見到過克倫斯基，問他有無布爾塞維克起事的危險。他指手划腳的回答我：『毫無。』第二天他就倉皇逃亡，一去不復返了。

布爾塞維克在各蘇維埃獲得多數，決定奪取政權。列寧受人歡呼歌頌，史太林却沒沒無聞的在指揮革命的陸海軍與工人。到十月七日政權入新的布爾塞維克政府之手，在當晚召開的第二屆全俄蘇維埃大會上，列寧就能說這樣的話了：『現在我們應進行社會主義秩序的建設了。』史太林在這新秩序中大露頭角，被重舉為黨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在中央委員會休會期間，處置一切問題者就是政治局。政治局是真正權力所在之處。自設局迄今，史太林始終為委員之一。同時他兼任真理報主筆，民族人民委員會委員。

革命已經成功，但國內仍有將領貴族與有產階級的反抗。而於革命存亡所繫的，却是世界各國政府對它深惡痛絕的敵意。革命政府的第一個問題，是怎樣停戰息爭，時至今日，即使蘇維埃政府無意於結束戰爭，俄國亦已無力繼續作戰。

一九一七年底，布爾塞維克政府請美國軍官駕臨邊境，以見俄國並無物資供給德國。羅賓斯上校攜此提議至聯合國軍事委員會，所得答復為：『布爾塞維克是盜賊，是謀財害命之徒，是德國爪牙。即使不是，他們也只能暫時當權。北方已有良好政府出現，白衛軍正從芬蘭前往。他們不過如一現的曇花，我們想你何必為這種政府出力。』布爾塞維克既不能獲得聯軍方面之助，就只得與德國開始和談。他們的第一目的，在於保全革命。

於是布爾塞維克上層的第一次分裂遂起。列寧史太林與斯佛特洛夫夫主張立即議和。一批『左派共產黨』集團，布哈林，拉狄克，派太柯夫則主張戰爭。另一批『左派共產黨』托洛斯基，則提議拒不

接受德國提出的不合公道之和平，但亦拒絕作戰。『不戰亦不和』的主張勝利，而只因托洛斯基向德國聲明過俄國將繼續復員，德軍就浩浩蕩蕩而來。黨中央委員會趕開緊急會議，列寧好不容易獲得一票之多數，決定不惜代價立求和平。列寧會謂：『和平條件固屬苛刻萬狀，但和平功罪歷史自有定論……讓我們着手於組織，組織，組織的工作。不論如何艱苦，前途是我們的。』

現在俄國已與德國言和。阿力克西夫，科尼洛夫，但尼金等沙皇將領着手為內戰而動員。德國據有烏克蘭。英美軍隊在茂曼斯克開始登陸。德軍將領高爾支邁往芬蘭，應孟納興之請為他摧毀芬蘭革命。聯軍於一九一八年四月起在海參威登陸。至翌年九月十五，在俄國遠東部份的軍隊，計美軍八四七七名，英軍一四二九名，法軍一〇七六名，意軍一四〇〇名，日軍六萬名。

在內憂外患期間史太林所擔任的工作，他自己形容為『打掃那個養牛三千頭三十年未嘗清掃一次的牛圈專家。』一九一八年五月，蘇維埃政府只佔有全國六分之一的土地，為生死存亡而血戰。伏羅希洛夫說過：『在一九一八與一九二〇年之間，史太林是唯一為黨奔走於各線，前往革命朝不保夕之處的人物。』

第一個地方是今名史太林格拉的沙力次因。這地方為白軍兵力集中之處，因佔領之後可以切斷蘇維埃與烏克蘭及巴庫的交通，無從獲得需要迫切的食糧與石油。史太林的第一步是肅清這裏的白軍。托洛斯基羽翼，任軍事指導主任的諾沙維區，投降敵人，但後來對於史太林的批評，却是：『我們對他必須公平合理，承認他的精力過人，足使老行政家稱羨不置。』他特別敬佩史太林的發覺叛徒之

力，說他對於叛徒的決定直截痛快得很：『槍斃。』

史太林的第二步是組織此城防禦，在這工作上就擴大了與托洛斯基之間原已勉強遮掩住的裂痕。托洛斯基對於史太林的工作懷有妬意，心有不悅，發一電報叫他不要干涉軍事參謀之事。史太林只在電報上批了個『不理他。』托洛斯基訴之於列寧，終將史太林調回。不過史太林已經掃清了那個牛圈，保全了沙力次因。

史太林奉命至貝姆，解決那邊紅軍的『慘狀』。一九一九年一月五日，史太林電告列寧，說貝姆情形壞極，非派去『三隊可靠兵士』不可。軍隊派到，紅軍得繼續作戰。等到局面轉危為安，史太林又去協助伏羅希洛夫，對付烏克蘭的但尼金。余登尼區在英國支持之下，向列寧格勒進兵。列寧擔心在對付但尼金方面不要減少力量，主張放棄列寧格勒。史太林却加反對。史太林奉命回來，保衛列寧格勒。戰績輝煌，榮受紅旗勳章。在讚美史太林的文告中，有幾句是：『在前線以身作則，不顧砲火，使蘇維埃共和國士兵聞風興起……』

在列寧格勒四郊作戰之際，史太林打給列寧一個滑稽氣味的電報，由此可見他作戰方法奇特的一斑。『海軍專家力言從海上佔領紅嶺，將推翻一切海軍科學。除了悲歎這種所謂科學之亡以外，他無所失。紅嶺之迅速佔領，是我這方面硬加干涉的結果。我們不願海陸軍命令，只願自己發號施令。我認為職責所在，應宣稱：我將繼續如此做去，雖然我很尊敬科學，也只得棄之不顧了。』

在東庫爾契克的敵軍已經擊潰，棄甲曳兵逃往烏拉爾山區，但但尼金繼續前進。時任陸軍部長的

托洛斯基，主張調回庫爾契克兵力，用以對付但尼金，史太林堅決反對，要求辭職。托洛斯基也以辭職相要挾。

史太林被派至危急萬狀的但尼金戰線，但在接受任命之前，他和列寧講好，不受托洛斯基干涉，他的第一步是否決業已下令的計劃：越頓絕壁進兵諾伏洛雪克。他對中央委員會說：『在此人心為敵的地區中間，在一不可能的前線，這種毫無意義的進兵，其將鑄成大錯，人人知之。』他的計劃是經卡科夫與頓尼茲盆地進擊洛斯托夫，頓尼茲盆地與卡科夫的工人，當能熱烈擁護共黨。他的進兵洛斯托夫理由如下：『1. 我們可佔領但尼金軍隊的最重要鐵路線。2. 我們可分裂他的軍隊為二。3. 如我的計劃成功，但尼金將被迫使戈薩克人後退，而此舉必大受戈薩克人反對。4. 此舉就是使我們佔有一切煤區，而但尼金則一無所有。』結末又說如這個計劃不被接受，『我在南線的工作變得毫無意義，作惡而無用，這使我有權，或不如說迫得我處處可去，甚至地獄也去，而決不能留在這裏。』結果如願以償，而但尼金之失敗，不過幾個星期的事情罷了。

史太林又奉命前往高加索，在那裏積勞成疾，只得調回，但一經病愈，立即出發參加波蘭之役，這一次雖然解放了基輔，成績不見太好，原因是列寧要進擊波蘭。史太林之不放棄蘭堡，為人批評，但大錯之成，却在於列寧的力主窮追波蘭軍隊直至華沙。波蘭之役而後，史太林於一九二〇年八月三日，出發往抗倫吉爾，此人受英國支持，北上進襲紅軍。但在史太林指揮之下的紅軍，却把倫吉爾軍隊殺得如落花流水，卒使蘇維埃政府轉危為安。

外國的干涉與資助支持反革命勢力，結果間接的恰得其反。想覺得大眾擁護反蘇的幻想粉碎無餘。在連遭打擊之下，蘇維埃反而力量日增地位日穩。一枝強大而經驗豐富的紅軍已經建立，史太林的鋼鐵已經煉成。

第四章 內 憂

俄國的內憂未已。戰時共產主義以其剩餘歸公制度，大為國人不滿，尤以農民為甚。一種能使農業貿易復甦的新政策，已為事實所必須。新政策應該怎樣的問題，引起內部的極不相同意見。托洛斯基及其左右的所謂『左翼共產黨』，『工人反對派』，主張『收緊圈子』，以武力徵收必須之物。史太林參加活動的多數，則主張任令農民得將生產品大部份自營買賣，因可促進經濟復興。後者的計劃為黨所接受，由列寧規劃，名為新經濟政策。但黨內的分裂却未嘗消除。

只要列寧在世，憑他的威權威望，黨內之爭可以解決而無害國家。即在今日，史太林還是說，『我只不過列寧一學生罷了。而終身為他的忠實學生，為我大願。』史太林始終敬仰列寧，而自從革命之後，他又與列寧日有接觸。在列寧方面，對於史太林的才幹也極為賞識，在一九一三年，寫信給高爾基時就提到：『一個卓越的喬治亞人。』

在坦默福舉行的布爾塞維克大會上，史太林初遇列寧。他對於這次見面的記述，字裏行間充滿敬佩之情：『我在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初遇列寧……我想見的是我黨之雄，一個偉人，不但政治上偉大，連身體也高大無比，因在我的想像之中，列寧是個巨人，威武動人。所以我一見他樣子極為平常，身長又在中人以下，一點也沒有異於常人之處，自然不免失望。』

「普通總以為偉人出席會議之類，一定遲到，以便教大家屏息以待，到偉人一來，就有人警告大家：噓，不要多響，他進來了！所以我一知道列寧比代表們先到，坐在角落裏和極普通代表親密交談，一點不裝模作樣時，自不免失望。老實說來，當時我真覺得他這種樣子未免與常情相反。」

「到後來我才明白這種簡樸……是身為新羣衆，節單平常的羣衆，平民庶人新領袖的列寧最大長處。」

史太林的學生大抵承認列寧的品性，對於史太林影響不小。

兩人一見之後，彼此的關係愈來愈爲密切，到列寧逝世幾個月之前爲止，絕無衝突不和之處。在革命初起之際，史太林的大部份時間就費在列寧的差遣上。當杜科寧將軍與軍隊總司令部拒不接受人民委員會命令時，史太林與列寧攜手並肩的在一起。列寧向軍隊士兵用無線電直接呼籲，使杜科寧終於失敗。列寧常命史太林處理極困難的工作。除了許多負責任的軍事使命之外，史太林又會奉命去解決過卡門尼夫未能解決的鐵路罷工。又會前往烏克蘭，對付雷大，恢復烏克蘭蘇維埃政府。這種種不是隨便任命。列寧對於史太林的成功大爲讚歎。所以不妨說自從革命之日起，史太林就是列寧左右手，列寧的替身。

列寧逝世之後，選誰繼任有目共覩。史太林始終是布爾塞維克，托洛斯基則一個時候是門塞維克，又是動搖不定分子，先與這黨後與那派。史太林是個不露鋒銜的政治組織大才，托洛斯基誠有演說寫作之才，但亦盲目自大。列寧病倒之前的最後一次舉動，是使史太林爲中央委員會書記長。列寧

死後，我會與共產黨上級幹部談話，他們說：『假定我們有一自由選擇，在史太林托洛斯基兩人中擇一選舉，一個有頭腦的人將選那一個？史太林之能建設一個更好的國家，人人共見，而他不會在國際革命上犧牲什麼。再則我們可以同史太林談談說說。他講道理，有理可喻，但托洛斯基如有一念，就無從使他改變。』

史太林在列寧未死之前，將鬥爭公而開之。他在一九二三年共黨大會上攻擊『托洛斯基主義』，以明與『列寧主義』之衝突。齊諾維夫與卡門尼夫，因不滿托洛斯基對他們在十月革命時的反對有所議論，暫時與托洛斯基為敵，所以在開始之際，托洛斯基地位不固。在托洛斯基與史太林之爭的後面，有不少重要的理論之爭。托洛斯基認為無世界革命俄國無建設社會主義可能，至少歐洲必須革命。史太林則深信社會主義可以單獨在俄國建立，靠外援勢必危險萬狀。

除此中心問題之外，還有種種一樣重要的問題。史太林對於農民態度久已關心。他報告說：『我們在鄉下的工作人員被農民所殺，居屋被燒……在有些地方，尤其是邊區地方，我們非與有組織強徒的活動作戰不可。我們非鎮壓喬治亞的真正農民暴動不可。』所以於一九二五年，史太林力主採取一種比較和緩的農民政策，說為取得中農的同情，絕對須行此政策。對此主張，時任最高蘇維埃主席的加里寧，任總理的雷科夫，均熱烈贊成，由黨認可。但齊諾維夫與卡門尼夫却加入反對派，說史太林與贊成他的多數，都放棄了共產主義，又認為政治局權力過大，應該削減。托洛斯基為多數派一員時，幫同制定多數統治的嚴厲規定：現在他成了少數分子，却要求黨內有更多自由了。

一九二五年的會議之後，史太林發一警告：『黨需團結，如卡門尼夫與齊諾維夫願意團結，黨可有他們而得團結，如他們不欲團結，則黨可不愛他們而團結。』可是所有失敗的領袖，却開始煽動，希望增加爪牙。但照黨規，大部由列寧制定，托洛斯基先前也和史太林一樣擁護的黨規，一經多數決定，人人有擁護服從之責。此即『集權主義的民主』，凡不如此者視為叛徒。但托洛斯基及其徒從，却拒不肯服從他們自己的規則。他們成立一秘密組織，有秘密印刷。一九二六年下半年，他們往訪列寧格勒莫斯科的工廠，以求獲得工人的擁護。

一九二六年我和史太林談話時，他解說他對於民主集權主義的見解。我問他：『按照共產黨黨規，黨由主持其事者決定一個問題之後，少數派就不許起而反對多數。我們大家知道多數有時錯誤，少數有時正確。錯誤的多數派決定，怎樣能够糾正呢？』

史太林的答復是：『我們是一個幾百萬人民的戰時黨。一個作戰的黨必須執行其決議，不能降而為一個討論俱樂部。在會議時候，在選舉代表出席會議之前，意見完全自由。但決定一經達到，就不再是多數少數的問題，而是使人人努力於實行決定，不能重新討論。』

『俄國人歡喜討論，私人對每一事件討論不已，但決定既下之後，就不許有任何行動來反對。當然，局勢會得變動，隨使那一城市可以在隨使什麼時候要求重新考慮整個問題。中央委員會於是決定是否宜於重新考慮，如以為宜，就重加討論，由多數派決定。』

『例如一九二〇年時，中央委員會對於工會問題分成兩派，經討論而獲得解決。一九二五年，列

寧格勒要求有反對中央決議之權，准予所請。會議結果，多數擁護中央委員會。齊諾維夫還想繼續討論，但黨告訴他這是非法之舉。」

我就進一步問他：「隨着時間的前進，你們的黨政治更爲根深柢固之後，你想你們會准許更多的討論自由嗎？」

史太林說：「不，只有討論減少的可能，因爲我們的領袖們經驗既多，自會比前聰明，知道怎樣應付問題。但在另一方面，文字上的批評大概要比現在自由得多，尤其是在期刊上。這種批評有益無害。不過一個政府只能有一個目的，必須知道其政策是什麼，必須努力實行。」

反對派知道大勢已去，就函告中央委員會，說此後當服從多數決議。但言而無信。在一九二六年召開的五屆會議上，史太林嚴詞攻擊托洛斯基及反對派，斥他們欲使黨依賴世界革命，主張以武力對付農民，意圖削弱中央委員會的地位與威權。會議上認此說爲然。

在一九二七年，蘇聯的國際地位又見動搖。英國政府於五月中搜查倫敦的蘇聯貿易處。不過一月之後，蘇聯駐波蘭大使伏科夫被暗殺。不久在德國中國的使館無故被抄。史太林就說：「一種從張伯倫到托洛斯基的聯合陣線正在組織中。」

一九二七年我訪問史太林時，他嚴詞指摘托洛斯基的派系戰術，他的反對社會主義工業化。幾個月後，他爲中央委員會發言，宣布對於托洛斯基反對所引起的問題，舉行全體討論及表決。托洛斯基派一敗塗地：七十二萬四千黨員擁護史太林與中央委員會，支持反對派者僅四千。不過直到托洛斯基

與齊諾維夫派於革命紀念日行舉示威，這才採取最後行動。史太林要求開除托洛斯基與齊諾維夫黨籍，通過實行。

從歷史觀點而言，這一年還發生一件更重要的大事，就是十二月舉行的五屆黨大會上，決議五年計劃，這計劃就表示蘇聯已決心以一種政策建設俄國，而不策動世界革命。這從開端就是史太林的政策。

第五章 革命之劍

到一九三三年，有三大事件影響史太林治下的俄國政策，意義深長。史太林久以爲俄國的得救在於工業化而不吝任何代價。一九三三年第一次五年計劃成功，開始第二個五年計劃，預期至一九三七年時擴充生產至九百三十億盧布。

史太林久以爲俄國應與愛好和平的國家保持友誼，在一九三三年羅斯福治下的美國承認蘇聯，恢復了美蘇之間的長期痼疾。最後是史太林雖然希望並需要和平，但相信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歷史仍是向這個覆轍前進：對確已富庶但是羸弱的蘇聯進攻。渴欲取得烏克蘭之麥與高加索之油的希特勒，正於一九三三年執德國大權。此後十年的局勢已不難逆睹。史太林的盡全力建設蘇聯與愛好和平的國家合作，自有深遠重大的影響。

希特勒的崛起，是表示反對史太林與社會主義的重訂與加緊工作。德國的參謀本部，在魏馬共和國時代即已自由活動，在希特勒執政之前就已密派間諜潛入俄國。間諜人數隨德國軍備之日增而增。仇視社會主義及其一切工作的舊俄財主與貴族，與德國間諜狼狽爲奸。黨內的反對分子，信另一次大戰必不可免，但信俄國必敗無疑，以爲與德國波蘭或日本勾結，可以取得政權。

托洛斯基齊諾維夫運動的殘餘勢力，始終與史太林所主張黨所批准的政策相反對。雷科夫一派猛

烈反對集體農場。工廠礦場裏的陰謀破壞開始發生。法國名作家巴比塞在這時候旅行蘇聯，有這樣觀察：「多可怕的暗中活動，多可怕的計劃與密謀！我對於親眼見到的文件攝影，迄今還是不安。好多年來，你能在蘇聯境內到處發現英法波羅的間諜細菌與毒計，和白色瘟疫狼狽勾結。迄今還有一部份存在。炸毀橋樑與公共物件的這些人，仍舊自由自在於俄國，透一口氣，再毀壞機器，使所餘無幾的火車頭不能開動——就是這些人物在一九三三年把玻璃屑放進食品中。」

史太林這時正在忍耐而慢慢的工作。對於力主槍斃托洛斯基的人，他說不如流放，接着把他驅逐出境。齊諾維夫卡門尼夫照黨紀與國法犯的是叛黨叛國大罪，却許他們悔過自新，給他們重要地位。他們的悔過不是真心，他們言而無信。

當齊諾維夫遂出列寧格勒黨組織之後，史太林派了最能幹的一個左右手基洛夫前往接替。基洛夫為政治局一員，大家認為將來繼承史太林的人物，當了列寧格勒蘇維埃的主席。他上任之後，就革新組織，更民主化而撤除舊有的階級區別——凡此種種，顯然得史太林的完全許可。他又力主將政治警察不再成爲獨立部門。這一點照他意見實行，改隸於內政部。許多原有的司法權力，改由法院接收。這是重要改革之一，許多重要的步驟，還在計劃之中。

接着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史太林得到基洛夫被暗殺的凶信。史太林到此遂忍無可忍。他覺得世界危機已愈來愈近，俄國的存亡繫於其建設能否繼續進行——除非採取堅決手段，建設的成功，俄國自衛的潛力，她在西歐的威望，均不免岌岌可危。

史太林的態度，可見之於早時所發的議論中。德國名作家盧特威格，曾問史太林他的治國何以如此之嚴刑峻罰，回答是因爲有一時期太個慈悲爲本了。他舉一事實爲證：當年克倫斯諾夫進兵列寧格勒被捕，其罪原應處死。但此人誓言不再興師動武，布爾塞維克就任他自由。他却立刻參加反革命，史太林說：「事情非常明顯：這種寬大爲懷的政策，正好破壞了我們盡全力而爲之的制度。」

一九二七年十月五日，史太林接見國外工人代表團時，所發言論，尤足表明他的觀念：

「政治警察是蘇聯政府的懲戒機關，相當於法國革命時的公安委員會。它懲戒的對象以間諜，陰謀者，恐怖分子，匪盜，投機，偽造貨幣文件者爲主。這組織產生於十月革命之後，產生於由國內外資本家出資的一切陰謀恐怖與間諜組織發覺之後。這組織發展鞏固於一連串恐怖行動之後，如謀殺列寧格勒革命委員會委員烏列次基，伏羅達斯基，及行刺列寧。必須承認政治警察仍舊組織如常，它從此成爲布爾喬亞的黑煞，革命的不倦禁衛，無產階級的利劍。」

「所以各國的布爾喬亞自然痛恨政治警察，對它虛構種種神話……革命的死敵咒詛它。可知政治警察的工作非常正當。」

「工人們對政治警察却不仇視。你到工廠區問問他們的感想，他們只表示尊敬。什麼道理？因爲他們被視作革命的忠實保衛者。……」

「解除革命的武裝而沒有革命的敵人也解除武裝的保證——豈非至愚，豈非對工人階級犯了罪惡？……」

「我的意思並不是說我國的內部局勢非有這種革命的懲戒組織不可。從內部局勢而論，革命已經穩固非常，可以無須政治警察。問題是國內的敵人並不是孤立無援的個人。他們千方百計與各國的資本家勾結，由他們千方百計的作後盾。我們是被資本主義國家團團圍住的國家。革命的內部敵人，是各國資本家的爪牙。資本主義國家是我們內敵的背景與基礎。我們與內敵作戰，我們也與各國的反革命分子作戰。請你們判斷一下看：在此局面之下，需要不需要這種懲戒組織？」

在二次大戰期間我旅行蘇聯，常常給政治警察查問。我就以這點稱頌他們的警覺性，辨別一個也許是間諜的外國人。每一次我總覺察政治警察的首領總是非常之人，總是訓練有素，博聞多識。只要我一出示美國護照與蘇聯外交部的許可證，無不立刻釋放。

基洛夫之死使史太林暫停自由政策，再回到革命期間與內戰之後時所必須的嚴竣政策。他決心使用一切方法，不讓國內有叛國之徒。

暗殺基洛夫的兇手，終於被捕。在審判中，他矢口否認有什麼同黨，但調查者深信他不過是反對派的工具。結果執行死刑，而追究繼續進行。齊諾維夫卡門尼夫及其他十一人被捕受審，控以教唆恐怖分子行兇之罪，結果宣判徒刑。

到了一九三六年，以別種證據之發現，再審齊諾維夫，卡門尼夫及其他十四人，控以叛國與恐怖行為。提出的證據看來幾近奇談，但被告一一招認。齊諾維夫在自白中坦白承認：「我為暗殺基洛夫組織的主犯，願受國法。」

到一九三七年，又有十七人受審，包括派太科夫、拉狄克、沙科爾尼科夫。一一招認不諱。處死刑者十三人。拉狄克與沙科爾尼科夫判徒刑多年。拉狄克在招供中述及紅軍之內亦有陰謀組織，牽涉了紅軍司令杜卡契夫斯基元帥。對於拉狄克的招認有罪，我並不覺得奇怪。一九三五年我會去莫斯科訪問過他，知道他是反對派集團。在談話之間，拉狄克說到『外交』是美國的最好期刊。像他這種人而有這種說法，頗出意外，到後來我知道托洛斯基剛好在這刊物上發表一篇文章。再談下去，我又有這個印象，就是他與流放在外的托洛斯基極為密切，這一點他或者有意要使我知道。

一九三七年六月，杜卡契夫斯基以下將領共八名受軍法審判，大都招認勾結外國——當時不透露國名——執行死刑。

至一九三九年，發生最後一次叛國案，被告包括前真理報編輯布哈林；雷科夫；前國務部副部長克勒斯丁斯基；前貿易部長盧申戈爾茲；前財政部長格林珂；前政治警察主任約戈大；克里姆林宮醫生雷文。這批人十九與反對派有瓜葛已達十餘年，只以寬大不究，仍令居高位，執大權，使他們有機會贖前愆——或陰謀破壞。

約戈大最是罪不容誅。他以身任政治警察，有權有勢，造成秘密恐怖。為揮霍而飲錢，私用公款。他恐嚇雷文如不聽他指揮，就要拘捕他的妻兒。雷文本以所受恐嚇報告當局，至於不久不能自拔，作惡愈多。配成毒藥供約戈大之用，因為身任官醫，得有非常機會為害國家。他害死兩大領袖，且為史太林親信的門辛斯基與庫璧也夫。

約戈大免職之後，由葉作夫繼任。當其罪惡未全發現之際，不過軟禁家內。他決意洩憤，且以爲狡計得逞，就與亦被撤職但未被捕的一個以前助手，密謀暗殺葉作夫。他們和水銀與酸，噴射葉作夫的辦公室七次。

後據專家報告，「根據地毯窗簾沙發等的化學分析，葉作夫同志辦公室中的空氣，以及他的小便與病徵，確爲呼吸水銀中毒無疑。」

另一證據又證明約戈大前曾毒死前任政治警察主任門辛斯基，遂得繼任其缺。審訊結果，約戈大及其他十七人全處死刑。

當時世界各處的觀察，以爲蘇聯內部充滿陰謀暗殺與清黨空氣。實際上這是皮相之見，因爲國外對於這幾次審訊雖然發狂似的注意，再也不關心蘇聯的其他事情，實則牽涉的不過少數人民，況在審訊期間的幾年之中，蘇聯曾有極偉大的進步。一方面對少數數人嚴刑峻罰，一方面大多數却得到更大的繁榮，更大的自由。

但這幾次審訊是重要的，雖然並不如許多專家所想的暴露了蘇聯弱點。在希特勒進攻之際，俄國沒有叛國之徒，不見有組織的第五縱隊。凡被德國征服的歐洲國家，無不有叛國之徒高居要津。現在已明白史太林早已掃除了賴伐爾式國賊。雖然或不免殃及無辜，但蘇聯總因而免遭大難。

前美國駐蘇大使台維斯，曾經旁聽蘇聯的審訊。他原爲訓練有素的律師，以其先入之見，不免反對蘇聯的司法程序。但他結論說被告有罪。謂事實證明：「被告中的要犯曾經彼此勾結密謀，與德日

協議在進攻蘇聯時給與協助。他們同意並實行計劃暗殺史太林與莫洛托夫，計劃在杜卡契夫斯基領導之下對克里姆林宮起兵變。在準備戰爭上，他們同意並實行計劃主持暗損工業，炸毀化學工廠，破壞煤礦，損害交通設備，及其他不軌行動。』

台維斯又說深信被告有罪者不僅他一人而已，凡是出席旁聽的各國大使，無不認為被告的罪無可逃，雖然對於判罪的重輕，所見不盡相同。

另一位著名法律家普力脫，為英國工黨議員，亦曾旁聽這幾次大獄的審訊，也認為被告的罪不容誅。他確信被告的招認不諱，是因為鐵證如山，使他們無從狡辯。

歐美有許多人士提及被告的供認不諱一點，他們說以常情而論，被告總不肯自白。他們說被告之招認，不是由於嚴刑逼供，就是想借此免於一死或使家人免於遭殃。

但證據完全使他們的假說不能成立。審訊是公開舉行，旁聽者有全世界人士。自始迄今並無絲毫證據，證明被告的曾受非刑。他們明知死在目前，但不自稱無罪，雖然全世界都願意相信他們的辯護。被告都是老革命家，在帝俄時代從未招供過想借以活命或免家人遭殃。英之普力脫美之台維斯均說被告絕不可能捏造供狀，恰與一切證據不謀而合。他們說被告不能够在事先演習一過，而在迅速進行的欲擒又縱司法手續中始終如一，即使他們爲了無人知道的理由，決心在這一劇中扮演一角。

至於何以肯供認不諱，是經驗告訴我們，在美國凡有鐵證在前的罪犯，很少不供認不諱。『自白』並不是俄國獨有之事。一九四四年俄國在卡科夫審訊納粹，記者會去旁聽，但見德國軍人對於十

惡不赦的大罪，在公開法庭上供認不諱。結果被處絞刑。還有一九二二年的英國工程師一案，被告也承認在工廠陰謀暗損。

事實是一切說自白均非真心的論調，全係推測之詞。布哈林在明知罪無可逃之際，供認了一切。他說他之招認並不由於毒藥或催眠術，或俄國脾氣，說：『控我有罪的證據是最大原因。三個月來我拒不發言。然後我開始承認。爲什麼？因爲在暗中我檢討了一番我的一生。當你問自己：「如你非死不可，你爲什麼而死？」時，一種漆黑的空虛忽然現於眼前，灼然可見。如人欲不悔不悟而死，就沒有什麼去死之道。而在另一方面，蘇聯境內的一切耀目事物，使人心上有了新的尺度。結果這使我無地自容，只得伏罪於黨與國家之前。』所有被告不完全承認有罪，但如罪證確鑿使法官認爲足以判罪時，也就毫不留情。看着美國報紙，很容易認爲蘇聯全境只有大獄與處死。但真相不是如此。蘇聯在這期間正在建設——工業化，整軍經武教育人民——比任何國家還要猛進。史太林對於消滅反對分子的勞心勞力，遠不及他的致力操心於他認爲必不可免的未來侵略俄國戰爭之準備。

第六章 史太林是獨裁嗎？

在大戰時期，許多人指邱吉爾爲獨裁者，反對羅斯福的人也以此證他。這名詞的意義顯然是因人而異。能否稱史太林爲獨裁者或否，全視獨裁這個字眼的定義怎樣。以美國人見解而論，史太林或者要比羅斯福獨裁一點，但非——這一點更爲重要——墨索里尼希特勒這種獨裁的獨裁。希特勒在理論上實際上是國之至尊，他的一聲一哼就是法律。一切德國人必須喊希特勒萬歲。他是國家的最高體現。而據共產黨理論，史太林只是共產運動的領袖，最重要的是大衆。

我們不妨借此檢討一下若干根本假設。在歐美，不論是對是錯，普通總認爲政治是與經濟及社會生活分離之物。在俄國，政治與經濟社會却密切相關，至於無從區別。

在英美，我們想到異黨分子或反對者就像自由已經在握。英美的民主是產生於有一羣個人力抗一個專斷力量力謀自由的時候。俄國的自由却源於個人之服從一羣的組織，得自一羣的鞏固。

美國的開國元勳，於一七七六年革命之中，在未開關的大陸上建設一個共和國。私人主動與個人擁有財產制，給與發展這個新國家以最迅速最實際的手段。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却須克服帝俄遺下的種種。生產與分配的根本工具，在於少數富豪之手，其中有破落的貴族與外國投資者。欲謀迅速的發展，唯有佔據全國資源爲全民謀福利的一法。

俄國與別國都力求爲人民謀福利，但手段彼此不同。別國想由個人的自由與主動而得自由幸福與人類福利。俄國却別開蹊徑，要由集團而達此目的。俄國人認爲除非給人民以實現『生活，自由，謀幸福』的條件，一切全是空談。

史太林在接見美國出版家霍華德時，曾表示過這個意見，他說：『真正的自由只能存在於沒有剝削的地方，沒有失業，沒有貧窮，人不必日夕擔心於明天的無工可做，無家可歸，無飯可吃。只有在這樣的社會之中，真正的——不是紙面上的——人與其他的自由始有可能。……我們的建設這種社會，並不是志在限制人類自由，而在於使人類個人可以感覺到真正的自由。我們建設這種社會，爲了真正的人的自由，沒有疑問號的自由。』

史太林雖然將與任何人一樣，點首承認這目的尙未達到，但自從獻身革命以來，他就深信蘇維埃制度之能存在，全靠表現出真實的爲大眾努力。這意思他在一九二六年向我表示過，我問他：『俄國法律上既然只許一黨存在，你怎麼知道大眾歡迎共產主義？』史太林直截而詳細的答復如下：『試舉俄國生活上的最重大運動，看看有無根據可以說大眾真正同情共產黨。』

『試先舉極重要的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運動時期，當時的共產黨，的確確以一個政黨言，公然號召工農推翻資產階級，當時這政黨大受工農兵的歡迎。當時的局面怎樣？當時的社會主義革命者與門塞維克，正與資產階級並肩攜手，執有權勢，當時的政治機構，不論中央地方，以及一千二百萬軍隊的指揮之權，無不在政府手上。共產黨處境還是半合法狀態。各國資產階級無不同聲預言布爾塞維

克黨之必歸崩潰。聯合國方面全力支持克倫斯基政府。雖然如此，共產黨無時無刻不號召無產階級推翻當時政府，成立無產階級專政。

『結果怎樣？後方前線的工人士兵，無不竭誠擁護共產黨——克倫斯基政府被推翻，無產階級政權成立，各國資產階級咒詛共產黨滅亡，在當時局勢之下，共產黨何以竟獲勝利？這難道還不足以證明勞苦大眾之歡迎共產黨？我以為足以證明。這是共產黨威信與影響在人民大眾之間的第一次試驗。』

『再舉第二個時期，外國干涉與內戰的時期，那時候英國佔領俄國北部，阿堪吉爾，茂曼斯克，那時候英法日佔據西伯利亞，擁科爾乞克至前線，那時候英法努力想佔領南俄，以但尼金與倫吉爾為爪牙。』

『這是強鄰與國內反革命軍人對付莫斯科共產政府，反對十月革命之成就的戰爭。在這時期，共產黨在大眾之間的力量與穩定，受到了最大試驗，而結果呢？大家知道內戰結果是由紅軍逐出外國佔領軍，擊敗反革命軍閥。』

『由此證明戰爭的勝敗決不繫於技術，這一點上但尼金與科爾乞克有的是外援。而決定於適切的政策，人民大眾的同情與後援。』

『共產黨當時的勝利是否出於偶然？當然不是。這事實是否足證俄國共產黨之大受人民歡迎？我以為是的。這是蘇聯共產黨的力量與地位穩固的第二次試驗。』

『現在且舉眼前（一九二六年）的時期，即內憂外患後的時期，這時候和平建設為當務之急。經

濟破敗時期已進而為工業恢復時期，後更進而為全國經濟以新技術為本的復興時期。現在不是有種種方法手段測驗共產黨的力量與地位穩固，決定共黨享有多少程度的大眾愛戴嗎？我認為是有的。

「先舉有近千萬無產階級的工會。先看各大工會的領導分子是誰。領導者之為共產黨員，是出於偶然的嗎？當然不是。若說蘇聯工人不管領導工會的人員是誰，那是笑話。

「蘇聯工人是在三次革命中長成起來，受到訓練的。他們比別國工人更知道試驗領袖，而如不滿於工會領袖為無產階級謀福利之舉，就會迫令他們去職。有一時期，我黨最得人心的人物是普拉卡諾夫（革命之前）。但當工人們知道他已經拋棄無產階級的地位，就毫不容情的視他如化外。如工人們深信共產黨員，選他們為工會負責人員，這就是直接證據，證明共產黨在蘇聯工人之中，有多麼的力量與地位。這是工人大眾對共產黨無可疑問的同情鐵證之一……」

「最後試舉不知多少次的會議討論，出席的有幾百萬男女工人，男女農人，各種蘇聯境內的民族。在西方國家對這許多會議意含輕視，說俄國人只知道坐而言。但在我們，各種會議與討論極有意義，藉此可知大眾的意思，指陳錯誤，及藉以糾正錯誤的方法。我們的錯誤不在少數，決不想諱疾忌醫，因為我們認為暴露錯誤，誠實糾正，是一個改善國家治理的最好方法。

「請看會議席上的發言演說。一注意工人農人們這些老百姓一本正經的出言吐語，注意採取的決議，你就知道共產黨的力量威望，決非任何國家的政黨所能及。這也就是共產黨地位穩固的另一種試

所以史太林的地位，是：爲被治者所心悅誠服的治人。這一點怎樣與蘇維埃政府實際相符合呢？我們可以政府與人民的行動方向加以評價，可由與產生他們的過去作一比較而判斷。如與帝俄比較，蘇聯是民主的。凡是親自研究過革命前後的人，決不否認今日的俄國遠不如帝制時代那樣獨裁。大家都說在蘇俄旅行不大方便，殊不知我在帝俄時代，秘密警察一天到晚追隨左右，一天換三次班。

蘇聯成立以來，就想逐步走上民主之路，雖然蘇聯領袖們決不想與英美民主如出一轍，因爲無論領袖人民，都不欲接受英美民主的根本觀。一九三六年的蘇聯憲法，流露着蘇聯民主的大旨。一九三五年史太林任憲法起草委員會主任。初稿擬定之後，發給大家分析與討論，印數達六百萬份之多。各種文字俱備。一萬家報紙登載全文，報紙的總銷數原達三千七百萬份。更在無線電台廣播，討論憲草的集會過五十萬。結果建議修正者有十三萬四千件。每一建議由委員會研究，有不少加入修正稿。數經修改之後，最後由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舉行的特別蘇維埃大會批准。這樣一種民主化的程序，英美等國就未嘗注意過。

這憲法爲十六個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聯盟所遵行，明白承認政府爲社會主義的。每一公民只可保有他自己可以使用的東西——家屋，車輛，個人所有之物，積蓄。他不能爲一己利益佔有或開發礦山油井森林工廠，換言之就是生產與分配的基本工具，這種種均屬於全體人民。

憲法保證公民有下列權利：

按照質量得報酬的工作之權。

休息閒暇之權——對『絕大多數人民』每日工作七小時，『假期工資照付。』

不愁病老之權，醫藥免費。

免費受教育之權。

不論種族平等之權。

信教自由之權。

組織自由——憲法特別規定工會，合作社，青年組織，體育與防身術組織，文化，技術科學團體，以及全蘇聯共產黨。

不受非法拘捕之權。

法律保障私宅之不受侵犯，私信之不受檢查。

法律保障有言論，新聞，集會，遊行自由，但只限於『增強社會主義制度者。』

在這種種權利之中，有若干尚未實行，有若干因戰事而暫停。例如工廠尚未全數實行七小時制，戰時規定延長。不過雖然如此，七小時制總是目標所在，遲早可以達到。目前實行的是八小時與休日照付工資制。

憲法也規定若干公民義務。身強力壯者必須工作。嚴格實行『不工作者不得食。』憲法又明定：『蘇聯每一公民的職責所在，是守衛與增益公共的社會主義的財產，視之為蘇維埃制度神聖不可侵犯的基礎，國家財富與力量之源，工作人民的富庶與文化之源。凡損害公共的社會主義的財產者，為人

民之敵。』

俄國人以此憲法爲世界最前進最民主的憲法，而認爲史太林首促其成，貢獻最多。事實上確有不少共產黨領袖，反對秘密投票與普選，因怕各民族中的落伍人民，不能善用反有危險。但史太林極力主張，大家也就接受。迄今爲止，受到普選之害者只有不盡職守的官吏。而防止官吏腐敗，正是史太林所馨香祝禱之事。

憲法對於政治機構的規定，包括大量人民的直接參加政治。若以爲只有少數共產黨員在主治國事，實與事實不符。俄國政府是許多蘇維埃的聯合。蘇維埃即會議之意。每一城鎮每一鄉村各有蘇維埃。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蘇維埃當然不僅負責道路學校救火會，且亦負責工廠店舖與家屋。蘇維埃會議通常爲期短促，因有代表在機關工廠或農場工作。各代表選出一個執行委員會，按照必要而常常集會，長時期討論。蘇維埃代表有被選民召回之可能，故必須常向選民報告。

在蘇聯約有七萬地方蘇維埃。地方之上有縣蘇維埃，區蘇維埃，省蘇維埃，地域蘇維埃，共和國蘇維埃。最高爲最高蘇維埃，四年選舉一次。最高蘇維埃分爲兩院。聯合院有代表六八二人，即每三十萬人民有代表一名。民族院有代表六五七名，即每一聯盟共和國有代表二十五人，每一自治共和國有代表十一名，每一自治區五人，每一民族地域一人。約略估計，最高蘇維埃議員之中，百分之二十四爲非共產黨員。

迄今爲止，這制度以在鄉村與小鎮市成績最佳，在這種地方，居民彼此相知有素。因有澈底的指

派代表秘密投票之權，在鄉村確有真正的民主。在小鎮以上的各高級蘇維埃包括最高蘇維埃在內，共產黨應有主治其事之意。因為以政治組織而論，只有共產黨獨享合法之權，因此往往只有一個候補人。其實未必如此。例如我本人就在許多城市，知道有好幾個市長候選人。美國商會會長莊士敦，也說過他旅行奧姆斯克時就有五個人競選市長。

史太林顯然歡迎這種趨勢。在一九三六年訪問他時，他曾說：「我早知有熱烈的選舉戰。我國的所有制度，少有徒有其名者。若干地方政府的失職，常常引起人民責問。你建設過一個優良學校沒有？改進過住屋情形沒有？你是官僚化嗎？你有否幫助過我們工作更見效率，我們的生活更爲文化？這是幾百萬人民衡量代表人的金科玉律，不合於此者逐出於候補人名單之外，另選賢能，……普遍，平等，直接而秘密的選舉，是蘇聯人民手中的鞭子，用以鞭策失職無能的政治機關。」

在城市裏，每一蘇維埃會員必須選擇一個他願參加工作的小組。小組的數目因地而異，列寧格勒多至八十五，頓河上的羅斯托夫不過二十二個，莫斯科則有：農事，防空，建築，公共經濟，通信，法院，檢察，警察與火政，文化，健身，房屋，地方工業與合作，地方貿易，溝渠，地下鐵路，撲滅成年文盲，財政，燃料，兒童，汽車與馬車交通，公共食堂，公共衛生，鐵路，公路，橋梁河岸，學校，去污，電燈，樹木公園，電車。本市的每一組織，亦可派一代表至每一小組，觀察參加工作。因此僅在莫斯科一市，參加政治者就有二千五百人左右。在公共衛生小組裏，當選代表爲六百人，代表與公共衛生相關的組織人員，又有一千以上。

這制度在有關市民的問題上，的確使市民大感興趣，競相參加。這制度的確成就了許多公衆事務。有一次莫斯科一小組開會，討論戰時缺糧問題，我在旁聽。人人有發言權，出言吐語並無文不對題之處，共黨領袖宣讀他的改良食物配給提議。他之受盡指摘，實爲各國政府代表所未嘗受到者。其中發言指摘的一位，足爲代表。他說：『這個提議之人是個官僚。他一點不知道排隊等領食品的情形。他的提議只是紙上談兵，一點不切實用。如他的太太也像平常老百姓一樣排隊，他就決不會有此提議。』別的人也相率指摘，毫不留情。討論爭辯達三小時，政府提議結果置之不理。另一個由代表提出修正的提議通過採用。這不是例外之舉，你隨便一讀普通蘇聯報紙，也不難發見常有類似情形。在這制度範圍之內，真有使別國人民羨煞的言論自由。這制度真正在名實雙方上使個人參加政治。

共產黨是主宰着政治機構。蘇聯有十三萬共產細胞組織，遍及每一蘇聯部門。從細胞起層層上行，由鎮，縣，市而國家委員會。黨的最高權力在於一年兩次的全聯大會。由全會議決的一切，按照民主集權原則，一切黨員全須服從。討論在決議之前，一經議決，不容再有異詞。大會選出中央委員會，爲閉會期間的最高權力所在，每兩月集會一次。中央委員會舉出黨秘書長與政治局局員九人，候補五名。在中央委員會休會期間，政治局負完全責任有完全權力，因此是最重要的個黨機構。

我在一九二六年與史太林談話時，曾問他：『保守人士說共產黨與政府是二而一一而二的東西，因爲兩者均由政治局所統治。此說到底有多少確實性？』

他微微一笑，答復說：『我們的黨治與外國的不同之點，只在於我們在光天化日之下做事，他們

却在偷偷摸摸進行。英國的保守黨有他的太上內閣，在美國，政治老板的勢力，有時候比堂堂當選的高官大吏還大。

『我疑心華盛頓是否並無所謂太上內閣高高在上。他們有時候是否秘密開會，討論大計。在這點上批評我黨之人，十有八九不是胡裏胡塗，就是假癡假呆。』

『外國人有什麼資格批評我們的政治局？政治局是由黨公開選舉，無人不知無人不曉，而在歐洲有的是太上內閣，美國又有政治老板，他們非由民選，然而竟在治民。這真笑話奇談！』

『讓我使你更明白一點真相。去年的全聯大會由六七三個投票代表，六四二個咨詢代表而成。大會選舉有六十三個執事的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會治理俄國。共產黨恰為俄國的執政黨，正如美國在聯合黨治理美國時一樣。黨決定大政方針。』

『例如中央委員會或許經一小時討論之後決定集中力量於工業化俄國，就是說新工廠必須建設。但人民委員會——等於歐美的部——在決定有關的實際問題及如何處理借債與信用上面，却也許要經過二十次會議。』

問到他何以只有共產黨始為合法政黨的問題，史太林的答復是：『共產黨在俄國的獨享合法之權，並非出於硬做與故意造成。這樣一個地位決不能由行政上的陰謀詭計來造成。我黨的獨佔出於自然，由於社會革命黨與門塞維克派之完全腐敗，脫離了我們社會生活這個史實而演成。』

『社會革命黨與門塞維克派的過去怎樣？他們是將資產階級影響輸入無產階級的轉運公司。在十

月革命之前，他們憑什麼而發展而存在？他們是憑資產階級的存在，最後是憑資產階級統治的存在而存在。等到資產階級推翻，這些政黨的立足之地自然隨之而失。十月革命之後他們怎麼樣？他們成了爲恢復資本主義推翻無產階級統治而盡力的政黨。他們在工農之間的力量地位，自然蕩焉無存。」

史太林在當時述及的情形，目前有許多已經變動。新憲法規定黨非政府，但爲唯一可以參與政治的政黨。理論上非黨員可當選任何職務，事實上有許多任職地方機關。不過黨仍在主治地位。近來發達滋長，力量大不可言。一九三二年時有黨員或候補者約三百萬人。十年之後，增至四百五十萬人。二次歐戰使黨員爲之激增，現在已達六百萬人以上。此外又有青年團團員一千五百萬，年齡在十六與二十三歲之間，以爲共產黨員的輔佐。是則實際上引導俄國命運之人，達二千一百萬。

誘導有專門特長的人物個個人入黨，爲共產黨的目的。在這點上，黨猶大學裏的兄弟會。黨致力收最好的領袖人物。不過俄國也有幾百萬同情共產黨而不入黨的人。入黨後即使不無特權，但亦微末得很，而責任義務却極重大。黨員必須在收入中付若干與黨；必須至少以每一星期的若干晚上爲黨務努力，一無報酬；黨員在日常生活與工作上必須足爲別人模範。如在工廠工作，他必須比非黨員工人多做事而少請假，如在前線作戰，他必須勇冠三軍。他如不盡職守爲非作惡，所受懲治嚴於他人，因爲黨員受有更重的付托，必須較常人更盡職守法。

黨比三五年前就已民主得多，由此可窺一般趨勢之一斑。不受規定的選舉與秘密投票已經實行。地方自治更見名實相符。杜拉格柏尼亞共產黨秘書長最近對我說起，爲了他們認爲理由正當，當地黨

部對於莫斯科方面對於行政上事情的指示，日益不以為意，莫斯科一度提名某甲為秘書長，但為當地黨員所反對，另選某乙。

今日的共產黨員人人可以向上級批評責怪，可以對上級加以批評指摘。不久以前的真理報曾登過一篇故事，足為這種情形的絕好例子。

有一女郎名盧卡維希尼柯娃者，不遠千里而去阿爾馬阿太往見共黨的區負責人，面商她在西米派萊丁斯克所受的獲得育兒所物品的困難。她旅程達十天之久，一路飽經風霜，到了黨部之後，却為負責者所渺視。盧姑娘說到我來看費德鄰同志，一位書記就厲聲厲色的問她有什麼事情。她就詳陳一切，並說千里而來，不是易事。所得答復是：『費德鄰同志今天不見客。』姑娘就問『那麼告訴我什麼時候再來？』『明天上午。』第二天去了和昨天一式一樣。這樣過了九天。黨部告訴她的是：『他忙得很。』『他在開會。』或者簡直是：『他不能分心他事，不要打攪他。』盧姑娘只好空手回去。但事情不能就此完結，她詳述經過，投寄真理報。報館調查經過，知道確有其事，就在第一版發表此文。盧姑娘不過普通黨員，費德鄰同志乃大區域黨領袖。但真理報盛讚盧姑娘，痛責費『官僚』。蘇聯的民主日見增加。以西方標準來看，俄國的民主大有缺點，但在俄國人看來，美國的失業與種族歧視，當然是美國民主的缺點。極有意義的事實是：俄國之有民主，遠在西方人士想像之上，史太林的統治，由日見增加的大家參加政治而生色。蘇聯領袖們十九相信只要蘇聯一旦得有永久的和平，那麼政府機噐自會似有若無，到時大多數人民自動負起公民責任，通常的政治形式就成贅物。

這也許是十年二十年之後的事情，但事實昭示，俄國只要不須獨裁制度，獨裁制度決不留戀。史太林在下面這句話裏表示出他的希望與信心：

『領袖來去生滅，而人民始終存在。不朽的只有人民。其他一切不過是一時之物。』

第七章 史太林的左右

莫斯科中心，紅廣場之旁，高踞黑大理石列寧墓之上，是克里姆林宮牆垣，乃蘇聯政權的重地。只有執有許可證的人始獲經過禁衛。蘇聯的政策——有時經過全國討論——在這地方決定。宮中昔日屬於沙皇的一個房間，由共黨最高委員會的政治局在此開會，主席者史太林。

觀史太林的左右之人如何，不難知其爲人與才能。觀乎政治局各委員的生活，可知史太林的爲人。大體而論，他們是剛毅精明的行政人才，具有完成職務的才幹。他們是熱烈的共產黨員，但他們之爲政治局委員，信仰之外仗工作成就。俄國歷史經驚濤駭浪，尤其是因內亂外患戰爭威脅而起的艱難，因之有時的着重忠實，有時的重視行政與組織才幹，一無足怪。但結局言之，史太林的選拔人物，究以他們的有貢獻於建設新俄國爲斷。

我曾經仔細研究過一百六十三位蘇聯的有名領袖。其中大多數出生於人口在一萬以上的城市，十分之六的家庭，不能認爲工農階級。他們爲革命觀念犧牲了不少。四分之一在年方二十一歲時就從事於過激活動，平均被捕過三次。他們熱烈如火，一得自由就立刻再爲革命努力。政治局委員就來自這個集團，這種經歷。

歐美人以有自由社會自由努力爲豪，誇稱最優秀人才居最高地位。殊不知蘇聯也有其競爭制度，

優勝劣敗。史太林左右的一般人物，公認爲能幹的行政家。他們的獲居高位，不是靠家世仗金錢，而是從頭幹起的奮鬥結果。蘇聯人口爲一億八千萬，一九四一年的公務人員爲一千二百萬——因生產分配權在國家——有此衆多的從政之人，怎能說政府人員爲世襲階級。

仔細研究所得，證明凡是只說不行之人，不是依然故我就是降級減薪，而起而實幹之人，却是步步高升，到了當局地位。某人也許是煽動家，能言善辯，但若非治事長才，他就不免於落伍，瞬即去職丟差。齊諾維夫有演說之才，談起世界革命來頭頭是道，但在實行上他就手足無措。又如拉狄克能文善辯，但不能委他辦事。又如布哈林理論上口若懸河，但不能冷靜賢明的分析局勢，力行不懈的澈底做去。拉狄克與布哈林的能說不能行，可舉一例爲證：在對德和會之後，他們計劃對德進行革命戰爭，雖然布爾塞維克當時之無拳無勇不能對德作戰，人所共知。其他類似人物，也就地位一落千丈。

迄今猶居領導地位的人物，是一千二百萬公務人員中最傑出之士。他們的職務艱鉅，而所得報酬無幾。他們得獎狀勳章，也許有城市以他們的名字命名。他們有公家汽車，富麗住宅，但他們的志得意滿之事，却在於建設一個新的俄國。最高當局之中，十九從下級地位做起，一步步上升。他們全爲信仰冒過生命之危。他們出俄國於混亂，使成爲世界三強之一。

這班人是誰？

第一是莫洛托夫，漂亮的老人，像大學教授而不像革命家。歷任要職，爲政治局委員之一。一九〇年三月九日生於庫卡克。年方十五，即在學生圈子裏從事革命活動。十六歲入黨。十九歲被捕，

放逐於伏爾戈達。釋放後去聖彼德堡，在共黨機關報星報與真理報編輯部工作。不久任編輯部書記，活動於議會的布爾塞維克派中。就在這時候，他協助史太林工作。從此之後，兩人私交甚厚，合作無間。大家知道莫洛托夫在大事上從未與史太林齟齬——不過從種種地方看來，莫洛托夫自有他的獨立精神。

在革命之前，莫洛托夫被捕放逐多次，但在自由之後，為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共同致力於取得政權。革命之後，任尼西尼——諾伏戈洛古柏尼亞執行委員會主席。成績卓越，二年中任烏克蘭黨秘書。在十全大會上，莫洛托夫當選為中央委員會委員。一九二六年以來，任政治局委員。

我見過莫洛托夫多次，每一次給我印象，總是有才幹而富判斷力。他一旦決定某一政策正確之後，就屹然不動，無法使之改變。一旦他有超乎外交詞令的話要說，就直言不隱。他有脾氣，但極力自制。美國一新聞記者知道這脾氣有時不可遏止。這記者有一次憤怒檢查員把他的新聞檢查掉，把原稿撕成片片向檢查員撒去。莫洛托夫下令驅逐這個記者出境，雖受盡外交壓力亦不肯收回成命。莫洛托夫以職長外交關係，比蘇聯其他領袖多有社交生活。他在莫斯科郊外有一美觀住宅，其夫人爲了與俄國新傳統相合致，每天像丈夫一樣的忙於工作。她極爲動人，任化粧品工業領袖之一。

另一位政治局委員是密科揚，阿美尼亞人，三十二歲時就任國外貿易部長。生於鐵佛力斯一窮苦工人家庭，二十歲就爲正式黨員。

革命發作之際，密科揚被派至巴庫工作，此後三年，在非常危險中過生活。一九一八年任軍隊委

員，在前線抵抗土耳其人。土軍佔領巴庫，密科揚一度被捕，但旋即釋放。後在英軍佔領巴庫時，又遭拘禁。他之得免於與其他二十六個政工人員同為英軍槍斃示衆，純出意外。他在獄中直到一九一九年因人民要求始獲釋放。二月之後，他在英軍佔領的巴庫市內，密謀罷工，事機不密，與罷工委員會委員全體被捕。在執行死刑之前他乘機脫逃，但又被捕。這一次捉住他的人不知道他是那一個，放逐出境了事。他却百折不撓，重去巴庫工作。一九一九年底他回莫斯科，報告高加索有革命可能，然後再去努力工作。蘇政府在高加索革命成功之後，不過幾年就選密科揚為黨中央委員。

雖經多少次被捕放逐，雖經多少年革命活動，密科揚却一無飽經憂患出生入死的樣子。他是個漂亮人物。頭腦不凡而富治事之才，使貿易部工作效能傑出。和他相對之人，無不有一見如故之感。他雖然說起話來直截痛快，不是娓娓而談，却不至使對方無話可說，索然離去。有一次我去訪他，一談談了二個多鐘頭。除了莫洛托夫之外，到過美國的部長只有此公。在談話中他盛道美國技術。他曾把製罐頭與冷藏食品的美國方法介紹到俄國。

現已逝世的加里寧，為蘇聯元首，政治局元老分子。生於農家，一八九六年就參加革命，此後俄國歷史上的每次大變，無不有他在內。一九〇五年革命之前，加里寧已備嘗拘禁流放之苦，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中，他躬與其役，擁護列寧。他在莫斯科做了一時期地下工作之後，到聖彼德堡為真理報編輯一分子，始與史太林相識，十月革命成功他出力不少，一九一九年當選為中央委員。

加里寧極為人民愛戴。對於幾百萬農民，他是農民高居政府要職的象徵。全蘇聯老百姓一有困難

不平與要求，就訴之於他。據說他每年寫信達八萬封，答復問題，給人指教，答應幫忙。我訪問過他多次，有一次他對我說：『我們要把蘇聯造成一個工農福利至上的國家。社會所有力量，必須盡用於此。我們的進步限於事實不免遲緩，但誰也不能加以阻礙，因為我們是以真理與正義在努力。』人人覺得他一言一語的出於深刻信仰，他所說的一切，無不含有一種精明和愛農人常識的氣味。

加里寧逝世之後，希佛尼克於一九四六年繼任最高蘇維埃主席，他是工會全聯主席，一九四四年時任最高蘇維埃副主席，各民族蘇維埃主席。然後辭去工會全聯之職。自一九三〇年來他就任全工聯秘書，在他領導之下，工會會員從一千二百萬人增至二千六百萬。一九四三年倫敦舉行不列顛工會大會，他來參加，在這裏我和他略作談話。他是不吸煙難得喝酒的人物。

白利亞為內政部長，保安警察就在他管轄之下。頭頂光光，鼻架眼鏡，難於接近，少見訪客。只有知道蘇聯在戰時的破壞間諜之絕無僅有者，才知道他是位治事有方的幹才。除了警務之外，他又兼管由罪犯作工的工廠。

政治局委員之中只有一個猶太種，此人即喀格諾維區。他是工業管理大才，往往任職艱巨。美善的莫斯科地下鐵路是他所建，又為莫斯科電車設計。他的成功大有助於擊潰德國。一八九三年生於烏克蘭，十九歲加入共產黨時正以做鞋為業。

最年輕的政治局委員是伏茨尼冉斯基，為史太林左右最傑出人物，一九〇三年生於杜拉省。在某一種意義上，他可說是後一輩蘇聯領袖的代表，因為他入黨時雖然年方十六，但已在革命之後，這在

蘇聯要人中是僅有情形。他早夜工作，戲院樂會中絕難見其踪跡。一九三八年起草第三次五年計劃者就是他。把工業重加分配，使邊內地是他之功，因而使德軍侵入俄國時無就地工業可資利用，成爲失敗之一因。一九三八年他又是國家設計委員會主席，爲全蘇責任最重之一人，因爲重建的計劃與組織大任，放在他的監督之下。

史太林繼承人是誰這個問題，曾引起不少興趣，且亦極爲重要。在許多方面，我人很懷疑有誰能單槍匹馬，代替史太林的地位，他像列寧一樣，地位實屬無雙。列寧是解決取得權力的問題，史太林是解決了鞏固蘇維埃國家地位的問題。地基已經打好，可由人去繼續建築大廈高樓。史太林必將名重史冊，爲打好地基之人，而在工作之際，又使德國受到空前的軍事失敗。

上述各人之中，以及軍事領袖，均不像會得繼承史太林。現已去世的日丹諾夫，本來被認爲極有在史太林百年之後領導蘇聯的可能。但不幸壯年逝世，自然不在話下了。

來日方長，上述各人物大概對蘇聯還會有更大貢獻。其他尚有若干大人物，非三言兩語所能盡述，如五十多歲的安德萊夫，身任共產黨監察委員會主席，有詳究黨務各方面之權，他又是聯邦蘇維埃主席，地位相等於美國參議院院長。另一位是史太林的前任私人秘書梅倫科夫。他是黨組織部長，負責選賢與能，使任要職。

如果說測驗一個領袖只要看他左右的爲人如何，那麼史太林可以試驗及格。蘇聯共黨領袖們的才具，和西方國家的政府大員比較起來，可說是有過之無不及。

第八章 有計劃的建設

因為俄國是農業爲重的國家，故蘇聯領袖的努力原有失敗之可能。他們談工業化，談計劃生產，談提高生活水準，在帝俄，革命與內戰遺下來的荒蕪飢餓之中談這談那，不免有癡人說夢之嫌。列寧高談電氣化，觀察家聞而搖頭，譏之爲電氣幻想。英國大作家威爾斯與列寧暢談，他爲文說到他所謂的『烏托邦』計劃後說：『我看不見在漆黑一團的俄國之中發生這類事情，但這個克里姆林宮中的矮個子，却能……』

從一九一九到一九二三年的蘇聯，真個是『漆黑一團』。帝俄時代進行的工業發展，是落伍萬分效率全無。只因爲貴族們深怕發展一個強有力的俄國中產階級，故工業大部份操在外人手中，他們只知道開發富饒資源，利用廉價勞力，那裏顧到俄國的福利。

全個俄國反映着統治者的因循苟且，外國資本家的只圖私利，普通的每日工作時間，十到十二小時，每年所得工資，平均二百五十五盧布，合美金六十三元餘。工人家室，照莫斯科市參議會描寫，是猶如『洞窟』，只有十分之二的城鎮有自來水。

內戰與外國干涉使經濟完全崩潰。工廠作坊因原料與燃料缺乏，只得停工。火車則軌道銹壞，一路上破物壞件，橋梁在作戰時被毀，即使行駛也無一定時刻，一定班次。農業破敗，至於無食物供給

城市。工業生產本來無幾，現又剩了五分之一。

布爾塞維克力謀復工，但受盡經理階級與技術人員的暗損。機器被毀，工廠被炸，誘人貪懶怠工。內憂之外加以外患，沒有一個國家肯與援助，肯借債投資。

沒有第三條路可走：不是國營聯營計劃生產就是革命失敗。所以一九一八至一九二〇年的極端戰時共產主義，促其成者實為資本主義。但單仗國營還不濟事。人民急需有一偉大的目標。他們切需知道在實際上俄國怎樣真能出幾百年來的水深火熱而登衽席。

列寧於一九二〇年寫過一信，其中有一句曰：『你能否擬一計劃（不是技術上的而是政治上的）為無產階級所能了解者？例如在十年（或五年？）之中我們要建設二十（或三十五十？）發電所，遍佈有這種發電網的全國……我們急需有這樣一個計劃，使大眾有光明在前努力以赴；而在十年（或二十年？）之內，我們就能電化全國，工業與農業一致電化。』

計劃擬就。史大林關於此事寫信給列寧說：『我提議：（一）莫為空談這計劃浪費一秒鐘，（二）立刻起而實行，（三）至少我們的三分之一為這着手實行而致力。』

一九二二年成立一委員會，為完全電化全國而設計，同年國家計劃委員會負責擬一計劃，以為全國整個經濟生活之用。一個大膽的實驗於以開始——世界史上空前的舉國計劃經濟。

這計劃開始的一年，我以美國賑災團一員資格往游蘇聯。前途未見樂觀。我自備一切食物。人民飢餓不得食。我住在莫斯科第一等旅館，而蟲蝨之多，至於夜不安枕。老鼠猖獗，奔跑不息。此後的

二十二個年頭，真完成了旋轉乾坤的大業。

此後的一切事情，是列寧史太林政策與計劃的當然結果，而他們之獲成功，全仗引起全俄人民的踴躍合作。舉國人民節衣縮食悉力以赴——不是爲了有燃眉之急的生活必需，而是爲了使全國經濟生活作根本改變的大業。

當局坦白昭告人民，前途之艱難辛苦，爲日方長。蘇聯領袖們深知如人民不願爲前途努力，一切無從實現——靠壓力無濟於事。急須成就之事，列寧在將死之際說得明明白白：『爲救俄國，不僅須要五穀豐收——僅此還不濟事。我們不僅需要能以農民所須的製品供給他們的輕工業——有此還是不足——我們非有重工業不可……倘不恢復發展我們的重工業，我們無從組織任何工業，而倘不組織工業，我們就不成爲獨立國家。』

進步甚慢，因爲一切的開端是從頭做起，無所憑藉。破敗狼籍的經濟，憑着中央計劃委員會一步一步的收拾縫綴，開始修補，到一九二二年，日軍出境山河全復的這一年，鐵路開始行駛，工廠重新開工，農業始獲復原。到一九二四年，工人農民漸入佳境，雖然失業仍衆，物價仍高。到一九二四年，恢復全國經濟的工作告成，工人的工資與生產增加。蘇聯力足以投資三億八千五百萬盧布於建設事業。

恢復的大功告成，史太林轉而致力於列寧所注意的發展重工業問題。蘇聯的資本日增，使幾個初步大計劃得以着手，如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亞鐵路，史太林格拉曳引車廠，汽車廠 A M O，世界注目的

聶伯水閘。到了一九二七年，蘇聯已能投資十億盧布於工業。三年之後，投資更五倍於此。蘇聯原則的試驗在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期間，其時世界各國正苦於經濟崩潰。在此期間，蘇聯的工業生產增加一倍。此後更與年俱增。

供給幾個五年計劃的基礎已經打好。第一個五年計劃決於一九二九年，在此五年之中，投資額為六百四十億。一百九十億供工業與電力發展，一百億作運輸發展，二百三十億用於農業。對此目標，史太林在蘇聯工業經理大會席上述其大旨：『至多在十年之內，我們必須趕上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我們有達此目的的一切「客觀」可能。所缺乏的只是好好利用這些可能的能力。而這就靠我們，只靠我們！』

蘇聯進行的規模奇大有計的工業革命，事屬空前，世界震驚。但在當時，世界各國只覺得有趣好笑而不以為奇。一九三二年十月的紐約泰晤士報，曾謂：『這不是計劃，這是投機。』別的則說這計劃，『永無成功之日。』可是這投機却在着着實行，遍施全俄。鋼鐵廠在馬格尼托戈斯克造起，汽車廠在莫斯科高爾基開工，火車龍頭廠在頓尼茲區域建設，機器化學廠在烏拉爾出現。由於踴躍奉公與強迫犧牲，第一個五年計劃四年即已完成。缺乏效率，技術落伍，良工不足，造成了無數困難。但是煤的產量到底從三千五百萬噸增加到了六千四百萬噸，油與生鐵倍增。

蘇聯領袖還要求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急不及待的空氣瀰漫全國，使工作完成迅速的方法百計尋求。史太林說明急需發展的理由如下：『俄國歷史是一篇因落後而遭殃的紀錄。他為蒙古汗所敗，為

土耳其統治者所敗，爲瑞典封建貴族所敗，爲波蘭立陶宛地主所敗，爲英法資本家所敗，爲日本軍閥所敗。人人把他打服——因其落後……」俄國誓不再受屈辱。史太林說黨必須常在動員狀態，以求完成第二次五年計劃。

第二次五年計劃的目標，是要把生產增加到比帝俄生產最高時候的八倍。投資於生產設備的數目，爲一千三百三十億盧布，幾爲第一次五年計劃的一倍。結果計劃完成，爲時只有四年零三個月。在此期間（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七），技術有了改進，農業已機械化，曳引車四倍於前，運輸改善，現代化且加擴展，工業生產七倍於戰前。人民生活第二次五年計劃期間，的確大爲幸福。工人職員的薪水真正倍增。在這期間，俄國工業生產，有史以來在歐洲各國中高居第一流地位。

第三次五年計劃爲戰爭所中止，但在頭三年即已投資一千零八十億於生產設備，有新工場工廠電力站二千九百所開工。

蘇聯作家波羅寧對我說過：「我們不吃牛油，使牛油化爲磚瓦，我們不吃肉，使肉變爲機器。」他的意思是說大家犧牲以求國家工業化。蘇聯計劃的最後目的，是使全體人民得以豐衣足食，但欲達此目的，必須暫時犧牲日用品而致力於重工業。欲知犧牲到如何程度，可比較美蘇兩國的情形。在美國的國民所得之中，平常作貯蓄與新投資之用者，不過百分之十五，而俄國爲建設一個本質上簇新的經濟，必須以國民所得的百分之四十五用於生產設備。結果是別個國家費時數十年始能完成的大業，第一個五年計劃就在幾年中經營成功。

倘不爲了戰爭，現在這次五年計劃必致力於供給人民以物質享受。不過集中全力於重工業的政策仍未改變。這就是說蘇聯人民還須再節衣縮食至少五年。現在的計劃（一九四六至一九五〇年）目的在重建工業使能超過戰前，這就是說不僅要恢復破壞之區，並擬擴充。

俄國的計劃是個合作辦法，下至窮鄉僻壤，上至世界最大的莫斯科統計機關。在進行之中，每一集團每一民族許多個人無不協力參加。每一工廠，每一企業、農場、鄉村、城市、共和國，都有一個計劃部門，提出報告，詳述去年成績，估計明年的所需與所能成就之點。這許多報告彙集於中央設計委員會，在此分類剖析，然後委員會對於人民所須，原料與工廠怎樣，有多少勞力足應需要的情形，就瞭如指掌。計劃無所不包，農業、教育、運輸、文化、工業一一在內。最後大計劃是在平衡了一切資力與所有要求之後決定。計劃的決定並不隨意所好，而是根據各事業報告中提出的需要估計，也就是根據人民囁嚅之聲。史太林稱這爲：『幾百萬人擬定的計劃。』

規模如此之大的計劃，當然千頭萬緒，複雜之至，但由此計劃，却使一個國家得以決定那一種國家爲他所需，不過二十幾年，俄國已從十六世紀一躍而至二十世紀。落伍半封建的國家已成爲世界第一大強國。俄國已不再以農立國。經濟重心已有意從農村轉至工業城市。約略估計，目前蘇聯人民，百分之五十爲城市居民，工廠工人，百分之四四·六爲集體農人。

計劃又能設計工業中心位於最好最有效率的地方。工業分布的地理要點爲：

1. 安全。史太林深知俄國一旦受德日攻擊，大工業應在得免佔領與破壞的區域。這就是說不能從

危險邊境移動的工業，也在內地建設起來，並定一旦有事加以撤退的計劃。

2. 接近原料與廉價電力。例如工廠建於鐵礦、煤、或棉等資源地。

3. 發展落後人民與地區，消除區域之間的經濟不平等。棉花要在烏茲貝克斯坦種植，紡織廠在那邊設立，而不必在莫斯科。久而久之，烏茲貝克斯坦就能由貧轉富。

4. 運輸設備。凡有工廠之處，必須交通便利，俾能將生產品輸往各處。

5. 接近市場。工廠與最後市場越近，運輸就越不成問題。

6. 人力供給。人力不足之處，蘇維埃就鼓勵人民遷移，給予地位工資的優待。

蘇聯計劃的意圖，要使所有工廠能受到若干程度的控制。用盡一切學問知識，解決發生的問題。庫茨尼斯克藏煤甚豐，大家知道，但是否可以就在當地利用，不必運往別處呢？於是地質學家前往該地附近，察勘有無鐵礦，結果發現，煤與鐵就在當地利用，然後運金屬品至別處。

鑒於戰爭的一觸即發，就設法使易受戰禍的西區，盡力不靠運輸，例如在戰爭期間，莫斯科就以四郊所得的煤柴之類，以供本市之需。

劣質煤礦的生產，以價值論運費未免太高，就以科學之助加以利用。卡匹斯大教授以氧化方法，在礦中焚化劣質煤，使成爲煤氣，煤氣可以甚少費用，輸往需用之地。

在計劃督促之下，蘇聯就大事開發。許多新天富於以發現。新礦藏的存在無窮無盡。今日蘇聯的燐灰石、鐵、鉛、油、白金、銀蘊藏之富，冠於全球。鋁、鉻、煤、金、錳、鋅之多，居世界第二。

事實上世人所知的一切天富，蘇聯的若干地方隨處有大量蘊藏。天富一經發現，就立即設法利用之於全國計劃之內。

一九四一年時，工程師正以沙拉托夫的缺油爲苦，忽然間發現有日產六十萬立方米突的煤氣蘊藏。後來史太林格拉被圍之際，就輸這煤氣以供其用。新井紛紛開掘，到一九四五年時，沙拉托夫區的一切工業，就用煤氣開工。煤氣之多多得決定輸往莫斯科應用。這計劃創造了一種『人民建築。』凡是得到輸煤管之惠的地方，其人民須前往爲設管工程效勞。千萬人民踴躍而去。此線完全成功，長要到五百六十哩，可每日供給莫斯科煤氣一百三十五萬立方米突，因此而省下耗於燃料的三百萬立方米突木材，可將原來運輸木材的貨車十萬輛改作別用。

烏拉爾山後面工業的龐大發展，也是計劃之果。在帝俄時代，年產鋼不過四百萬噸。我在一九三五年游歷西伯利亞時，知道當初產鋼之少，不是由於缺乏生鐵。烏拉爾的磁鐵山實在就是一座結實的磁鐵礦大堆。其中三億噸鐵沙，含有百分之六十五鐵，八千五百萬噸含鐵百分之四十五。在帝俄時代，這個廣漠的工業富藏之區，是供牧牛之用。

發展馬格尼托戈斯克的計劃，始於一九二〇年代後半。一九二九年工人羣集，設備新穎，在美國工程師之下開發這座大鐵山。方法不計一切。放逐的有產農民和政治犯，爲開發的一部份工作勞役。不論炎夏嚴冬，總有曳引車與關地機器在除泥去土。許多人辛苦喪命，但久而久之，俄國的工業大地終於在荒野出現。地處烏拉爾山脈的極南，海拔兩千呎之高，離莫斯科有直線八百哩之遙。目前這城

市有二十七哩之大，居民達四十萬。

馬格尼托戈爾斯克廠，終將成爲世界最大之廠。現有工人四萬五千人，百分之四十五爲女性，平均年齡三十二歲。全部建設雖於一九四八年完成，但早在二年前即已日產鋼鐵條塊七千五百噸，銑鐵八千噸，焦炭八千五百噸。

計劃結果在西伯利亞不毛之地建設的此類工廠，何止百數，帝俄之對於西伯利亞，只知道用作放逐囚犯之地，一個天然大牢獄。蘇俄却當它爲前途無限的福地，當年在西伯利亞拘禁的囚徒，現在正在主持日日增產新的物資，以加強蘇聯這個初生巨人的力量。

距馬格尼托戈爾斯克二百五十哩，爲古城斯佛特羅夫斯克，卽沙王畢命之地。現在這地方已成一大城市，爲生產機器與渦輪的中心。烏拉爾機器製造廠有職工三萬，百分之三十五爲女性。戰時此廠日夜產自動推動炮二十尊。一所炮廠在戰爭將了之時，產量比戰爭初起之際增至六倍。

再過去五百哩是奧姆市，以製造坦克與曳引車著名。再東行四百哩，在世界第三大河的奧伯河邊上，是另一個生產大市諾伏西別斯克，職工三萬人，日產飛機二十五架的約克飛機廠在焉。

烏拉爾與西伯利亞的發展，對於蘇聯的貢獻，在戰時實不勝數計，這許多大生產中心如不建設在前，戰時的工業移動就不可能。結果幾百所危險地區的工廠撤退，以非常努力，繼續生產，無甚停滯。列寧光學廠撤離莫斯科在一九四一年十月十六日，遷至諾伏西別斯克後二十二日，卽已開工，雖然有六千工人須在當地招募加以訓練。現在已有職工一萬五千，大概不再遷回莫斯科。道格拉斯飛機

廠移動之後三十五日，即已製就第一架飛機。基洛夫兵工廠有工人四萬，遷至烏拉爾山脈，不久即已動工，產量勝前。

蘇聯計劃的中心，爲列寧夢想的電氣化。列寧有過一句格言：「共產主義就是蘇維埃政府加全國電氣化。」照此定義的共產主義，迄今尚未完全達到，蘇聯現在是走到電化的半路。在歐洲，電力最多之國首推蘇聯。大的區域電力廠供給主要區域。高電壓網與廠連結，分送各地。無數鄉村電燈耀目。許多鄉村合建水力發電廠，單在庫壁也夫一省，建築在小河上的小電廠就有四十所之多。按照計劃，一九四五年要在各地建設此類小電廠二千五百六十五所。百所大電廠已經建設，大率供發電與鄉區之用，蓋在戰事期間，鄉區的電化日在進步。富有創始性的集體農場集團，無不可以聯合起來，向政府借款，建設電廠。

戰爭結束之後，最宏大的電廠即在建設。伏爾加水電廠名列首位，此外西伯利亞的許多河流，也在設計建設電廠。列寧的夢想正在逐步實現。

一九四一年時我遇見法國前航空部長戈脫，他其時正在遍游俄國，視察工業運輸與重建破壞之區。他於蘇聯計劃的成就嘖嘖稱道。他對我說：「戰爭結束之後，蘇聯的生活程度自必提高。工廠之遷往西伯利亞，一定造成蘇聯經濟的新平衡。西伯利亞將見大量移民。重心爲之一變。」他又力言蘇聯預備的穩妥，爲全球冠。說所以如此，是因爲蘇聯的增加預算，只爲了供增加生產之用。

這個無知農民的故土，真已經大踏步前進了。

第九章 史太林與紅軍

帝俄軍隊，原爲世界史上最無功效的軍事組織。日俄之戰顯出其無能，第一次大戰的表現也不見進步。許多觀察家至於相信「俄國人非善戰之民。」因此當希特勒進兵俄境之時，大家不免預料俄國之潰敗。但鑒於這一次的紅軍戰績，可知帝俄軍隊之屢戰屢敗，其故不在於俄人之不善戰。

我因服務於青年會，得親眼目睹帝俄當時的軍隊慘狀。俄皇的兩員名將，克魯巴特金與勃洛希羅夫與我私人閒談時，以他們專家之見證實了我的所見非虛。參謀部組織腐敗，動員令往往遲發，演習時不下批評，免傷將領們之心。結果如克魯巴特金所說：「錯誤不加注意，一誤再誤，以至習以爲常，所有將領各有一套固執不捨的理論，而又大錯特錯。」勃洛希羅夫說：「賄賂公行。」他告訴我他在計劃一次進攻時，連俄皇也不敢告訴，因爲怕洩漏給德軍知道。最嚴重的是人民不滿之情，影響到了軍隊。將領在分發武器給士兵時，實在害怕得很。

希特勒於一九四一年進攻俄國時，許多英美人士都認爲俄國難免覆轍。其時德軍戰無不勝，舉世無敵，握有歐洲一切工業資源。參加攻蘇的又有羅、意、匈、西、芬。上次大戰時德軍只有一二七師團，這次却有二百六十師團。而每五個師團的火力，勝過上次的一百師團。德軍又有作戰經驗，攻人不備，空軍之強冠於各國。據若干專家之見，蘇聯的上次清黨，又誅戮了唯一名將杜卡契夫斯基。在

這些悲觀的分析之中，他們忘記了這點：史太林已經建立了一枝強大紅軍，有强有力的蘇維埃國家爲後盾。

史太林未嘗進過軍官學校。他的豐富經驗，得於革命運動。他視革命工作若戰爭，像作戰一般行事，革命期間他負極大責任，奔走前線。伏羅希洛夫描寫處艱危之境時的史太林道：『鎮靜如常，深思熟慮，真正數日不睡。來往於戰線司令部之間工作。戰線情勢極度不利……史太林只以勝利爲念，故能志堅氣定。只知殲滅敵人，不計其他！史太林的這種堅定意志，傳染給他的同事，故局勢雖至幾無挽救地步，我們終獲勝利。』

許多次轉敗爲勝的功勞，使大家敬史太林爲第一流組織家與軍事領袖。就在危急之際，他也不忘却部下軍隊的生活與士氣。伏羅希洛夫回憶當時史太林堅主軍中政治工作的重要，深信欲使士兵勇敢善戰，只有使他們深明爲什麼而戰之一法。他首先發動黨員的特別動員，藉使士兵們爲黨員們的英勇行動所激勵。他要求最有能力的共產黨員入軍隊爲政治委員，曾經打一電報給列寧說：『軍政治委員應爲作戰的靈魂，領導將士。』此舉大有功效，因在史太林指揮之前，軍隊在混亂中後退者，此後即轉守爲攻，獲得勝利。

史太林知道怎樣能得人心。他有種特有品性，愛戴者衆而仇視者極少。照紅軍習慣，士兵見司令總必歡呼，有一次史太林注意到有一小兵未曾向他歡呼，就詢其所以。小兵默然無語，只指一指自己的脚。其時正爲隆冬，小兵還只穿草鞋。史太林就脫下自己皮靴，交給小兵，把小兵草鞋穿到自己脚

上。一穿穿了好幾天。

我有一次和一個紅軍上校談天。他在內戰時期，有一次好容易收得一點食糧，以供伏爾加沿岸的飢荒城市，正待運輸之際，忽爲史太林部下所沒收。上校去向史太林抗議，在一家旅館裏找到了他，他正在踱來踱去像隻檻中之獸。上校指陳城市的糧荒嚴重，野有餓殍，要求發還沒收的糧食。史太林却說：『這可沒有辦法，失去這些城市，我們還可克復，但若軍隊無食充飢，革命就此休矣！』

內戰結束之時，軍隊已達五百萬人。史太林整編之爲六十萬人，但經縝密部署，使各種隊伍應有盡有，砲隊特別加強，工兵依舊存在。所有退伍兵員，每年召集一次，訓練幾個星期。一九二三年由史太林提議，各共和國成立國軍，普遍軍訓在高中與大學實行。

對於擢升年輕可靠之人爲軍官，特與重視。到一九二四年，軍隊指揮官約百分之八十五爲工人農民。最後史太林使老友與合作者伏羅希洛夫任陸軍部長。史太林深信此時的人選以組織優於戰略之人爲宜。鐵木生柯將軍被任爲訓練新軍之職。

鐵木生柯是貝塞拉比亞一無田農家的兒子，在帝俄時代未受過正式教育。第一次大戰時爲機關槍手。將起革命時因打軍官而受軍法，幸革命爆發得免於死刑，後來鐵木生柯所立的軍法，嚴峻過於帝俄，不過公平無私，沒有什麼偏袒。

直到芬蘭之戰以後，鐵木生柯一步步改革軍隊。在這次戰事中，蘇聯以使用兵力不多，幾個月未能突破『難破』的孟納與防線。鐵木生柯奉命前往。他在自己方面的陣線後面，建築起一部份與孟納

與砲台一般無二的工作，加以實驗。不久之後，蘇軍猛烈進攻，芬軍大為驚異，因為所有砲擊，均未能擊中蘇軍陣地，後來發現蘇軍工事原在地下，使砲擊無用。這種『暗中』砲台，是在鐵木生柯的實驗中發現的。

芬蘭戰後，鐵木生柯的改革軍隊愈益努力。他的第一步是取消軍隊中的政治委員，因為軍中將士已極可靠，政治上又甚能幹。第二步是森嚴軍紀。第三步是訓練士兵能耐嚴冬作戰，在零下四十至五十度中操演。配備重新設計，俾能適應嚴寒之用。

同時軍民雙方均不忘於國防準備。大隊人民從事於射擊，看地圖，攀越障礙物，攜槍游泳與衝鋒等訓練。在戰爭爆發之前，已有一百多萬人民精於射擊，五百多萬人會得衝鋒、游泳、知地圖、爬牆垣。因為當國者預期敵人進攻，故生產計劃一變而為着重軍需。大砲生產量增加到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七十五，視口徑大小而異。坦克飛機大量生產。

史太林對於舊式軍事專家的『試過不錯』就覺滿意的方法始終不以為然。他力主現代軍隊必須利用所有技術科學與工業上的新法，伏羅希洛夫會謂：『就是史太林獨創了最遠大最重要的組織與技術方法，以發展革新的配備，他操心勞神於軍事發明家與其發明品，盡全力以助成他們的工作。』司令指揮之敢於想出技術問題利用現代機器與武器者，就能得到後援與擢升。

當美國的密契爾將軍以鼓吹空軍應與海陸軍同等重視受到軍法裁判時，蘇聯方面已經付之實行。我於一九三二年游歷蘇聯時，就驚於公園場地運動場之處處有降落傘塔矗立。男女老少用勁使力的爬

上高塔，而後用降落傘跳下。我初以爲這是種新式運動，後來才知道軍隊也在受此訓練。又後來我親眼目擊到莫斯科機場有成千士兵自天而降。他們一經着陸，就排成隊伍，全副武備在身。遠在列強想到傘兵這個觀念時，蘇聯已經有傘兵在操演。

紅軍的成功之道不一。各方面的目光遠大，是勝利的基礎準備。

紅軍在戰場上的得勝，也由於經訓練組織配備而成的同樣因素。三教九流的國民，從冷靜的科學家以至漂亮的歌女，無不各盡其能，有所貢獻。泥濘載道之際，工程師就製造機器，能在一小時之內清道三十哩。特別設計的行於沼澤之地的坦克及曳引車，大量生產，以禦敵人。

俄國人已經慣以新方法解決工業上問題，也以這種新鮮態度帶到戰場，在作戰上完全不陷陳套，處處改革。其中一例是前線上到處可見的卡子夏。這東西裝在大卡車上，像一排管樂器，各自發射火箭砲，入夜宛如流星。

伊凡諾夫隊長告訴我這武器的功用。有一次午夜他接通知，要阻止德軍反攻，必須毀其砲隊。卡子夏立刻開到一地點，不過兩排一放，遠處已經起火爆炸。德軍砲隊在隊長接通知後的二十八分鐘之內即已被攻。他和敵人常玩『貓鼠之戲』，忽然在這裏發砲，忽然去那邊攻擊。德軍回砲還擊，但是落彈之處，總是卡子夏曾經在過的地方，而非現在正在的地方。最先發展火箭砲者是俄國，這發現與美國共之，讓她在太平洋戰場上大顯威風。

此外新方法無所不有，如使狗偵察地雷，牠們先用嗅覺發覺之，然後靜待主人前來發掘。又如進

攻柏林之際，朱科夫元帥以萬千探照燈直射敵人，使他們目爲之眩，火力因而無效。

紅軍最傑出的成就，是發展一種新的砲隊戰術用法。當德軍於一九四一年初以塞佛斯托波爾時，對紅軍戰區的每一平方米突施以一到一噸半彈藥，但到紅軍反攻，發砲之多倍於德軍，一星期之內不但收復失地，並盡戮和捉盡克里米亞的德軍，每一基羅米突紅軍發砲多至二千發，真正是彈如雨下。

紅軍的大量使用砲隊，還輔之以高度機動化。舊式的砲隊在安全之處發砲肅清前面陣地之法，完全棄而不用，砲隊的大量使用與高度機動，目的在於一方面阻止敵軍坦克竄入俄軍後方，一方面又使紅軍得以前衝。我在德軍被殲之後往弔克里米亞戰場時，一位軍官告訴我說，紅軍用砲之多，至於每十呎即有一尊。在如此集中的砲火之下，無物得以存在，德軍的防禦被毀，紅軍洶湧而前，佔領德軍陣地。

紅軍砲兵又大用『絞』戰。每當敵軍隊伍建築好一個防禦突出部時，紅軍不用老式而費力的步兵兩翼進攻，而以砲兵轟擊兩翼，集中步兵正面進攻。

紅軍砲隊的英勇，無時無處不可見。紅軍精於操縱之術。他們能避免障礙，突然行動，不畏艱險。例如在渡第聶斯脫河時，紅軍坦克一馬當先，佔領橋頭堡，其時離步兵追蹤而來佔得陣地尚遠。結果是德軍倉卒撤退，來不及炸毀橋梁。攻擊始終不斷，如甲軍稍事整頓隊伍，乙軍就起而衝殺。德軍無喘息之暇。進攻精神爲紅軍戰爭原理的中心。

德國人大談『全力戰』，不過真能使舉國作戰的却只有蘇維埃制度才行。最好的例子是婦女作

戰，蘇聯革命已盡人力所及給與婦女以平等。蘇聯的傳統正與納粹相反，婦女應在家庭之外有她們的生活與貢獻。

即在戰爭之前，蘇聯的鋸齒邊與車床製作，電氣熔接工與標準計製造者，四分之一已為女工。女技術工程師佔到十五萬人，開引擎的有到五千。在戰爭期間，工廠礦地裏代替男工的女人，數以幾十萬計。在農場裏，開曳引車的女人比戰前多到六倍。地方蘇維埃裏的女代表達四十五萬六千人。在前線上，受助婦女多到七萬五千。有四十四個女人成為蘇聯英雄。其中之一名波波娃，飛行過七百三十七次，投彈達一百噸。

我和這些女英雄們見過面談過天。其中的香斯卡雅堪為典型。她是一隊小型轟炸機的隊長，全隊用的是世界最小飛機，闊僅二十五呎，所載炸彈不過六百五十磅，不過每夜要出發到八次之多，炸得在格羅茲尼附近，庫班、克里米亞、北高加索的德軍片甲不留。另有一位叫作波柯的女人，年紀只有二十六歲，榮任一隊重坦克車隊長。她的丈夫是軍用車司機，月薪達五千盧布。他獻給政府五萬盧布，造一輛他們夫妻能開能用的坦克。政府准予所請。在一次戰爭之中，他們擊毀了五部德國坦克。還有一位蘇聯英雄托拉科娃，為紅軍隊長，在一次接連五日的大戰中，擊退敵人的突圍達五十三次。

俄國全力戰的重要一部份，是敵後游擊。一九四一年七月三日，史太林廣播請國人實行焦土政策時，定下了游擊工作如下：『在敵軍佔領之區，馬步游擊隊必須組織，破壞隊伍必須成立，以敵敵人，以四處煽動游擊戰，以破壞橋梁道路，電報電話線，焚燒樹林倉庫與運輸。在佔領區內，必須造

成使敵軍不堪忍受的狀況。必須隨時隨地殲擊敵人殲滅敵人，挫折他們的每一行動計劃。」

蘇聯各處的游擊工作，受史太林的不斷鼓舞不斷計劃之賜非淺。他經常以無線電與游擊隊接觸。必要時給養與醫生在飛機上降落。史太林對於敵後的游擊活動，我想總使他記起當年的地下工作。他對於游擊不可或缺的英雄犧牲精神，不勝讚美。

蘇聯男女老幼敵後殲敵的總數，達百萬人。單在白俄羅斯一小區地方，開戰第一年就殲敵十二萬餘，其中三千為德國軍官，十三個還是將軍。游擊隊使火車出軌達一千多次，炸毀橋梁九百八十，破壞敵機二百五十，坦克軍車近三百輛，汽車五千餘，更炸毀軍用倉庫一八一，司令部十九。而此種種，還不過全豹之一斑罷了。

就連小小兒童，也參加游擊大舉。我和一個十四歲的孩子名斯托勒爾沙夫的談天。當德軍佔領他家鄉之際，殺盡有共黨嫌疑的人物，沒收盡所有糧食。鄰村弩拉沙瓦因為有幾個農人收留受傷紅軍，給德軍知道了就縱火焚燒，燒剩一片白地。斯托勒爾沙夫就集合十三個男女孩子，最小的還只十二歲。他們在德軍那裏偷來步槍和三挺機關槍。他們埋伏在通前線的路上，藏身於路畔樹葉叢中，到夜裏德軍駕給養車經過，孩子們就開火襲擊。敵軍十九被殺，餘亦投降。一個德軍少校從車裏出來，臉色急白，雙手發抖，真想不到成了一羣孩子的俘虜。這羣童子軍激起了本區成年人的熱忱，加入游擊者驟達百四十一人，成了德軍重要交通線的嚴重威脅。

小姑娘們抗敵亦不落人後。有一個姑娘投到德軍去充飯廳女侍，把德國軍官藥死了一個又一個。

她始終未遭拘捕，雖然德軍把與飲食有關的人一一開除拘禁。

欲知小姑娘們的游擊抗敵事實，請看托里昂的故事。她家住明斯克，德軍被侵時年方十九。投入游擊隊之後，所派工作為向德軍購買軍火彈藥。她綺年玉貌，勾引德軍到她家裏，問他們要不要喝點俄國美酒。等他們喝得薰然大醉，就向他們收錢，說如果沒有現款，可以步槍手槍作價。她和別幾個姑娘就以這種方法弄到相當可觀的武器。另外的工作是把它們送往游擊隊。她把來放在一部木頭小車裏，覆以木屑乾草。各路均有德軍把守，她却沒有辦法通行。她邀德軍同行，路警看見車上坐着弟兄，就許她過去。然後她再繞道運往游擊隊藏身之所。

她是一種嚴密組織中的一部份。在德軍離明斯克尚不甚遠的時候我往遊明斯克，從聽到的一切看來，在明斯克時的德軍猶如囚徒，自由自在的倒是俄國人。凡德軍所住的房子，總是鋼窗水門汀堡壘密佈。他們入夜就不敢出門，因怕被殺。但深居簡出也不能逃命。來措拭地板窗戶的俄國女人帶着炸彈進來，偷偷放在總督床裏，等他前去安置，炸彈爆發，粉身碎骨。在被德軍蹂躪的歐洲大陸，沒有一處的游擊像俄國這樣的勢如燎原，人人參戰。

在俄國力抗強敵之際，史太林是抗敵中心，俄國之終獲勝利，大部份要歸功於他。熟悉當時局勢者無不明白這點。美國大使哈利曼曾謂：『指導紅軍的大腦是史太林。』美國會有謠傳說史太林與紅軍參謀部之間意見不合，其實紅軍參謀部與史太林之間，只有敬愛。

當時的軍事巨頭是科尼夫，洛科沙夫斯基，朱科夫，三者都是黨員，出身於工農家庭，過的是儉

樸生活。朱科夫住的是簡單的一層樓，一妻二子一女。沒有汽車，兒女入的是公立學校。

科尼夫有一子一女，投效空軍。他本人是農家之子，沒有受過正規教育，十歲就在田間操作，十二歲當木材工人。一九一六年入伍，軍中的虐待使他傾心革命。布爾塞維克取得政權時他是莫斯科軍人中的革命領袖之一。內戰中他任一部鐵甲火車的隊長，他的任務是送哨兵至前線，然後以一小時六十哩的速率襲擊敵人地方，有一次他突入白軍司令部所在地的奧姆斯克，白軍以爲紅軍大軍進攻，倉皇後撤，使科尼夫不費吹灰之力，一舉而取奧姆斯克。後來他的鐵甲車參加抵抗日本軍侵入西伯利亞干涉之役，戰無不勝。他的成功是得力於料敵，研究對方以爲他將有什麼行動，而後反其道而行之。他說：『我總是與敵人所料的相反方面行去。』

身材瘦長，碧眼光頭，能說英語，爲部屬敬愛，他鄙視軍人的耀武揚威，身上不加肩章。

洛科沙夫斯基作風民主，衆望所歸。戰時他與士卒共進退，喜歡把司令部設在戰事最激烈的前線。因爲喜近前線，曾經受傷三次。

他把一半時間消磨在與士兵爲伍上，藉以熟悉軍心與士兵特性。他有一種見過一面不忘的奇才，因此能叫得出幾千士兵的名字。他愛聽士兵的意見。在戰局緊急之際，他平靜如常，指揮若定。

朱科夫爲戰略奇才，指揮過幾百萬大軍，從無大敗，他不但運籌帷幄，而且馳驅疆場。他與洛科沙夫斯基保全了莫斯科與史太林格勒與科尼夫，克復了烏克蘭。他佔領了柏林。

他識字無多，第一次大戰時入伍，因病退伍。內戰時獻身革命方面，後爲黨員。戰功不凡，保送

入軍事大學，後任教師。後來又留學德國，研究普魯士軍事技術，進步不已。西班牙內戰時他是蘇聯的觀戰大員，研究德國空軍技術。一九三九年前往蒙古，參加日本的不宣之戰。

此外蘇聯的猛將名將，真是如雲如雨，而況蘇聯人民又是饒勇善戰。第二次大戰的結果，就是一個明證。

第十章 農村的革命

列寧，史太林和共產黨人在俄國要完成的革命，實在不僅一個，而是有六七個。先是取得政權，是為政治的革命，但是欲求政治革命的歷久不衰，必須完成工業，教育，宗教，醫學，農業的革命，只因爲俄國是以農爲主的國家，人民十九爲農人，所以農業的革命要算最爲重要。

俄國的土地原來肥沃得異乎尋常，但是在沙皇統治之下，生活在這個肥沃土地上的人民，竟窮得令人難以相信。俄國的農民目不識丁，未受教育，從未踏出過中世紀時代。灣鈎的木犁仍在使用，現代的方法一點也不知道。耕田無幾，因遺產制度是兒子大家共分的，所以又越來越少。這幾畝田又不在一起，有塊好田有塊壞田，有的很近有的頗遠，耕耘收穫諸多不便，出產則微乎其微，農民們難得有所積蓄，以備不時之需。凡有什麼事情發生，譬如說旱災水災，一牛一馬的死亡，在他們都是大禍奇災，弄得窮上加窮，變成乞丐。

改變農人的苦命，增加鄉村的生產，真是件移山倒海的工作。在革命之初，政權尙未穩固的當時，蘇聯政府所能做到的辦法，是把土地根據較爲平等的基礎，重新加以分配。已開墾的土地被佔，地主非法律所許。以富農中農的所失，使貧農得到好處。土地收歸國有，但准許每一個農人用『他的』那方田地。

革命後頭幾年的政府，能做的事情只有施以若干改良的方法，使鄉村得以度過一個危機四起的時期。到國內戰事結束，局面更爲安定之後，就明明需要有其種更爲根本更爲遠大的改革，史太林於一九二五年舉行的第十四次黨大會上說：「農業能够沿二條路徑而發展：資本主義的路和社會主義的路。資本主義的路就是由大多數農民陷於窮苦，使上層階級富有的發展。……反之社會主義的路，就是經由着着實質改善農民的生活標準而發展。」

我記着這個議論的要旨，於一九二六年見到史太林時向他提出這個問題，這問題我是以爲頗爲重要的。我問他：「使自耕其田的普通農人贊成共產是辦得到的麼？」

史太林的答語第一句頗爲令人吃驚，他說：「一般而論，宣傳是沒有什麼用處的。我們爲什麼希望農民終於和我們攜手同行，爲什麼我們目前在領導他們的理由，是因爲我們正在建設這樣的物質與文化條件，足以使他們投向我們這一邊來。農民是講究實際的。他所切需的是什麼？我們必須供給他們價錢便宜的日用製造品，他切需貸款，他要知道現政府在念念不忘他們的利益，在饑荒時候幫助他們，急於和他們共同工作，熱心於爲他們工作。」

「農民們明白我們在保護他們，不讓想收回田地的舊地主死灰復燃。我們給他們以從來沒有的文化生活。我們帶他們到政治生活上來，以便他們共問國家大計。事實上我們給以工作，使他們建設整個社會機構，以滿足他們的需要。我們位居政權樞要者，對於這些工作雖然還不會做到十足，但在盡力所能，趕緊做去。」

「你必須知道在內戰時，一百個農民之中，差不多有五十個出戰於各處陣線，有生以來第一次知道「國家」這個字眼的意義是什麼。從前他們只知道本鄉本土，現在才真有着一種「愛國家的心」。他們明白了他們自己的全國政府是什麼。他們知道俄國會成爲一個偉大的合衆國，由一個爲人民利益計的中央委員會治理。」

「我們的農民趨向共產主義，並無偏見在胸。在英法，農民從地主或中產階級租到田地，在蘇聯，他們從社會主義者取到田地，他們是明白的。」

「我們藉合作創造局面，這合作使農民們深信和我們攜手勝於與我們爲敵。中產階級和小地主的確自然不太歡迎我們，但他一想到他和資本家接觸時的經驗，記起資本家連話也不肯和他們多說，再想到和共產黨員的關係，不但暢談細說，而且不剝削掠奪他們，相形之下，就明白應該來往的是誰了。他們不以爲我們已合乎理想，但比什麼人都好。」

「對於農民的工作有二部份——生產與分配。有利的生產全仗分配，農民經濟的這一方面，正在根據合作基礎而組織。我們已經藉消費者或分配者合作社影響了二千萬農民。農民已明白起來：沒有這種共同的方法，他就永遠賺不到他所切需的錢。」

「俄國有這種合作組織約一萬五千，但有些工作不佳。主要由貧農組成，他們得到耕田車和農業器具。從整個立場而觀，這不算得什麼，但作爲一個例子是重要的，因其能實證出集體或機械化農民經濟的利益。農民們日益熱切於加入這種集體組織。」

『革命以來，我們也把放款收爲國營，這一點因能以低利借款給農民，使他們頗爲受惠。凡在集體工作的農民，借款條件更能有利益，於是農民們又看到了我們的幫助，重視了共產主義。組織合作社以謀生產五穀，事情要困難得多，但這個也要應時完成。』

我又問過他：『宗教宗派是不是組織了最好的農民自治團體？』

『不，』史太林說，『宗派的會員們疑心生暗鬼，輕易不肯和別人合作。在莫斯科省內，有若干極好的教派人物，工作令人敬佩，但以一般而論，實在不大高明，最好的合作人員是退伍後的紅軍士兵，以及在德國集中營中的人們，他們知道了共同工作實爲必須。』

一九二七年我旅行蘇聯鄉間，就已目擊到雖然污穢和貧窮依然在目，農民們的生活已經勝於以前，而其時偉大的集體農場運動還沒有進行。農民不再有地主高高在上，因此可以先顧自家的急需。政府在許多地方前來援助，有國家保險以保護他們防火災和冰雹。他可以年費一元五角保馬的壽險，四角保牛。捐稅減少，比起沙皇治下來只不過四分之一。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九年，每人納稅只有一元五角。而稅款的十分之六，又用在本地需要上，像學校，醫院，圖書館，橋梁和道路。窮農得免捐稅。農家婦女的地位也有改變。有一個說：『蘇聯法律之於女人，比對她的丈夫來得寬宏。』

當時我又注意到史太林是力主工農兼顧。農人堅持要求的事物總能得到。

農民和政府都不以爲已經滿足。史太林說他的政策是問：『農民要的是什麼，怎樣能够如願？』現在農民真要富裕繁榮——而俄國農民一洗除幾百年來的因循惰性之後，其力量實在猛烈得很。他不

能根據個人私有基礎而得富裕，因為已開墾的田地既不足，可用的機械也不够。再則除非糧食無虞，政府不能够使鄉村工業化而準備史太林所逆料的外敵侵犯。個人的農民總是不肯試用機械方法，而且即使機械够用，在三畝五畝這裏一家那裏一家的小小田地上應用起來也不經濟。史太林深信一個國家決不能老是在城市裏行社會主義而鄉村間依然是資本主義。蘇維埃對此問題的答復，是集體耕種。

照史太林的說法是：『解決方法是變小而四散的農人田地為大規模的聯合田地，以共同耕耘土地為本，實施集體耕耘，以新而高明的技術為本。辦法是聯合小而肥的農人耕地，慢慢的着着實質的，用模範與善誘而不用壓力，使成為大農場，以共同合作集體的耕耘為本，用農業機器與曳引車，以及高深的農業科學方法。』

曳引車和供應品越來越多，貧農和中農就爭先恐後加入集體農場，史太林所述的方法一一實行。富農對於集體化運動痛恨仇視。富農原來是『踏在別個農民背上過生活』的人物，他以放債，出租農具，控制本地貿易為生。集體農場剝奪盡了他這許多便宜。一種類乎城市中發生過的內戰，富農和集體農之間發生了革命戰鬥。集體農場的共產黨領袖，有的遭暗殺，有的遭兇毆，富農們放火燒集體農場的屋宇，宰殺牲口。有些地方的共產黨員過分急切，用的景強迫手段，使整個鄉村反對起集體耕種來。一九二六年底，史太林發表演說，其中有幾句道：『現在我們力足以向富農作致命的攻擊，粉碎他的抵抗，視為一種階級而消滅之，由集體與蘇維埃耕種來代替他的生產。』富農的財產加以沒收，流放之於西伯利亞和北區，罰作苦工。

到一九三〇年，集體農場運動大功告成。史太林知道有些政府人員在力行集體化上未免操之過急，有背他的『示範和善導』初衷。一九三〇年三月，他發表有名的書信『因成功而起的昏暈』，叫政府人員停止強迫手段，不得有過分行動。凡有兒子在軍隊，行政機關，工廠服務的富農，尤其回到故鄉。

到一九三三年，使用的曳引車已達二十萬輛，康拜因多到二萬五千部。組織了二千餘處中央機器與曳引車站，耗資達二十億盧布，以供需要機器的農場之用。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集體農場已多到二十四萬二千，耕地達二億九千二百萬畝。平均起來，每一農場超過一千二百畝。

我在上次旅行俄國時，深信集體農場之有功於俄國抗德勝利，不在紅軍之下。就是紅軍的力量，許多也來自集體農場。農民之能駕駛曳引車者，數近百萬，他們能立刻成爲坦克司機。曳引車廠隨即改爲坦克車廠。坦克總司令羅脫梅斯特洛夫之生於集體農場，長於集體農場（在加里寧附近），決不是偶然的事。倘無集體農場，危急存亡之秋士兵和工人所需的糧食是否不成問題，不無疑問。

和蘇聯的各種工作一樣，集體農場自有其『社會主義競爭。』農場與個人萬分努力，結果就效率提高，農場與會員的收入增加。戰時壯丁離鄉，造成優良紀錄的是女子。她們之受人讚頌，揚名報刊，好像美國的美女比賽冠軍。試舉一貧農之女的瑪麗丹欽珂爲例。她學了點科學耕種法，結果她的糖菜收成之豐，爲全蘇聯冠。後來有一個喬治亞人名叫凱的希維里者，又打破了紀錄，每畝產糖菜達四十八噸。

在阿什爾貝然，世界的產棉紀錄爲之打破，每畝產量竟達六又十分之二噸。在另一區域，有一團種麥的人每畝產量超過四噸。有一個女郎名叫麥科娃的，一隻牛在一年之內出牛乳到四千五百七十三加倫。另有一個以一隻母猪在一年之內生到小豬一百隻之多。戰時九十萬開曳引車的婦女之中，有一個因爲想出曳引車耕地的日夜班方法，受到獎章。她又給每一曳引車省下二十四噸燃料，這一切努力改進的結果，以俄國全體而論，是農業生產的增加，比起從前來真有天淵之別。在帝俄時代產穀一噸須時三十二小時，今則不到二小時了。

我在一九四四年旅行到大俄羅斯的雷蒙斯基區的集體農場時，目擊到這個增加的效率實屬驚人，在這地區，第一百零一號集體農場所出產的山芋，比戰前要多出二萬六千噸。

這農場名爲『史太林同志』，並不是異乎尋常的農場。主席叫作庫西挪伊凡諾維奇，札克瓦脫金，年紀五十五歲，相貌堂堂，機警老練。他在帝俄時代就生活此地。他對我說當時的農民人人無地可耕，他的一點耕地劃分爲幾條，每條闊不過幾呎，東邊一條西邊一條，耕種起來極爲費事。他有一條闊僅三呎的田地，天還沒亮就去工作，直要做到半夜，而還不過是『爲他人作嫁衣裳。』迺茲辛親王是當地所有森林以及大部分土地的主人。札克瓦脫金用自己的馬爲親王工作，得點食糧以供一家之需。村裏沒有什麼醫生，五個村莊合有一所學校。俱樂部 and 圖書館是聽也沒有聽見過的東西。霍亂和傷寒流行，但是誰也不想點辦法。

等到革命成功，所有田地就成了全村人民的產業。勤勞的人率先努力，但因爲沒有機器，馬匹稀

少，做不出什麼事情來。到了一九二六年，三十個農民合了起來租用一部曳引車，札克瓦脫金是其中之一。在一九二九年，其中的十二人組織集體農場。另外說服一百二十人前來參加。可是看看再說的人多到三百，袖手旁觀，只知道耕自己的田地。

集體農場的會員們把各個人的耕地合而為一大塊，雖然這塊地的平均質地並不優良，缺點却用科學方法拿來補救。他們種十五畝地捲心菜，十畝糖菜，十畝胡瓜，七十五畝山芋，五十畝燕麥，四十畝裸麥，大家合有十五匹馬，足夠耕田之用。各顧各種的農民之中，有許多沒有馬匹，一部份田地無法耕種。集體農場的胡瓜山芋出產，吃用之後還有多餘，賣給人家，得款大家公分。因為種植用心，剩餘的出產一年多過一年。集體農場證明集體有利。但是直到一九三五年，所有農家才全體加入。

這農場的主席札克瓦脫金說：『我們開頭集體化時，除了各人的房屋之外，什麼東西也沒有。現在是有穀倉，有了電燈，有了七年級的學校，有了幼稚園，俱樂部，兩個花房，雞棚和一個牛奶棚。會員可以把小兒女整天放在幼稚園。他們日吃三餐，只需二角錢膳費。』

經營集體農場是民主化的。主席和七個委員，係由會員全體大會時以秘密投票選舉出來。反對或擁護候選人的演說由你滔滔而作。當時的七個委員之中，二位是女的團長，一個主持幼稚園的姑娘，一個做溫室工作的婦人，一個七十老翁，二個出征士兵。『戰爭一起，十八到四十五歲的男人個個動員，我們就成了個婦女集體農場。』主席和我說這一句話時，並不吝嗇歎息，而是得意揚揚。

工作人員分成八團，每團四五十人，各有一團長主持。團又分而為『連』，每連四至八人。各連

互相競爭，例如看誰耘地最多。最好的工作者的芳名，每月寫在榮譽冊上。團則與鄰村的團比賽。每年六月，雙方各派代表，研究對方的方法。代表們把研究所得報告全體大會。區與區之間也比賽成績，政府對於最好的區集體農場，獎以紅旗。

主席又對我說：『我們以種山芋爲主，努力之點是要每畝的產量越來越多。我們已經吃完了自己所種的山芋。』

我問他：『這怎麼說？如果吃完了怎麼能種呢？』

『容易得很。我們只要留下小芋，其餘的就可吃掉。我們比以前出產得多，每畝有到十六至二十四噸。戰前用人力種植，從來不出五噸。戰時雖只有婦孺工作，耕地也多出四分之一。我們的人手比前要少，但獻給政府的却比戰前要多到三倍。』他說單在一九四二年夏天，蘇聯兒童在集體農場所做的成年『勞動日』，就達一億零八百萬之多。

我們走進馬拉的大車，坐在乾草堆上，到了花房，去看看他們的奇跡怎樣完成的。

工錢制度有趣之至，設立一種標記，以爲普通一工的工作量。例如耘地二畝半就等於三工。工作者如在一天耕到此數，就再算三工。耙二畝半地則作爲半工。

集體農場的嚴守規則，是工作必求其質，草率了事的得重新做過而並不加錢。有些婦女一年得到四百五十工錢，冬天的星期日休息，但在夏天，却只有落雨天才停工。

集體農場的出產如能超過規定數量，政府予以紅利，此外各團如生產甚豐，也有外快可得。山芋

每畝產六噸是普通定額。凡超過定額之量，其中的百分之二十五分給團員。

收穫之後，農場以若干數量售給政府，價錢照一定規定。然後留下做種子喂牲口的一份，其餘的歸各會員分，按照他的工數。

我要求他們供給我在數字，好知道普通工作者到底能有多少收入，主席告訴我上年的數字，每一工得山芋十磅，穀半磅，甜菜和蘿蔔三分之二磅，別種蔬菜三磅三，還有五個半多一點的盧布現款，工作者的這些收入，得以出售於公開市場。

我就問他：『假如把一切全賣給了公開市場，值到多少？』

札克瓦脫金回答道：『你必須記住每一家庭還有自己的園地約三千方碼。在這裏可種山芋大蒜和別的蔬菜，還可以養雞養豬。這些東西大部份賣給公開市場。』接着他辛辛苦苦算出各種東西售給公開市場的所得：總計一年有九千盧布。當然不能賣出此數，因為家裏要吃去許多。不過無論如何，一個集體農場會員的生活，一般而論過得很好，且有不少現款收入。食物之中只有糖比較缺乏。家家收聽無線電，有幾家還有照相機。小孩子騎着三輪腳踏車——都是革命以前做夢也做不到的享受。

戰時集體農場農人和出征士兵的關係極為密切。有一個殺敵農人成了蘇聯英雄，有許多榮獲勳章。陣亡或重傷戰士的家庭由集體農場照顧。受傷回來的戰士有特種工作可做。

農場的工作並不是單調乏味。俱樂部裏每星期開映電影三次。年輕人差不多天天晚上在跳舞。會員組成的劇團每個月演戲三次。還有合唱團，體育班，講演。就連幼稚園裏的小孩，也能跳舞擅背

誦，表演起來很爲精彩。

但是使俄國鄉村面目一新的事物，不僅是集體農場一樣。常爲外國觀察家所忽視的一件大事，是合作運動。合作大組織有三。其一是全俄病廢人聯盟。這是手工業工人協會，會員是出征時受傷殘廢的戰士。病廢的裝訂工人合在一起工作。金屬工人亦然。這組織的會費比別種合作社要低，政府又予以減收捐稅的優待。

第二個是極重要的手藝生產者合作會。組織和病廢人合作大同小異。但並不是全聯邦性質。各共和國各有這種合作會，生產數量極爲龐大。例如一九三七年時他們出產價值二億八千萬美元的貨色，到一九四〇年，達四十六億美元，利潤有到六億元。

消費合作是第三個大組織，而與農人的利益特別有關係。合作社數達二萬，遍布全蘇聯。社員爲普通農民，目的就在爲他們服務。

每一鄉村有一店舖，屬於遍布全蘇的消費合作。規模不大，有職員二三。和平時候凡是農民所需的物品應有盡有，諸如麵粉，穀類，通心麵，裸麥麵包，肉，糖，鷄，魚，鹽醃青魚，牛油，脂肪，香腸，雞蛋，乳酪，罐頭，茶葉，山芋，鹽，蔬菜，汽水之類，或者另有布匹一部。

蘇聯的合作組織，既自由而又民主。當地農民經營他們自己的分社。經理由秘密投票選舉。會員大會至少每季一次，其民主與任何蘇聯的組織一樣。

舉行於莫斯科省巴都丁鄉的地方合作集會，可當作一般大會的例子。這一鄉有合作社七個，因爲

別處幾個鄉村的合作也在這裏辦理。出席者一百九十人，十九是壯健的婦女，其中一百零二人有投票之權。主席康特拉西伏衣報告去年社務。接着是羣起發言，紛紛討論。

對於批評並無限制，庫立科夫說他認為收集廢物如洋鐵罐，舊鞋子，破布頭之類的辦法急需改良。斐立普科夫說出售小件農具如鋤耙之類，組織殊嫌效率不足。他又覺得修理鞋子部實屬必須。太帝安說他相信合作社應該多多致力於自己的出產主要用品。梅脫維夫指出合作農場的缺點，它們應該多耕田地，增產牛隻和草秣。貝利基挪稱讚合作社的工作，對於病廢人以及出征軍人家屬的照顧。

經過滔滔不絕的討論之後，對去年合作社的工作予以批准。然後會員們指名經理部，主席，稽核員，會計，出席區會議的代表人選，再經秘密投票選出。

次之是討論財政，盈餘有四十八萬三千七百零三元四角。會議決定把本由社員公分的其中百分之二十獻給政府購買坦克車。經理連任。成績最好的七個工作人員致酬勞八百元。我通讀該社去年業務報告，知道全年進出達三百二十五萬六千元。社員增加了四九三人。

討論下年度計劃時的情形，足見蘇聯合作運動精神飽滿。計劃之一是供給人民以糧食和物資供應，不令中斷，增加農場用品如農具之類。社員最切需渴望的物品，由合作工廠製造。第二，重建修理合作商店全部。第三，在合作農場上設法增產糧秣和牛隻。第四，特設一店，專售春夏用品。第五，在巴洛迪拿新設一家合作商店。第六，留起至少百分之二十貨物，以供出征或受傷戰士家屬迫切之需。第七，增加入股股款到八十元，利用新股股款作國防費。這家合作商店的經營真是十分民主。

消費合作機構，自鄉村經區中心而至省，再由省至共和國，最後爲全蘇聯的中央機關，名爲中央聯合。中央機關統籌全系統的經理事宜，計劃生產與交易，獲得必需貨物與資本，籌借銀行貸款，稽核各社工作與計劃，命令製造貨物，與工廠訂立合同。一區遇缺貨的時候，可以經中央聯合定貨。

我會經訪問過當時的中央聯合執行委員會主席西陀洛夫。他致力合作運動，已十六年。他從小合作社的工作人員升到現任重職。最初是一個合作經理學校的學生，畢業後在房屋合作社工作，一九三九年入中央聯合任事。

他告訴我，合作社在鄉間代表一種極大力量。大城市裏沒有合作商店，因政府有專營都市商業之權。不過對於農村百姓，合作社在處處服務。

不論是否社員，都可以在合作商店購買東西。做社員的好處是幫同經營，分得紅利。平時十分之二的利潤分給社員。照美國合作社的辦法，分紅多少視購物多少而定，蘇聯辦法則按入股多少。做社員的還有別種好處，例如戰時有若干物品缺貨，只限於社員購買。若干不予分派的利潤，留作社員全體福利之用。做社員並非難事。年費不過六角，股款平常不出十元。一家有一人入股之後，其餘之人只能購得四分之一股。

合作社於戰勝德國上其功不小。它們在增加農產，以供軍用上大爲出力。發展合作工廠，製造急需物品，因而不致使若干物品釀成嚴重的缺乏。合作工廠所造的物品，範圍甚廣，從陶器玩具以至肥皂桌布。凡是農民所需的物品，差不多十九都是合作社出品，

合作社又盡為政府購買農產品之職。農民在戰爭時期，連自己切需的物品也供給了政府，戰爭勝利，合作社始終願將所有款項供政府之用。購買戰時公債達數十億元，社員捐購坦克之款，亦達一千三百萬元。

德軍所到之處，合作社悉遭破壞，財產或被使用，或竟運回德國。不能使用的又盡情破壞，這種破壞行為，中央聯合有紀錄者數達萬餘。合作社經理被捕之後，或遭槍斃或處絞刑，無一倖免。能逃出虎口者成為游擊隊，其中有許多榮獲勳章，成為蘇聯英雄。

消費合作社是為農民服務的根本分配制度，自由，民主，代表農民的心意。它在提高俄國農民的生活標準，使俄國鄉村離開黑暗時代上，功勞實在不下。

第十一章 工人與職業

在全世界職工會之中，蘇聯的最為龐大，擁有一九一個組織，三千一百萬會員。組織數目之多，三倍於英國，四倍於美國。沒有一個職工強迫入會，但有百分之八十五的有選舉權工人入會。

俄國工會與我們所知道的工會之間，有本質上的不同之處。英美工會的起因，是為工人謀增加工資，改良工作環境。在沙皇治下，這樣簡單和平的運動絕不可能。政治運動起於前，工會是在勞工階級政黨領導之下而發動。我們總記得史太林曾經在故鄉高加索盡力於工會運動，在沙皇治下領導過幾次名垂史冊的罷工。因此俄國工會從開頭就與創造蘇維埃國家的運動合而為一。革命之後，考慮到工會發展的三種可能。其一是要工會控制一切生產，其二是使工會成為政府機構的一部份。列寧和史太林深信工會應為獨立組織，而與黨有密切聯繫。史太林說：『工會構成一般工人階級的前進與落後分子之間的聯繫；聯合工人大眾與前驅者。』這概念並不是硬加給俄國工會的，而是俄國工會歷史的自然而然的正常發展。

蘇聯工會的活動，也有它的特色——我們要記得它們是在與英美完全不同的經濟制度中盡職責。在資本主義國家，工會的最大目的在於力爭工人權利，工錢提高而工作時間減少，工作條件改善。為了達此目的，它們不得不阻止資本家僱用失業工人破壞工人的已得權利。但在蘇聯，既無失業工人，

就無須擔憂這點。

工業的社會主義化，使工人的態度爲之一變。工人爲圖私利的公司服務時，不免覺得工資太低而廠主利潤太高。但在工廠已歸國營之後，工人就覺得即使自己並不能稱心如意，但至少已爲國家盡了一分力量。資本主義的假設是：各人爲自私自利而努力，因而有利於大家。社會主義却反其道而行之：各人只有爲大家工作，然後才很有利於自己。

在蘇維埃制度之下，工錢由合夥人——工人與國家——決定。經濟計劃把工錢總數分配各工業。爲使某一工業增加生產，許其增加經費以付工錢。中央計劃委員會一經決定各工業的工錢，工會就開始與經理部商談協定。這協定每年商定，包括工作時間，每件工資，超過件數的工資，出品質地，工人轉業，工人福利改良，發明的酬報等項。在大工廠裏，工會對於工人之有利於工廠意見者，常派專家協助之。

工廠既然已非私人所有，工會就覺得增加生產，因而使全體工人增加所得，是職責所在。工人們覺得工廠是『自己的』。因此蘇聯工會常有種種獨創辦法，這在美國只是僱主方面的事，工會決不想法使工廠增加生產。工作不力的懲戒，蘇聯比美國爲嚴。工人遲到一二次不過訓斥，但若遲到至再至三，遲到時間又在二十分鐘之上，那麼他就要受懲戒，減薪多至百分之二十五，歷時數月。

一九四四年，蘇聯工會實行了一種『榮譽證書』，授予出品質地合格，而在六個月以上生產逾常的工人。類乎這種的工會舉措，使生產爲之激增，輕工業增加到百分之四十六。在英美國家，增加生

產只是廠主利益，因為賺錢只落到他的錢袋裏。

理論上蘇聯工人有罷工之權，實際上他無意於此，工人與經理目的相同，志在使生產增加到極度。同心協力代替了鉤心鬥角。

但罷工不是沒有。例如一九四六年三月，莫斯科工人罷工抗議空氣流動與其他事項之受蔑視。工會十分求全，有時極不客氣。工人的不滿先由廠中工作委員會審議。通常予以調整。萬一不成，再由集合工人經理雙方代表而成的委員會處理。如再無法解決，就由集合工人經理的代表各一，公平無私的主席一人而成的仲裁委員會評斷。有時則直接提出工會的中央委員會，且由工業部與聞其事。如有政策改變之事，也許提出工會的全聯邦中央委員會與政府。

蘇聯工會的特點，常使英美人士指蘇聯工會並不獨立，只供政府驅使。在另一方面，為蘇聯建設轟伯水閘的工程師古柏，又對我訴說工會的勢力太大。他說：「我們美國不像蘇聯的把工人當作小寶，不會想到供給工人以俱樂部設備。蘇聯的經理如不能和工人處得甚好，說不定因此撤職，經理非與工會多方湊合不可。」

蘇聯的工人決不是「奴隸」。我在各工廠與工人交談多次，總覺得蘇聯工人自視不卑。有一個美國工程師曾說蘇聯的工人完全民主。

英美人士又以為蘇維埃制度的好處，只是給與勞力工人與高官大吏，而不注意勞心人士。其實不然。蘇聯人頗以掃除為害不淺的勞心與勞力之分自豪。凡工作有益於國家者，不論其為作家與掃街，

就視爲一個工人，可以爲工會會員，享受種種權利，蘇聯的工會無所不有，並不限於勞力的工人。

蘇聯工人雖然也大聲疾呼，訴說種種缺點，但知道整個制度絕不是爲某一人士的利益而經營。蘇聯的工廠真有合作精神。有一個昔在美國今在蘇聯的工頭，說在蘇聯他只覺得是個教師而非工頭。高爾基汽車廠的工人，如工作不及預定成績，就自願逾時工作，或者在休息日上工。

不同的制度有不同的刺戟。在蘇聯有利可圖的強有力動機是沒有的。蘇聯人民決不能夢想以別人勞力使自己成爲百萬富翁。但這不是說蘇維埃主義並無打動爲己之處。史太林相信只要與公共福利同時並進，爲己並無害處。他就在努力建設一種獎勵成功而無私人專利私人營利的制度。

工錢由成績決定。工作越多收入越豐。我於一九四四年在莫斯科遇見的一個貨車司機，每月收入多到合六百美金。各個職務的工作有一個規定，超出這規定越多，進益越豐。收入之有多少，有人歡呼也有人批評，說是有背於社會主義原則。史太林說並不如此：「這些人顯然以爲社會主義要求平等，要求拉平社會全體人民的需要與個人生活。這種說法之與馬克斯主義一無相同之處，無待多言！」馬克斯的平等不是說個人的需要與個人的生活平等，而是指（一）一切勞苦工人同離剝削苦海，在資本家被打倒清算之後。（二）在把生產工具的私有變爲全社會公產之後，大家就同受廢除私有生產工具之利。（三）大家同有各盡所能的義務，同有各取所需的權利。而馬克斯認爲人的能力與需要，在質與量上不是也不能平等，不論在社會主義時期也好，在共產主義時期也好。」

一九三一年，輕工業的工錢增加得比重工業的快，結果史太林對經理說：「我們必須定一工錢規

定，以示熟練工人與非熟練工人的區別。不應該讓一個煉鋼廠的良工，與一個掃地工人收入相等，不能夠讓一個火車司機的工錢，只及一個膳錄生的薪水。」

工錢多少，也要看這種工作的工人的多少。倘如有本領的工程師和經理的人材難得，他們的薪水就比下級工人為多。銅匠的工錢在一九三二年時付得極高，因之有許多年輕人就學這門行業。

不過工人的努力工作，最大刺激還在於他們知道自己的努力有益於公共福利這一點。他的勞力或者是為增加日用物品，使人人不愁缺乏，或者是有助於建設重工業，以為將來製造日用品的基礎，或為國防所必須。他們的勞力一點也不是為了私人財主或是竊取利潤之徒。所以和平時期蘇聯工人的熱心工作，就不下於英美工人的戰時努力。

蘇聯工業中促進努力生產的另一刺戟，是工人們要人注意要人認識的欲望。每一個月，工廠門外的大揭示板上，總張貼着最好工人的玉照大名。良工巧匠得到獎章獎金，受人稱頌當作模範。反之偷懶誤事的工人，也被揭示姓名，使成衆矢之的。有幾個工頭告訴我，使工人不無故不到不懶洋洋做事的最有效辦法，無過於這種獎善懲惡的方法。名列劣工的工人，受盡同事指責，非一改舊習不可。政府對於常人的好權勢欲望，也予注意。最有專長的工人擢升晉級，得居重要地位。創造有功的亦受獎勵。凡能發明增加生產或者減低成本之法的工人，無不獲得大量獎金，擢升位置。

所有工人各得休假之期，工錢照付，成績最好的工人，更能前往名山勝地，悠游一個時期。一九三九年我往游雅爾達的沙皇避暑別宮，但見這個昔日帝皇宮殿，今已成爲鋼鐵工人的休憩之地。昔日

宮廷寵臣尋歡作樂的黑海溫水之中，精緻幽雅的花園之內，今由工人游泳其間，閒步其中，可見俄國的變遷爲如何了。

「隊伍精神」是一切蘇聯工人的重要特質。競爭並沒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滅亡。蘇聯利用人類的運動本能來增產物品。各廠各農場彼此競爭，所有工廠在某一製造上與別廠比賽，看誰最爲優良。就在一廠之中，這一集團也與那一集團爭勝。

競爭的熱烈無以復加。平時與戰時一樣，工人自願增加規定產量。古柏對我說過，在建築聶伯水閘時，工人接二連三的超過規定工作。政府原規定澆好四十二萬七千立方米突水泥，工人却計劃增至五十萬，實際又增至五十一萬八千。他又說競爭之心熱烈到許多工人情願工作到超過規定時間。

而在彼此競爭之中，又有一個非常特點，那就是勝者援助敗者。代表團派往這廠那廠，學習較好方法。這種幫助別人，有時候取着有組織的提攜形式。甲廠也許「領養」乙廠，扶助教育。最强的扶助最弱的，雖然方法總是彼此互助。常常某一工廠「領養」附近的集體農場。廠方供給教育與技術以助農場，農場以食物回報工廠。

競爭的最高發展，是起於一九三五年的史太哈諾夫運動。首創其事者是一個年輕礦工史太哈諾夫。這運動是以利用科學使工作輕快迅速爲本，史太哈諾夫應用之於煤礦，成功之後傳誦全國，這運動就如火燎原，工業間工廠間個人間的競爭如火如荼。史太林看到這是一個絕好增產機會，使工人意識到應用科學於生產上。於是組織集會，使這個觀念普及全蘇聯。

史太林說參加史太哈諾夫運動的是：「大都爲年輕或中年男女工人，有教養和技術知識，在工作上顯出精細不苟，知道工作上的時間因素，不但計較到一分，而且計較到一秒。大多數受過最底限度訓練，仍在繼續受技術上教育。他們沒有若干工程、技術、行政人員所有的那種保守和滯鈍；他們勇敢前行，粉碎古老的技術標準，創造新而高明的標準；他們對於工業領袖擬定的經濟計劃，以及設計能力上，加以修正貢獻。」

結果在頓河盆地的礦工，增加產量倍於德國魯爾區的產量。列寧格勒鞋廠的生產，比世界最高紀錄還要超出一半。高爾基汽車廠又超過美國福特車廠的若干紀錄。

英國工會訪蘇代表團在視察蘇聯工業之後，作結論說蘇聯在技術發展上不會落在英美之後。他們說工廠的秩序與清潔或次於英國，但就產量而論，不相上下。

公然批評共產主義的根本，在蘇聯自然不容，但於蘇維埃生活種種方面的批評，却受到鼓勵與嘉獎。史太林不但力促各廠各礦的工人公然指摘廠礦內部的不妥之處，並且在演說中指點出批評之道。一九三三年他向黨大會提出的報告中有云：「黨先發展了廣泛的自我批評，使大家集中注意於我們的建設工作缺點，我們組織和機關的缺點……中央委員會在一九二八年七月二日的告黨員國人書中，籲請本黨與工人階級的所有力量發展自我批評，「從上至下從下至上」，不管對方是誰。」結果報紙上登載的自我批評川流不息，抨擊無效率與行動錯誤。

史太林深信只要一切根本的生產與分配工具爲國家所有，失業已不存在，那麼就必有比西方各國

更爲名副其實的經濟的民主。

他在對我說這一番話時表示他的信心：『蘇聯工廠作坊之屬於全民而不屬於資本家，不由資本家所派的人手經理其事，而由工人的代表主持這件事實；工人的工作不是爲了資本家，而是爲了自己的階級這個意識，在促進工業的發展與完滿上有無窮大力。我們不能忽視蘇聯工廠的經理，十九就是工人，由最高經濟會議與工會協商後任命，而每一工廠的經理若與工人或該廠工會的意思相反，就休想安於其位。』

『又必須記得一廠有一廠的會議，議員由工人選舉，監察該廠經理部的行動。最後必須看清每一工廠有定期舉行的工人生產會議，大家參加，也討論經理的工作，注意錯誤與缺點，由會、黨、行政機關來加以糾正。所以不難明白這些環境是如何急劇轉變了工人地位與工業狀況。在資本主義之下，工人視工廠若牢籠，在蘇維埃制度之下，工人把工廠當作和他相親相近的東西，念念不忘於工廠的發展與改良。』

我們無論如何必須承認工人們身受到種種真正的好處。工作時間縮短。到戰爭爆發爲止，每天七小時是常規。現在爲了復興重建，八小時成了標準。但一有可能，就會減少到七小時。

我在莫斯科時認識了一個英國人瓦次，戰爭爆發，他就投身莫斯科一工廠做工。一九四六年春，他從高加索一個療養院寫信給我，報告戰前工人所享的權利，十九已經恢復：

『以我而論，這就是受到（一）減少工作時間。（二）此後三年中工作十一個月而得工錢十二個

月，另加工錢一月，以補償我在戰時的不得休假。(三) 每年得休假一個月。(四) 住療養院一月，需款不過三十六元，包括旅費食宿，跳舞電影等一切娛樂，極周到的身體檢查，礦泉浴，電療等等。

到療養勝地之舉，我起初遲疑不決，因為其地離莫斯科一千二百五十哩，怕火車太擠使人難受。誰知有專車供給我們。車上的乘客東西南北之人全有，目的地和我一樣。療養院裏各色人等俱全，主任、工人、將軍、士兵、水手、醫生、俄國人、韃靼人、愛沙尼亞人、阿美尼亞人、猶大人、羅馬尼亞人、南斯拉夫人。實在我有生以來，從沒有見過這樣一個各種人物的展覽會。」

從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〇年，蘇聯的現款工錢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四。實物工錢也有增加。雖然當時的俄國集中全力於機器與軍備，日用消費品也在增加。長短襪子較前倍增，糖果多到十五倍。日用消費品既見增加，工人的實物工錢自然勝前。美國全國勞工關係局局員史密，對蘇聯工人處境努力研究，曾謂：「過去二十五年蘇聯工人處境的改善率，遠勝於任何國家任何時期的紀錄。」

我們要明白這種種發展對於個人生活有什麼意義，只有目擊蘇聯工廠制度的動作情形。我於一九四四年參觀莫斯科一家大工廠「戰鬥者」。一進廠門，就見大幅標語，上書：「盡我全力，支持我們的英勇陸軍，英勇海軍。全民盡全力打倒敵人。向勝利前進！」又有漫畫一巨幅，畫納粹大靴踐踏男女老幼。

有人引導我們到總工程師史貝羅的辦公室，此人年方四十，精明幹練。一九三〇年畢業於莫斯科工程學校，曾在車床廠任職四年。戰時他真個一天工作達二十四小時，吃飯，工作生活，都在廠裏。

他說戰爭之前，本廠製造唧筒和壓榨器，大都供油業之用。戰時的改造軍用物品，實在是困難重重，因為良工巧匠，已經出征前線。父老姊妹，妻兒弟弟來代替工作，生手工人中十分之四是婦女，大家熱心工作，而惜乎未經訓練，效率不足。爲了應付難局，凡有經驗的工人都做了教師。

除了這些困難之外，一九四一年八月，德軍又猛炸本廠，屋頂全毀。可是雖然如此，生產還是一月多過一月。有一個工人對我說：『我們十二分努力工作，好像供應前線，只有我們一廠，好像戰局勝負，全靠我們一廠。』不久他們的生產突飛猛晉，而工作人員反而減少。

工人的精力令人吃驚。我問工程師：『你用什麼法子使他們工作得如此迅速？』他的回答是：『愛國情殷就足使他們加緊工作。社會主義的競爭在處處實行。各廠都在作生產比賽。他們致力於改良組織，大量生產，提高質地，減輕成本。本廠同三十二個油業工廠比賽，以求造成每個月的最高紀錄。自從戰爭爆發，我們七得冠軍，此外也不出前三名，每勝一次，得獎二十萬盧布。其中十分之四，用於文化方面。十分之六作爲分紅，工人和工程師各得若干。』

他又講給我聽有一個名叫茜絲契夫的女工，年齡還只二十二歲，生產之多，兩倍於原來規定。等她下班之後，須有兩個人做她的工作。這種工人除得額外工資以外，物品配給上也受優待。

戰爭越來越兇，本廠的困難也越來越甚。交通奇難，八百工人只好住在本廠所建的宿舍。煤的經常供應中斷，廠裏只好用煤灰和以石油。食糧缺乏，大家就開始種地二百畝。現在有了九十隻豬，十五隻牛，許多隻雞，在一九四四年夏，他們出產了三百五十噸山芋，以及捲心菜蘿蔔之類。

我們去參觀時，所有工人正在本廠食堂裏吃飯。飯錢不一，看吃客的收入多少而定。一天在食堂裏吃它三餐，約費一元左右。十分之四的工人，就在這裏吃包飯。

我很想知道工人之中有多少是共產黨員。工程師對我說：「大約二成。不過共產主義青年團在外；而我不知道廠裏究有多少團員。工人無不加入工會，工會管理我們的社會保險和休息之家。」他還告訴我廠裏有史太哈諾夫運動者千人，他們的生產數量，經常超過標準。

管理工廠，黨部工會與董事部三者共同協力。彼此之間一無摩擦，當然沒有罷工。工廠委員會由工人選舉。各班集會提出候選人。工人有權為候選人作聲援，也可以為反對某一候選人而侃侃而談。投票後來舉行，用的是秘密投票。

每星期有一天休息。戰時年假取消，戰後即行恢復。廠裏有免費診所，醫生三人，還有免費牙醫和配藥處。有幼小孩兒的女工，可以把他們寄放在育嬰處，有一定時間供給她們去哺乳喂食。

廠裏和蘇聯各廠各農場相同，有文化活動。每星期有跳舞電影幾次。廠裏的流動圖書館藏書達兩萬冊。附近設有商業學校一所，廠內設有史太哈諾夫學校，教授增加生產的方法。又有各廠常有的壁報，由工人主持其事。壁報板上有一大佈告，題目是：「我們青年團員為解放頓河盆地所同意的工作。」下文是「我們要在工作完畢之後製造兩件壓榨器；修理一件；我們要在工作完畢之後去電氣廠修理摩托；我們要送他們三部變壓器；我們要捐送一千本書籍；我們要募集十萬盧布送給他們。」

在一大揭示板上貼有十四個最好工人的像片，還有幾個「不上工者」和「懶漢」的姓名。好工人

之一是年輕貌美的伊沙托娃。看她外表，真想不到是個最好的桿子工人。我打聽到她在故鄉斯摩倫斯克淪陷敵手時候，曾在莫斯科機關工作。她父親因有游擊嫌疑，被德軍把他活活的餓死。她母親在故鄉光復之際，已經奄奄一息。當她一聽見父親慘死敵手之後，就辭去寫字間工作，到本廠來做女工。她明知這不宜於女子，但一心想給無惡不作的德軍受點報應，就立志要造軍火。進廠不久，工作就勝過同事。她做了「前線」團領袖。雖然身體嬌弱，却研究節省動作與時間的方法。她在本團裏節省工人而增加生產。她的方法由本廠作為模範，全體應用。

我對於廠裏的報紙極感興趣。報名戰鬥，為黨部工會董事所合出，由人人用作褒貶之地。有一篇文章頗為「爲什麼我沒有做到應盡之職。」作者訴說他初進廠來派做最困難的車床工作，而他並未受過實際的訓練。工頭在他工作時間教他，妨害了他的生產。他力說教導應在上班之前。另一篇文章指責洗衣作的經理。圖書館員力請工人們要記住「書是社會資產，而且得來不易。要好好珍惜，看完立刻歸還。讓別人也有一讀機會。」又有一篇文章，是諷刺有人攫取別人應得的白麵包享用。

我在蘇聯時，和勞動報（工會出版）的主筆奧爾欽珂常常討論。據他說來，工會毫無理由不與政府合作。問題是這種合作必須是利於工人階級。他說蘇聯政府與工會合作之下，消滅了剝削和失業問題。工人的健康，母子的福利，老年人的生活維持，比西方各國進步得多。「同時我們的工會經濟獨立，不靠政府。以會員會費作基金，進行自己的事務。我們的工人有種種事實作根據，認爲我們工會的民主，爲世界各國所不及。」

第十二章 文化是爲人民全體的

遊歷蘇聯的外國旅客，開頭總不容易明白蘇聯人口中的『文化』這個字眼，到底是什麼意思。文化文化是常常聽人說及的，但是把文化和文藝復興時代大畫家及交響樂聯在一起視若一物的人，聽了之後往往莫明其妙。革命之前，俄國人多爲文盲，生活艱難，那裏有什麼閒暇問題，想到使生活更多享受的東西——文化。革命之後，政府就盡力使教育文化或同義異名的東西獻給人民全體。音樂，繪畫，戲劇，文學，科學，教育，無不旨在發展蘇聯人民的廣大參加。一方面蘇聯人民也知道俄國自有歷史以來，有這種享受文化的大好機會，實屬始於今日，所以響應之熱烈與鄭重，足使將來的蘇聯獲益不淺。

蘇聯人常常排隊等買書籍或日報。我們要知道這是表示多麼的今昔不同，就得想一想沙皇治下的俄國。我在一九一六年居俄國時，平民的求知好學，簡直視作犯上作亂。我在土耳其斯坦想給第一西伯利亞聯隊兵士辦一個青年會俱樂部，費了多少唇舌，經過許多週折，才得到克魯巴特金將軍的許可，但他附有警告：『不得備置書籍，我們不要兵士用腦思索，只要他們服從。』

我到時有人告訴我俄國文盲到十分之七以上，土耳其斯坦的受壓迫民族，更多目不識丁之人，一百人中能讀能寫的只有一個。據官方正式表示，兵士的識字人數比例，比普通人民爲多，因爲兵士限

於青年。不久我就發覺官方的統計毫不可靠。許多號稱識字的士兵，連家信也寫不來。我們只得請好一個職員，一天到晚坐在俱樂部，給士兵代寫家書。信並不長，但等着的人總是長長一大隊。

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我去前線觀戰，對於士兵智識程度的前後懸殊，不覺大吃一驚。紅軍是教育程度甚高的軍隊。一年之中寫給紅軍的信件，達幾千萬封，單是一九四五年的半年之內，送往前線的日報，多到四千五百萬份。

文盲衆多還不是使沙俄落後的唯一要素。全國學生都受諄諄教誨，對陛下只能默默服從。成見和迷信竟予培養。當代的社會問題和現代科學則視爲違禁之物。歷史並不涉及現實，滿紙空談。例如日俄戰爭之後，旅順已爲日本所有，教科書上還是『旅順者俄國之軍港也。』就連俄國大思想家大學家的著作，也禁止擅入學校。初級學校的學生不准讀托爾斯太的『戰爭與和平』。而在蘇維埃政府之下呢，戰爭與和平的印行數量，多到四千萬冊了。

不過雖在沙皇治下，俄國也有着一種暗藏的教育統系，更現實的教育着幾千人民。這就是影響俄國至深極遠的地下革命運動。這運動使人民重視學問，尊崇科學，渴望知識。當有人問列寧青年的三大重要工作是什麼時，他的回答是：『第一研究學問！第二研究學問！第三更多更努力的研究學問！』這正是新俄羅斯所念念不忘的工作。

革命之後蘇維埃政府的當面問題，真是千頭萬緒。布爾塞維克亟欲在教育上有所建樹，但在最初幾年，他們的全副精神要對付內憂外患，封鎖飢荒。那時候我在莫斯科，住在一個俄國人家裏。這人

家有一女子任職學校，但她十分反對布爾塞維克，拒不到校上課，堅不接受布爾塞維克的邀請復職。和她一樣不明大義的學校教師，為數不少。

教員的反抗和反革命分子的活動，遂演成教育上的趨極端實驗。兒童權在教師之上，計劃自己的功課。課本大部份棄而不用，一則是含有沙俄的思想餘孽，二則是新教育理論重生活不重書本。爲了明白勞動問題，學生們一天工作一二小時，宣傳充塞學校。兒童們熟悉了階級鬥爭，馬克思，資本主義的罪大惡極等等，同時對若干智識却不免忽略起來。

可是新的教師逐漸訓練起來，局面已慢慢穩定，學校也回復到考試教練的方法。教師對學生仍有威權，功課與作業嚴格規定，課本，考試，級數重爲教育制度的一部份。學生仍有學校會議，幫同學校當局使學生遵守紀律，旅行遠足仍有，但一學期不過二三次。宣傳依然。

這時期蘇聯教育的第一件工作與最大成就，是掃除文盲。這工作艱鉅之至。舉例來說，許多民族甚至於連字母也沒有，就是一個必須克服的困難。於是爲許多非斯拉夫民族實行拉丁字母。就連中國人，蒙古人，土耳其俄羅斯人也有了他們自己的課本，用拉丁字母。這樣一來，一九三八年時才能印行了一百一十種不同文字的書籍。

到一九四五年，蘇維埃政府確實教育了一萬萬人民能讀能寫。這是史無前例的成績。試以印度來比較，英國統治印度已幾十年，文盲之多，還不是和革命之前的俄國一樣。蘇聯的有此成就就是把每一個機關組織都當作教育統系的一部份，把每個人民都當作學生。各工廠各農場各機關各有學校成立。

凡能讀能寫的成人，都鼓勵他們作義務教師，爲文盲服務。到一九二五年，爲成年文盲設立的學校，已達五千所。到了一九四五年，不識字的人民已只佔全人口百分之十。而且都是老翁老媪。到了目前，蘇聯已經沒有什麼文盲存在。

從七歲到十五歲的兒童，非入學校不可。本來強迫教育提高到十八歲，惜因戰爭不得不暫緩實行。一九四〇年時入學兒童達二千五百萬。納粹入寇當時，有學校十七萬所，學生超過四千萬名，包括成人在內。這就是說蘇聯的人民之中，每五人中就有一個在學校讀書。

在若干落後的民族共和國，進步尤爲驚人。在阿美尼亞，入學人數比一九一四年增加到六十八倍，阿什爾貝然增加三十五倍，克爾吉齊亞增加一百七十二倍，士克美尼亞三十七倍。塔迪基斯坦在沙皇治下並無一所學校，現在却有了二萬二千名學生。

從一九四三至四四年起，政府試把第一個十年級的學校男女分校。實行這個制度的有七十二個大城市。所以分校的理由，是因爲男女兒童之間，體力與智力大有分別，分校受業，得益非淺。現行教育系統，始於育兒院，入院的是嬰孩和三歲半爲止的幼兒。這種『學校』歸健康部管轄，各業均有設置，戰時急劇發展，添設夜院，以應做夜班的母親們需要。在這裏小孩有浴可洗，有飯可吃。其餘的教育由教育部管轄。從幼稚園起到『十年學校』，前者收三歲到七歲的小孩，後者收七歲到十七歲的兒童。十年學校原爲強迫教育，本擬遍設全境，戰爭突起，使許多小村小鎮只得維持七年學校，學生畢業於這種學校之後，可入技術高等學校，四年畢業，學習科學教育醫學藝術。一九四〇年成立勞工

儲備學校，包括鐵路學校，供金屬或石油工人進修的工業學校，以及為期半年的手藝學校。到一九四二年夏，這些學校的學生達七十萬。學生於讀書之外，仍做每日八小時工作。入學者得住住宿全膳之外，工錢也能多得一半。

最後是高等教育。我在莫斯科時，遇見俄羅斯共和國的高教處長卡夫太諾夫博士，他說起：「革命之前，俄國一共只有九十所高等學校，學生不過十一萬二千人。但到一九二八年，高等學校已有一百五十二所，學生十七萬五千人。德軍進攻當時，更有到七百所，五十五萬學生。即在戰時，每年入高等學校的新學生，也有到十五萬至十八萬人。高等教育的師資，需五萬二千人之多。」

受大學教育的機會，只有才智的限制。獎學金除學費之外，還供膳宿及一切費用。學生成績「優等」者，人人可得，成績列「甲等」者，大多數可得將畢業研究補助費，每月一百四十至三百盧布不等。已畢業者可得七百之多。宿費不過七到十二盧布一月，膳費省一點的一天只要四盧布。

博士又告我目前學生得獎學金者達百分之九十五。這就是說蘇聯的男女青年，只要力能循序升學，就可以研究他們所好的任何學業。在沙皇治下，大學生百分之六十是富家子弟。在今日革命政府之下，半數大學生是工人子弟，其餘的半數之中，大部份是農民兒女。

蘇聯大學的校務會議，由教職員與黨部代表學生代表而成。新教授由會議秘密投票選出。校長有否決權，但他的反對，校務會議可上訴之於上級教育委員會。

蘇聯的青年渴望深造，倒使政府擔心起來，怕工業農業方面因此缺乏有才能技工，設法使青年進

勞工儲備學校。中等學校已經成立學費制，使經濟上比較富裕的家長繳費。軍人的子弟兒女可以免費，蘇聯的家庭幾乎沒有一個沒有軍人，所以雖說收費其實等於全免。

除了正式教育之外，還有補助教育，那就是戰時創辦的蘇伏洛夫學校。這種學校教授一般課程，不過每星期有軍事教育二小時。它是爲優待父親死於戰場或戰功卓著者的兒子而設。想入學的學生極多，一九四四年在加里寧的蘇伏洛夫學校招考七十名學生，投考者竟達一萬二千名。學生們對我說，他們之入蘇伏洛夫學校，並不是想做軍人，畢業之後，仍擬投考大學，與別種學生一決雌雄。

戰爭也沒有破壞蘇聯的教育。一九四四年的教育，公共衛生，社會福利經費，仍有五百十億盧布之鉅。一九四五年更多到六百六十億。而這兩年正是蘇聯拼命肉搏，爲生死存亡而戰的年頭。

戰爭期間，大學教學如常。研究科學和醫學的學生，可以免除軍役。我在列寧格勒時，目擊德軍的大砲彈如雨下，而學校弦誦不輟。甚至於敵人的包圍圈已經封得水洩不通，第二所醫學院還在開辦。什麼危難都不能打斷原來的計劃。學生和教職員在敵人砲火猛烈掃射之際，就避到樓下，依舊教授上課不停。休息期間，師生就構築防禦工事，掃除殘磚斷瓦，爲受傷之人包紮急救。雖在如此處境之中，或者就因爲受此苦難的激勵，差不多有半數以優等畢業，三分之一成績極佳。但列寧格勒的教育情形，確爲一例罷了，戰時蘇聯的學校師生，都是這樣孜孜不倦，同時蘇聯的領袖與人民，無不重視教育，不論戰事緊急到怎樣地步。

求知好學之心的熱切，不限於正式的學校學生。許多不能繼續深造進入大學研究的人，刻苦自修，

用心補習。美國人名叫司各脫的，在蘇聯工廠裏做工多年，著一書『在烏拉爾那邊』，描寫他的同事們道：『每天晚上，從六點到十二點，電車公共汽車裏擠滿上學放學的成年人，討論來布尼茲（德國大哲學家大數學家），黑格爾，列寧的學說，在膝上做功課，活像急來抱佛脚的紐約市學生，在紐約地下鐵路車中預備考試功課。不過這些好學不倦的俄國人，並不是少年，也不是預備考試。他們是普通俄國人民，想把落後幾世紀的學問，迎頭趕上。』

由革命所造成的求知好學之情；又可見之於書籍銷數的激增。在一九三一年時，出版書籍不過二萬六千種，銷行八千六百萬本。到了一九三九年，種數增到四萬五千，銷行七萬萬冊。尤可注意的一點，是蘇聯的書籍永遠求過於供。著名作家像蕭洛科夫和西蒙諾夫的作品，一印就要印到四百萬到九百萬冊，而且不出幾天就已銷行一空。

蘇聯的讀者是嚴肅的。銷行非小說書籍不是難事。像伏爾泰，亞理士多德，達爾文，牛頓，柏拉圖，派夫洛夫等人的大著，一印就印到幾十萬本。文學上的古典名著，更受讀者歡迎。像拜倫，巴爾扎克，海涅，哥德，雨果，狄更斯，左拉，羅曼羅蘭，法郎士，莎士比亞，席勒等人的著作，一銷就是一百萬本。

因為讀者的求書若渴，永不滿足，所以著作成爲蘇聯收入最豐的職業。像寫頓河農民有名的蕭洛科夫，簡直是目前蘇聯的最大富翁。

日報的發達也是令人矚目的現象，而且也是求過於供。在沙皇治下，日報只有八百五十九種，銷

數不過二百七十萬份。今日有日報九千種，銷數達三千八百萬份。帝俄時代的日報通用俄文，現有各種民族語文版。讀慣黃色新聞的美國人，不免要覺得蘇聯報紙的『沉重』。謀殺如無政治意義者，不加重視，至多給以幾行篇幅。但對於科學上的發明，新的交響樂的第一次演奏，一個名作家名畫家名音樂家的生日，一家鞋廠的成就，却視爲最有新聞價值。凡有編輯發表一件離婚案的詳細情形者，不免受到讀者的唾棄，恐怕還保不住職業。

蘇聯人民對於文化的興趣濃厚，可見之於一九四〇年的統計。八百五十座戲院之中，有觀衆八千萬人。看影戲的人數更多。聽音樂的人數，也有四千四百萬之多。

音樂爲大衆所愛的文化之一。在蘇聯一個有才的作曲家，可以不問外事，專心作曲，因爲政府給他津貼，使他生活無憂。一切作曲家全屬於蘇維埃作曲家聯盟。這聯盟爲會員設法演奏其作品，曲譜的出版，派他們製作樂譜，是一種如兄如弟的互助協會，也是一種同業聯合會。作曲家可以送去作品請求入會，如內容高明或大可造就，就允許入會。

蘇聯音樂在全蘇聯藝術委員會的一組之下，藝聯經費，來自政府的正式預算。一部份經費撥作音樂組之用，以供維持樂隊，出版曲譜，委派作曲家之用。一個作曲家也許要費半年時間，始能完成作品，他提出申請，獲得一筆預支生活費用，八千或一萬八千盧布不等。如作品甚爲優美，還可得到等於上次預支款項的半數，這兩筆預支之款却不在將來版稅上扣除，所以名爲預支，實係津貼。工作完成之後，作曲家就簽訂出版合同，普通總保留無線電與樂隊的演奏權。

作曲家喀却吐林先得到合三千六百美元的盧布去寫作他的第二交響樂，在簽訂樂譜出版合同時，又得四千元。再同無線電台和樂隊簽訂合同，演奏一次得款四十到七十元。他費時三個月完成工作。蘇聯共有交響樂隊七隊，所以這位作曲家的收入大有可觀。當他得到史太林音樂獎金時，他就把來獻給政府，贖買一輛坦克車。

史太林相信他的給予一切高材生以獎學金的政策，開花結果，就是發明與科學上發見的大增。

在帝俄時代，科學遲滯不見進展。俄羅斯帝國雖然地大物博，各種富源應有盡有，但帝俄時代的許多物品，還是來自國外。莫斯科波爾蕭戲院附近的鋪地花崗石，還自瑞典舶來。製磁陶土來自德國。一九一六年時，有一科學家報告俄國缺少氫鉀鎳鈷，足見當時的科學界，如何不知國內的富藏。

現在在蘇維埃政權之下，科學是為全體人民服務，孜孜研究，已經發見國內的蘊藏多麼豐富。在革命之後的二十五年間，蘇聯科學院已派遣五百個探險隊去察勘礦藏，去發見電力資源，去研究土壤肥瘠。單在烏拉爾山區，就有來自六十個研究院的三百多位科學家研究自然資源。他們發見了八百多種礦物，一萬二千多處礦藏。全國的調查繼續進行，但目前已經知道本國所有的鉀比世界上已經發現的鉀礦，多到三十五倍。氫的產量足供必需之用。以鎳而論，即不買進貝茲摩礦，也居世界第二位。大量的鈷在烏拉爾和別處發現。

有人說在社會主義經濟之下，發明家沒有什麼報酬。其實不然。史太林實施一條法律，規定凡發明一經認為有用，發明之人就有酬報可得。這樣一來，發明家就不必等候到發明品的實際應用了。

蘇聯學生和科學，大受發見與發明的鼓勵。證之紀錄，他們已經有所成就。有資格的人士，不愁沒有實驗所和研究設備。即在列寧格勒被圍期間，當地鑄研究院院長伐里戈教授，就得到助手和物資，俾得繼續研究和實驗空氣離子化。科學家，研究家，學生們對於本人有價值發見的報酬，常常辭而不受，有一名叫屈勒戈的人物，發明了幾種鐵路用具，政府致酬七萬五千盧布。他却堅辭不受，說：『我是為蘇聯而工作，不是為圖利而工作。』

一查發見的成績紀錄，就知道促進科學工作的刺戟，在蘇聯並不缺乏。就是簡括的匆匆一看最近工作，也不難知道蘇聯科學的成就多麼可觀，蘇聯科學的範圍多麼廣泛。

例如加倍脫近來發明一種電車，可以從安在道路混凝土下面的電線得到動力。這樣子就不必和電線接觸而得到電流，將來也許可以不再需要空中的電線和導電接線了。

在農業方面，最驚人的發展是直接在地裏栽培出有色棉花來。迄今為止，已有綠色和棕色的棉花出產。這種棉花一方面使布匹不必染色，一方面又不褪色。

在醫學方面，蘇聯的內外科醫生也有卓越的發見。例如波戈摩拉茲博士的血清就名聞世界。在戰時大受前線的歡迎，又發覺對於慢性結核特有效，對於不收口的傷口也有奇效。

又有個女科學家波洛夫斯卡雅，決計用活的病疫微生物（普通是用死的）實驗，看她能否成爲供肺病之用的抗毒素。費了九年工夫，終於發見了一種方法，可以預防肺病。

在土壤學上，蘇聯是世界領袖。他們所成的澳洲土壤地圖，比澳洲自己所製的還要高明。

不少蘇聯科學家名聞全球。科馬洛夫是世界大植物學家，卡普茲亞是低溫度的大師。他是蘇聯的第一流物理學家，據說正在研究原子能。門特爾斯丹發見了光的混合交流現象。庫納科夫研究了生理化學的分析說。法伏爾斯基成就了化學合成的新學說，一整套工業的方法。雷貝特夫是蘇聯人造橡皮的發明人。貝格是現代蘇聯生物化學的創始人。

爲了鼓勵科學與發見，蘇聯不惜鉅款，以供維持各種研究所之用。一九四四年的費用爲十三億盧布。一九四六年時連大學裏費於訓練科學人材的款項在內，多到四十四億盧布。

蘇聯的科學研究機關有這樣幾種：（一）全蘇聯的與各共和國的科學院。（二）政府各部管轄的研究所。（三）大學研究所。遠在十年之前，蘇聯就已有大學七百，研究所九百零八，研究人員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六。

一切文化努力，還有史太林獎金作後援。凡是有傑出成就的藝術家，作家，作曲家，科學家，發明家，均有獎金可得，由政府出資。

蘇聯在不遺餘力，發展人民大眾的智力。這樣努力的結果，當然大有影響於擴大與教化蘇聯的制度與觀念。教育普及既爲民主所必須，那麼蘇聯的如此之普及教育，不論開頭時如何加以管制，結果之必定走上更爲民主之路，是千真萬確，合乎論理的結論。

第十三章 社會主義的生活

人人都急想知道社會主義之下的人類生活究竟怎樣。大家都追問蘇聯「普通」人民的生活到底如何。許多人以為蘇聯人民生活的大同小異，是當然之事。實際上蘇聯普通人民之難於與衆不同，不過如別國的普通人民一樣——雖然蘇聯人民的生活，不像別國如英美那樣的可以有天淵之別。

蘇聯人民生活的不同程度，可以記者的三個熟人來代表。一個是梯君，一個是西君，一個是愛司女士。他們都是莫斯科居民，但足為蘇聯各城市居民的代表。梯是富有的作家，西是薪水極高的銀行經理，愛司是都城飯店的工人。她不是熟練工人，又不十分勤於作事，所以她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低於許多更有代表性的蘇聯工人。

梯君的著作銷路極廣，在莫斯科有一個宏大而陳設華麗的公寓，有書房，有大客廳，有幾間臥房，浴室，設備齊全貯物豐富的廚房。此外又在市外有一別墅，一書完稿之後，他就往別墅休息一時。在戰時這別墅於冬天無法安身，因為暖汽毀壞，像他這樣重要的人物也無從修理起。

西君住在兩層樓的大房子，是他父親的遺產，位於郊外。四圍有花有木，綠草如茵。房子裏陳設很好，有現代衛生設備，有私人電話。戰時莫斯科難民麋集，規定有餘屋的人家，應該騰出來讓無家可歸的難民安身。西君就出租底層，自己和妻子搬到樓上。房間還是够用。

愛司住的是一間頭公寓，和已經長大的兒女同居。房間是舒服的，就只嫌公寓裏房客太多。私人沒有電話，但樓下有隻公用電話可供大家使用。房間裏有隻小爐子，可以煮茶燒點簡單吃食。廚房是同一層樓的六家人家公用的。

房子問題迄今還是蘇聯的一個大問題。政府是用盡全力，一方面建設工業，一方面興築住宅，力謀人民不再生活在革命前的狗窠裏，讓他們有個至少得安身的地方。可是幾千座比較現代化的公寓雖已造好，城市人口還是擁擠非凡，房子成爲問題。且以戰爭發生，破壞了不知多少房屋。房租却非常便宜，一般而論，佔不到租戶收入的多少。

戰前蘇聯的建築，着重在八層十層的大公寓。裏邊有自動電梯，有房客會議廳或俱樂部，由房屋委員會管理，普通公寓有客室一，臥房一，還有浴室。少數還有廚房，但大都是公共廚房，歸每樓的房客合用。然而現在政府覺得公寓絕不是合乎理想的住家，鼓勵興築兩家合住的獨立住宅。

蘇聯房屋建築的最大特色，是每一企業要對於本業工人負相當責任。戰爭時期，有許多工人家庭搬出搬進，搬出時只好放棄房子，搬進時已有人住，糾紛迭起，需要工廠派人解決。經理部的責任，工會和政府都不肯隨便不顧。工會一覺得經理部不盡全力爲工人謀得適宜的住處，就要起而行動。

梯，西，愛司三人，個個日食三餐不愁肚餓，但飲食的彼此不同，也是事實。梯君在家吃飯，因爲收入甚豐，用得起傭人和廚子，在公開市場買點珍品美味。他有時在教授與知識份子工作者俱樂部吃飯，這裏的食品極好。西和愛司同一般蘇聯人一樣，午食在工作地方。差不多每一辦公工作地方，

總有食堂，飯食豐富而售價便宜。工人們在某種情形之下，三餐都在食堂裏吃。食堂由工會派人檢查巡視，如不照章清潔，要受處分。

西和愛司的家裏飯食，也有不同之處。西的收入讓他得在公開市場買點食物以補配給，愛司則和兒女自己來種蔬菜，以山芋為主，地方在莫斯科市邊附近的一塊田地上。這種田地政府免費供給居民，生產出來的東西自吃自用也好，賣給公開市場也好。這是家庭收入的重要輔助。

從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九年我訪問蘇聯時，目擊人民生活標準的大為提高。一九二一年時艱苦萬狀，食不果腹。到了一九三九年，就已人人豐衣，個個足食。街上有冰淇淋糕餅出售，店舖櫺窗裏日用品林立，食品豐富。二次大戰時當然大受影響，但勝利之後，即可復原。

在鄉下地方，就當大戰時期，吃住也不成多大問題。農民各有住屋，清潔得很，生活中心是在既當起居室又當飯間的廚房裏。農民個個食物豐富。我去訪問時他們請我吃新鮮牛奶，雞蛋，蔬菜和雞。他們差不多家家有個園地，養牛養豬養雞，專供自己吃用出售。戰時的蘇聯處處缺乏糖與肉類，農民却有的是別種食物。

梯君有一輛汽車用一個車夫。這却不是他的闊氣，而是他担任着政府委任的重要工作，極費時閒。西君有幸住在地下鐵道線上，在莫斯科出門搭地下鐵道是件賞心樂事。車錢每次不到一角，因為車輛來往次數極多，所以不大擁擠。車上清潔非凡，光線充足，每一車站的建築各有其特色。愛司的住處離工作地方極近，這是便宜之處，足以抵償公寓裏房客嘈雜之失。她可以步行上班，趁電車公共

汽車實在太擠。蘇聯人民多指望將來人人有輛汽車代步，只要是生產成績優良的工人，這個希望不久就能實現。

在別的生活方面，大概除衣着和購買若干奢侈品上力量有所不同之外，梯，西，愛司並無多少懸殊，雖然他們的收入大有高下。在醫藥，教育，娛樂，消遣方面，他們和所有蘇聯人民，彼此的權利機會無所分別。他們的一般生活觀彼此相同，雖然趣味並不一樣。各種工會在他們生活上大有作用。

各工會各有勞動保護委員會，實行有關工人健康和安全工作條件的規定。委員會有權檢查賬冊，察驗安全設備，指派安全視察員。視察員有權在任何時間前往工廠的任何部份，能夠處罰經理部的違背規定。

工會主持着社會保險，諸如女工的分娩福利，疾病和受傷福利，貸款，休息之家，療養院和假期遊覽地均包括在內。不屬工會的工人，只能得到疾病受傷費用的半數，不得向工會借款，不得到各種休息之家。一九四二年的社會保險預算，為一百二十億盧布，其中三十億作養老金之用。偌大經費，來自政府向各工業工資總數所收的百分之三左右捐稅。

一切醫藥完全免費，因醫生越來越多，醫藥的服務也越來越周到。醫學生免費求學，每年畢業的人數達二萬五千。實際上蘇聯的醫生看護全受政府僱用，但在公餘之下，可以作私人業務。政府對於預防醫藥煞費苦心。體育方面與俱樂部裏有五千衛生人員在服務。衛生部設有六百個健康休養所，供工人免費前往，不屬工會的工人亦有此權利。就記者觀察所得，社會主義醫藥的好處，在於得趁早診

療，而診療的範圍又較廣。蘇聯醫學力足以解決疫癘，從事於規模龐大費用浩大的醫學研究。俄國自有歷史以來，打仗而不傷寒流行，以這次對德抗戰為第一次。

女工在生產之前，必須休息三十五天，分娩之後，調養四十二到四十六天。在此期間，工資一文不少。政府爲了獎勵生育以補戰時死亡數之多，做母親的還能得補助金若干。

蘇聯人民的社交生活不大在家庭之內。差不多人人屬於某一種俱樂部，而蘇聯又有着種種式式的俱樂部——游泳俱樂部，體育俱樂部，攝影俱樂部，音樂俱樂部，戲劇社，文學討論團，真是應有盡有，色色俱全。其中有許多和學校或工廠相聯繫，有專家指導會員。

工會在提供一種活潑有生氣，引人入勝的社交生活上又有極大用處。在一九四一年，工會擁有六千四百個俱樂部和『文化宮』，一萬五千個圖書館，一萬架電影機。同一年內工會耗資六億二千七百萬盧布於教育。還有一萬一千戲劇，合唱，管絃樂和舞蹈團。又以一億三千四百五十萬盧布提唱體育。蘇聯人酷愛體育。在沙皇時代，兵士從未見過足球，不知道賽跑網球爲何物。今日的蘇聯是無一學校無體育隊。學生們沒有一種體育不玩上一手。一九四五年冬天，參加滑雪比賽的多至六百萬人。莫斯科有大體育場足容觀眾八萬人，每有比賽，座無虛席。

他們之愛戲劇，尤較運動爲甚。戲劇，舞劇，歌劇，無不觀者雲集。戲院不限於大城市才有，富麗堂皇，演出極佳的戲院，無處無之。座位總是求過於供。工會與俱樂部有團體票出售，使購戲票的機會人人平等。如首都的劇團常常赴較大的集體農場和新墾地區演出。

在受盡惡意宣傳，說蘇聯「戀愛自由」「女人國營」的人，對於蘇聯人的道德規矩，目覩之後決不免大吃一驚。革命之初，若干俄國青年，尤其是知識分子，的確有過火的行爲，但這種胡作妄爲，却爲共產黨領袖所不喜。領袖們本身的私生活和態度，個個潔身自好，清心寡慾。這一次我在蘇聯，就眼見幾個例子。有幾艘運載救濟物資的美國船隻，帶有撲克牌。蘇聯人不喜此物，在他們看來，撲克牌和賭博是聯帶東西。又如在戰爭時候，名作家西蒙諾夫出版了一卷給他太太的情詩，內容自然卿卿我我，但並不輕薄肉麻。據說史太林就加以批評，說：「這詩集應該只印兩冊，一冊給作者自己，一冊給他太太。」

一九四四年七月，舉行一個有千五百個學生出席的會議，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秘書發表一次演說，題目是：「蘇維埃學生的道德觀。」有一個學生問「我們生活的道德目的是什麼？」回答是：「爲國家盡力，爲大家的福利獻身。」學生們被力請「埋頭苦幹」，「從先生那裏盡力所能學習受教，尊敬先生。」演說者說使學生不能照良心做事，是缺乏意志力量之故。有一個學生問怎樣匡救，回答是：「留心你的一行一動，切勿沉溺於你自己的弱點，亦勿爲你同志的弱點同流合污。」社會服務被譽爲修心養性的工作。

思想家和領袖們諄諄以服務爲言。史太林有一次說：「決定每一個公民的社會地位者，不是財產的多少，所屬的種族，是男人還是女人，做什麼工作。爲人民爲國家的真誠服務，才是道德過人的本源。」著有權威之作「蘇維埃倫理」的杜勃洛夫斯基說：「人之美德，主要在於誠實生產的勞動，爲

人民的福利而努力。」

一九四四年九月，青共真理報上有一篇論教育的文章，對於蘇維埃的道德觀有更詳盡的論說：「如果教師的質地低落，對學生不問不聞，教人無知無識，缺乏教養，懶惰與馬虎，那麼國家所受的損害就極大。」

「蘇維埃學校的教材，不能徒講形式，而與生活無關。它必須有着高超的「觀念內容」，為偉大的共產主義觀念所激勵……我們的愛國主義，根本上與法西斯主義所有的仇恨人類相反……」

「在發展我們青年的共產主義道德，在社會上的行為準則上，如友誼，忠實，孝順母親，敬重長輩也極為重要。學校必須養成道德上純潔的身心健全的兒童，有志向，有智識，有規矩的兒童。」

近來蘇聯的改訂若干法律，如不容隨便離婚，嚴禁隨便打胎，就是這種道德觀的例證。

蘇聯人大家願在社會主義之下過生活。一九三九年時，蘇聯人個個覺得在生活日趨幸福上，已開始在吃到蘇維埃秩序的果實。百分之九十九都像有一個工人的那樣滿意，這工人對我說過：「在前幾年，我做夢也想不到有今天這樣生活美滿，但今日的生活和我們正在邁步前進的未來生活比較，自然又不值一談了。」

二次世界大戰使蘇聯人更幸福的生活受了一個阻礙。但他們樂觀如故，更擁護他們的政府。最近我接到好多封蘇聯朋友的來信，告訴我衣食又趨豐富，物價跌落一半，生活又好過起來。有一封信的結末是這幾個字：「前途極為光明。」